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俄〕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译

人民出版社

目 录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1
作者的话	1
第一篇文章：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七年第十一——十二期）	2
第二篇文章：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诺埃·波诺米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二——四期）	69
评亚·奥·奥里威蒂的书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八期）	142
维·切尔诺夫先生和波尔·路易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八期）	149
评恩·克里茨卡亚和恩·列别节夫的书 （载《现代世界》一九〇八年第十期）	156
答总罢工调查表 （摘自拉葛德尔先生《总罢工和社会主义》一书）	164
译者后记	166

对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批判

作者的话^①

我的朋友和同志、安杰利卡·巴拉班诺娃博士希望将我评阿尔图拉·拉布里奥拉和恩利科·列昂奈这两位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文章翻译成意大利文。

假如我对工团主义的批判得到意大利社会主义者的赞同，那我是极为高兴的。工团主义在工人头脑中确实造成了不少混乱，现在该是全世界社会主义者开始同这种学说进行理论斗争的时候了。我们那些把工团主义看成社会主义一种形式的同志，是大错特错了。其实真正的工团主义，即彻头彻尾的工团主义，跟真正的社会主义，即跟同样彻头彻尾的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我确信，经验和思考会使至今仍持相反观点的人也相信这一点。

我的这些文章的第一篇在俄文杂志《现代世界》上登出来以后，阿·拉布里奥拉先生便大发雷霆；他在《Pagine Libere》^②和法文杂志《Mouvement Socialiste》^③上对我宣泄怒火。

我至今还没有给他答复，原因是非常可以理解的，因为他的文章里，谩骂比论据多得多。而我呢，虽说这辈子论战不少，可没有回答谩骂的习惯。在这种场合，我是倾向于老习惯的。况且诽谤

① 评阿·拉布里奥拉和恩·列昂奈的两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本序。

② 《自由的篇章》。——译者注

③ 《社会主义运动》。——译者注

过国际无产阶级伟大导师和国际工人协会奠基者的人。他的攻击不可能对我有什么损害；这些谩骂或许甚至还会使我心怀开畅，要是骂得较有艺术的话。等我写完这一组评论工团主义的文章^①，我会着手对我的论敌们为保卫工团主义而提出的种种反驳作一番系统性的分析的。不过我之注意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只是因为他那些反对我的论文中有些论据，而不是仅仅几句陈词滥调。

暂时我只好忍耐忍耐拉布里奥拉先生的怒气，这对我——如上面已经说过的——是没有任何困难的。

第一篇文章

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

阿·拉布里奥拉：《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附作者给俄文版写的序言。格·基尔德错夫译自意大利文，安·卢那察尔斯基编辑并附有他的跋文。“野蔷薇”出版社。圣彼得堡 1907 年。

一

常言说得好：任何序同时也就是跋。不过恐怕也有同样的理由可以断言：任何跋都可看成是序。无论如何，对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给由他编辑的格·基尔德错夫先生翻译的阿·拉布里奥拉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写的那篇跋文，是可以这样说的。尤其是，如果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把自己的跋叫做序，并且把它放在拉布里奥拉著作的前面，他就做得更好了，那时它就会更好地完成自己的任务：即把读这本书所必需的若干指导性的意见告诉读者。

^① 下面刊登的两篇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文章只是这一组文章的开始。

不过，我说得不完全确切。我说的是：“就会更好地完成”，而本来应当说：“就不会那么坏地完成”等等，因为事实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跋文在完成上述任务方面是非常糟糕的。

说糟糕，第一是因为这篇跋文对一般工团主义作了不正确的说明。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同改良主义斗争，今天在西方，是最主要的任务之一；明天在我们这里也会是这样。既然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在磨快对改良主义者进行批判的武器，他们就值得我们深切的注意。就连认为工团主义是一种极端的那些正统社会民主党人，也仍然承认它是对企图使社会民主党变成单纯的极端的左翼资产阶级民主派的一种健康的反动”（第247页）。说同改良主义作斗争是西方当前最主要的任务之一，这是完全正确的。不过究竟有谁认为工团主义是对改良主义的“健康的”反动呢？我不知道。而且能不能认为工团主义是健康的反动呢？最后，一般说来，“健康的反动”是什么意思呢？力学说：作用力等于反作用力。在人类思想史和人们的社会政治活动史上，振幅，请读者原谅我用这个力学名词，反动的振幅通常等于正动的振幅。在思想方面，“改良主义”是一种肤浅的、贫乏的和可以说是毫无价值的现象。“工团主义”也是同样的贫乏、肤浅、毫无价值。在这种场合，反动的振幅并不比正动的振幅大。所以我要问一问：具有我刚才指出的那些特点的现象能不能叫做健康的现象呢？我想最好是不把它叫做健康，而叫做病态。工团主义者叫嚷得比改良主义者多得无法比拟，虽然改良主义者的叫嚷也并不少。不过叫嚷与叫嚷各不相同；现在西欧某些国家的工团主义者发出的叫嚷，并不证明他们的思想是健康的，而是证明他们的思想得了贫血症。这也就是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认为“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用来同改良主义作斗争的“批判的武器”在我们心目中可能具有多少高贵的价值的那个意见所以大错特错的原因。的的确确，这柄武器“值得我

们深切的注意”。不过它之所以值得注意，正如改良主义“杰出的理论家们”用来反对马克思的那个“批判的武器”值得注意一样：我们应当使无产阶级认真地注意这两种“武器”，以便向他们说明，这两件东西多么糟糕、多么陈旧，如果拿来使用对他们又是多么有害。然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对这个问题却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郑重其事地拿起“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磨快的批判”武器，他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和最最可悲的错误，也就在这里。

当我想到这个可悲的错误时，我回忆起圣贝尔纳评论那些企图证明某些多神教哲学家是基督徒的中世纪思想家的意见。圣贝尔纳对他们说：“你们所证明的并非他们是基督徒，而是你们是多神教徒。”对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来也是如此：他对“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们磨快的批判的武器”敬而重之的态度，只是使我们相信他自己的那柄“批判的武器”情况不妙。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另一个也是很大很大的错误——这个错误同第一个错误有着最紧密的联系，它之属于第一个错误就象种之属于属一样——在于他认为阿·拉布里奥拉是一个杰出的和独创的作家。他如此敬重自己的作者，甚至当后者明摆着在胡说八道的时候，他也不直截了当地驳斥他，而是“冒昧地表示”自己相反的、有时还是同样十分荒诞的意见。他坚信，猫儿是强大的野兽。其实猫儿只是在同老鼠斗争时才是强大的。而老鼠本来就是十分渺小的兽类啊！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他的被他当作很大野兽的工团主义猫儿面前卑躬屈膝到何等可笑的地步，他的跋文中下面一段话可以说明：

“我们的作者把未来描绘成有许多独立的合作社的社会，这些合作社互相贸易往来，甚至同时还使用货币。那么，市场上不排除任何价格波动、任何生产过剩么？还有可能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

另一些人一贫如洗么？一些经营合理和安排得当的合作社不会在短期内变成贵族式的合作社，而另一些则变成附庸的和受剥削的合作社么？哪里有市场、冒险行为，那里就不可避免地有领先地位，而如果没有国家，就不可能用公平的租金来调节甚至象地理布局、土地资源等等那样一些无限有利的条件。很难设想有一种空想会比集体主义的空想，比没有调节和计划中心的蒲鲁东式的半社会主义的空想更加明显地倒退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不过，对‘权力’的恐惧使得无政府主义这个受惊的乌鸦甚至害怕灌木林^①。而其实，我们这位有才情的作者同受惊的乌鸦们一点亲戚关系也没有！”（第 264 页）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确信，他的“有才情的”作者跟无政府主义这只受惊的乌鸦没有丝毫的共同点。他大大错了：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本人就断然说，他的同志们“跟无政府主义者在最终目的上几乎完全相似，尽管他们的实际措施有深刻的分歧。”（第 108 页注释）凡是认真阅读阿·拉布里奥拉的书的人都会相信，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身上受过无政府主义者蒲鲁东最强烈的影响。诚然，这影响与其说是直接的，倒不如说是间接的。看来它主要是通过法国著作家乔·索雷尔^②的媒介，即通过《Introduction à l'économie moderne》^③一书和其他许多有着惊人的概念混乱的著作的作者的媒介。不过阿·拉布里奥拉的世界观不光是在蒲鲁东间接或直接影响下形成的，意大利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庞塔勒奥尼对它也助过一臂之力。假若我没记错，阿·拉布里奥拉甚至把

① 同汉语中“惊弓之鸟伤曲木”的意思相当。——译者注

② 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 1847—1922)，法国社会学家，工团主义主要代表之一，受蒲鲁东、尼采、柏格森等人的影响，企图折衷地将蒲鲁东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结合起来。他的观点对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者有某种影响。代表作是《暴力论》。——译者注

③ 《现代经济引论》。——译者注

自己的一部著作献给了这位教授。庞塔勒奥尼可以称之为当代意大利曼彻斯特派一位最典型最光辉的代表人物。他是任何国家干涉的坚决反对者。所以难怪身上受过此人影响的阿·拉布里奥拉在说明他所谓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观点时写道：

“他们根本不希望加强这个(即资产阶级。——格·瓦·)国家^①的势力,让它掌握新的压制个人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工具(国家干涉制度、大工业国有化等等),恰好相反,他们千方百计地要把这个势力压缩到尽可能的最小限度”(第107和108页)。

还说:“他们只有到工人阶级得以打碎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的那一天才能开始搞正面的社会主义的立法”(第108页)。

不言而喻,“社会主义”立法只可能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才有,至于“国家干涉”制度,那么在某些情况下,它不但现在可以有有益于工人阶级,简直还是工人阶级所必需的。试拿所谓工厂立法为例。大家知道,马克思把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称为劳动政治经济学对资本政治经济学的第一个胜利。不过庞塔勒奥尼教授自然是用完全不同的眼光看这个问题的,所以在他的影响下,阿·拉布里奥拉说:

“古典式的反动运动的典型,我们可以在教权制社会那里看到,这个社会竭力想把反对派分子曾经成功地从它手中夺过去的权力捞回来。不过,有些政党力求把失去了的、或者从国家那里夺去的不仅监督个人意见而且监督社会经济生活的权利,重新交到国家手中,它们也是同样反动的”(第84页)。无庸争辩,有觉悟的工人阶级代表过去和将来都始终是对意见搞任何监督的最不可调和的敌人。然而对社会经济生活却不得不说,有“监督”,也有监督。

^① 俄译本用的不是“国家”(государство)这个词,而是“统治”(господство)。不过这显然是排字错误,或者是翻译者的笔误。意大利原文印着:“di questo stato”(据1906年第二版核对)。

马克思认为上述十小时法案是重大的“原则胜利”，因为它意味着社会对现时靠盲目经济力量的自发作用调节的经济生活进行自觉的干涉。而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则宣布这样一种干涉乃是爱好自由的人不能容忍的国家监督的胜利。谁对了呢：马克思，还是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阿·拉布里奥拉没有给自己提出这个问题，至少没有象我这样地提出这个问题。可是，根据他对任何国家干涉都持纯粹曼彻斯特派的敌视态度来看，应当说，假使他想合乎逻辑的话，在这场争论中他的全部同情应该是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一边。也只是由于这个缘故，他才可以在自己的书的结尾一章中声称：“在改良主义者的活动和革命之间没有任何其他的相互关系”（第242页）。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来，改良和革命的关系问题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拉布里奥拉之所以害怕任何国家干涉，也正是因为他本人一则同无政府主义这只“受惊的乌鸦”是亲戚，二则也同——我想这样来说，以便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动物学比喻的领地上逗留一会儿——自由主义曼彻斯特派饶舌的喜鹊是亲戚。而我们可爱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却料不到这一点；他至今还指望开导自己的“有才情的”作者，说什么好象他这位“有才情的”工团主义者压根儿不是“乌鸦们”的亲戚。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真是瞎子摸象！

他瞎子摸象也不是只此一遭，而是许多次了。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叙说阿·拉布里奥拉所“描绘”的那个未来时完全没有猜到，他这里恰好是碰着了“革命的”工团主义那个重要的特点，这个特点，一方面使“革命的”工团主义根本不同于我们当代的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暴露出工团主义作为无产阶级取得经济解放的手段完全无能为力。

为什么“我们的作者把未来描绘成有许多独立的合作社的社会，这些合作社互相贸易往来，甚至同时还使用货币”呢？那正是

因为——也仅仅因为——他是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看来，不是无产阶级政党，而是工会应当成为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主要的工具。工会怎样才能消灭这些关系呢？一首著名的无政府主义之歌早就邀请

Ouvrier, prends la machine,

Prends la terre, paysan!①

每一个工会都控制着与其职业相应的生产手段：铁路工会“掌握”铁路，掘墓工人“掌握”坟地和所有挖墓时要用的工具。于是两个工会彼此就铁路员工据以把死尸运走、而掘墓工人据以埋葬铁路员工的那些条件缔结“契约”。当然，不止掘墓工人和铁路员工这么干；一切劳动部门的生产者都这样干。而由于一切劳动部门的生产者都这样干，就发生了一件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不那么欢喜的事情：“市场上不排除任何价格波动、任何生产过剩；还有可能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使另一些人一贫如洗”，而“一些经营合理和安排得当的合作社在短期内”就“变成贵族式的，另一些则变成附庸的和受剥削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说得完全正确：这会“明显地”倒退到使社会分裂为阶级。不过当他以为，好象阿·拉布里奥拉无需背叛自己，即背叛他这位我们最可爱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如此不合时宜地恭维奉承的那个“革命的”工团主义就能放弃这个空想的时候，他就根本不对了。这个空想乃是“革命的”工团主义全部本质之所在。放弃这个空想无异于叫阿·拉布里奥拉不再做一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即不再是他自己。而因为“革命的”工团主义的空想无疑是资产阶级的空想，是奋起反抗国家的商品生产者的空想，所以放弃这个空想对于“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来说，简直就

① 工人夺取机器，
农人夺取田地。——译者注

意味着同现存的资产阶级制度妥协，亦即意味着用未来的资产阶级诗篇来代替现在的资产阶级散文。这一点，“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是永远也做不到的。据我所知，他们根本没有自杀的兴致。

二

因为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对“革命的”工团主义学说本质的想象显然太糟，所以我劝他仔细地想想他那位“杰出的”阿·拉布里奥拉写下的这样一段话：

“工人应当斗争，让那种从工团生活的需要中产生的平等形式在世界上成为事实。他们应当使生活采取仅仅是工团主义的那种形式，即采取人们在有技术参与经济生产的基础上的纯粹契约组织的形式”（第20页）。按照阿·拉布里奥拉的意见，契约观念应该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请问：我们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是从哪里弄来这个观念的呢？答：他是在蒲鲁东那里弄来的，——我不知道是直接弄来的还是通过索雷尔的媒介弄来的。不管怎么样，我都请读者直接请教蒲鲁东。下面就是后者说的话：

“契约观念排斥统治观念……对于契约，对于互相协商说来，其特点是由于这种协商可以扩大人们的自由和幸福，然而随着权力的建立，自由和幸福就都减少了……如果契约在其通常的意义上和在其日常的实践中具有这样的特性，那末以平等的利益把一个民族的成员互相联合起来的社会契约又是怎样的呢？”

“社会契约是最崇高的证书，凭着这个证书每一个公民都让社会来支配自己的爱、自己的智慧、自己的劳动、自己的服务、自己的产品、自己的财产，以换取自己邻人的牺牲、思想、劳动、产品、服务和财产，同时每一个人的权利的大小取决于他所缴纳的价值，而依所交纳的数量可以自由偿还……社会契约应当经过所有参加这一契约的人的自由讨论，个人同意和亲笔（“manu propria”）签

字……社会契约按其性质说来很象交换契约：社会契约不仅在它签字以后把签订者的全部（“l'intégralité”）财富保留下来，而且还增加他的财产；它不对他的劳动作任何命令，它只涉及交换关系……按照权利和普遍实践的规定，社会契约就应当是这样的。”①

摘录得很长，为此我向读者致歉。不过我必得这样做，为的是表明：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想拿蒲鲁东吓唬阿·拉布里奥拉，是何等天真。要有这么样的天真，就得既根本不了解蒲鲁东，也根本不了解阿·拉布里奥拉！

现在，当我们知道了阿·拉布里奥拉从何处弄来他的契约观念，且来看看这个观念本来是什么一回事。在这里，再让我翻开我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

“在经济领域中把商品生产者互相结合起来的唯一纽带就是交换。——我在那里说道，——从法律的观点看来，交换是两个人的‘自由意志’的相互关系。它用契约来表现。因此按照科学的一切规则‘建立起来的’商品生产乃是‘绝对的’个人自由的统治，因为当用契约使自己接受生产某种物品和交换某种商品的义务的时候，我丝毫也不会限制自己的自由。根本不会！我利用这种自由同我的邻人们发生关系。同时契约会调节我的自由：因为当我履行我在签订契约时自愿承担的义务时，我就给其他人以应有的权利。于是，‘绝对’自由就变成恰当的‘秩序’”。（同一页）②我早已说过：阿·拉布里奥拉象浮士德一样有两个灵魂：一个灵魂来自

① 《Idée générale de la Révolution au XIX siècle》[《十九世纪革命的普遍观念》]，1851年巴黎第十二版，第124—127页。这段话是从我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第37页上摘引下来的[见中文版第51页。——译者注]，该书由恩·伊宁先生译为俄文，姆·玛丽女士出版。

② 参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版第50页。——译者注

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另一个来自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当他哇啦哇啦地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时，就是庞塔勒奥尼用他的嘴说话；而当他坚持契约观念时，就是蒲鲁东的精神在鼓舞他，也就是他自己在做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他是这样描绘“工人世界的理想”的：

“……这是唯一地和单纯地组织为各种物质生产形态的经济社会，这个社会里没有纯粹技术意义的任何等级制度都是不存在的，这个社会没有国家，没有监狱、军队和法律，它是根据经济需要、契约联系和对生产的技术指导同样牢固地和关心地组织起来的”（第20页）。

“没有法律”的社会，这不是工人世界的理想，而只是无政府主义的理想。这个理想建立在明显的误解的基础上。无政府主义者把契约同法律对立起来。然而这种对立甚至经不起最轻微的批判。

契约是公民间的协定，订了协定，人们就承担了一定的义务。靠什么来保证这些义务的执行呢？不是靠别的，正是靠法律。由此得出，契约并不排斥法律，而是以法律为前提。早就有人说过：“法若不行，枉为立法。”有同样权利可以说：“如果没有保证执行契约的那些法律，缔结契约就是白费力气”。在这种场合，契约的执行取决于每一个缔约者的裁定，因之也取决于缔约者每一方的任性。然而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按照任性来组织。就是因为这个道理，即使把契约观念当作社会组织的基础的无政府主义者也该懂得，“没有法律的社会”乃是彻头彻尾的胡说八道；圆的正方形，荒诞不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比方美国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本杰明·特凯尔，就懂得这个道理。特凯尔认为，必须有这种法律规范，这些法规可能建立在普遍意志的基础上，它们可能是由被社会承认为合理的一切手段强制执行的。顺便说说，这些手段甚至

包括监狱、死刑和……拷问^①！自称为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不但根本不愿意听到监狱和拷问，这自然是他们的荣耀，而且也根本不想听到讲法律，这一点，正象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却丝毫不会使他们光采，因为这只是证明他们完全不讲逻辑。

肯定没有法律的社会是百分之百的胡说八道，这完全不是说任何法律都是好的。决不是的！法律可以有好有坏；这是不言而喻的。同样明白的是：任何一个达到自我意识的社会阶级，即任何一个力求按照自己的需要来改造社会的阶级，都应当力求取消它认为坏的法律，而建立它认为好的法律。宣布任何法律，正因为是法律，所以是坏的，无异于宣布任何理想（也包括工人的理想）的实现都是坏的，这真是岂有此理的混账话。

事实上可以认为，工人阶级取得了权力以后，就会要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必需做什么呢？颁定一条法律，宣布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或者至少起初宣布一部分生产资料为公有财产。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早已告诉我们，实现阿·拉布里奥拉反共产主义的空想会把社会拖回到阶级分裂的状态中去。

那么“常备军”呢？“等级制”呢？“监狱”呢？“拷问”呢？要知道“拷问”不止在无政府主义者特凯尔的乌托邦中才存在哩。所有这些都是一片罪恶之海。还有什么可说的。那就试试用“契约”这个勺子去舀干这片海洋吧！任何关于这个罪恶之海的思想都是“托尔斯泰学说”，“不以暴力抗恶”的同义语。为了消灭社会上的罪恶必需有法律。法律应当是社会意志的表现。如果现在它在最大多数情况下还没有表现社会的意志，那么这原因就在社会分成了阶级。消灭了阶级划分，法律便不仅会成为整个社会意志的表

^① 关于这一点，请看艾里茨巴赫尔《无政府主义》一书，柏林，第225页。

现，而且还会是社会单个成员的自由的最好保证。

阿·拉布里奥拉的“准无政府主义”的理想，只有那种根本不考虑逻辑规律的人，或者只有那种事实上根本不追求任何“理想”、唯独欣赏震天价响然而毫无实际内容的夸夸其谈的那种人，才会觉得是有诱惑力的和能够实现的。我看，阿·拉布里奥拉正是这样一个满足于高谈阔论的人物，在他身上，如同我们已经知道的，存在着两个灵魂。

三

阿·拉布里奥拉继续说道：“资产阶级社会把这种工团主义组织形式同人们的政治组织对立起来，也就是说，使人们从属于站在直接的市民社会之外的机关，即从属于国家。只要稍微想一想这个对比，我们马上就会明白：索雷尔说得多么对，他断言，无产阶级争取解放的斗争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社会的政治权力即国家，和劳动人民的技术—经济组织即工团之间的斗争的形式进行的”（第20页）。

工团，以及一般说来工人阶级，必须同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建立的“政治组织”进行斗争，这是众所周知的和不言自明的。不过弄清楚这个斗争的目的究竟是什么，是很有益的。阿·拉布里奥拉把事情说成是：工人的工团组织应当消灭“人们的政治组织”。他在自己著作的第191页上说道：“工团将完全取代国家。”然而情况根本不会这样。

自然，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现代资产阶级国家也会消灭。恩格斯下面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这个问题：

“国家是整个社会的正式代表。它把社会统一为一个有形的组织，但是，说国家起这个作用，这仅仅是说，它是当时本身代表整个社会的那个阶级的国家：在古代是占有奴隶的公民的国家，在中

世纪是封建贵族的国家，在我们的时代是资产阶级的国家。当国家终于真正成为整个社会的代表时，它就使自己成为多余的了。当不再有需要加以管辖的社会阶级的时候；当不再有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统治和根源于现代生产无政府状态的生存斗争的时候；当由此二者产生的冲突和暴力已被消除的时候，就不再有什么人需要镇压和遏止，现今执行这种职能的国家政权也就消失了。国家作为整个社会的真正代表所采取的第一个行动，——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财产，将是它作为国家所采取的最后一个独立行动。国家政权对社会关系的干预将逐渐成为多余的事情而自行停止下来。〔那时，对人的统治将由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所代替。〕^① 国家不是‘被废除’的，它是自行消亡的。”^②

你们看，恩格斯也是丝毫不愿意对国家三呼“万岁！”的。他很懂得，国家是“历史的范畴”，就象部落组织一样(tribal organization, 如现在美国已故的摩尔根那个学派的人种学家所说的那样)。无政府主义者诬蔑社会主义者，在同社会主义者辩论时把他们说成多半是“国家派分子”。可是恩格斯在很好地理解国家是历史范畴的同时，却清楚地看到，变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只能是国家的事情。而如果变生产资料为社会财产应当是国家的事情，——我上面已经暗示过为什么是这样，下面我还要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如果是这样，那么，那些硬要无产阶级相信它努力争取自身解放的斗争的目标首先应当是摧毁国家的人就完全是在胡说八道。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③！此外，——我非常遗憾的是安·卢那察尔斯

① 方括弧内的话，作者漏引。——译者注

② 弗·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维·查苏利奇译，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41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438页。——译者注〕。

③ 语出《圣经》马太福音第6章第34行。——译者注

基先生没有注意这一点，——把“直接的市民社会”同国家对立起来，根本不会暗示有逻辑思维的人得出它使得“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得出的那些结论。要懂得这个道理，必须弄清楚，同“人们的政治组织”对立的直接的市民社会究竟是什么。

“人权”(droits de l'homme)和“公民权”(droits de citoyen)的某种区别是同“直接的市民社会”和“人们的政治组织”的区别相适应的。这种区别是法国革命造成的，这次革命消灭了“旧制度”(ancien régime)的一切残余，并且为发展新的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组织开辟了广阔的道路。作为“市民社会”成员，现代法国人是“人”；作为“政治组织”成员，他就是“公民”。①

这种区别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马克思在他就犹太人问题同布鲁诺·鲍威尔论战时，早就回答了这个问题。

他在那里指出，“公民权”反映着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成员的普遍的、“类的”利益，而“人权”则属于他们个别的、“利己主义的”利益的领域。例如，“安全”概念、警察概念 (der Begriff der Polizei)②是“市民社会”的最高社会概念，这个概念是建立在这样一种信念的基础上的：整个社会的存在都只为了保证它的每个成员的人身、权利和财产不受侵犯。马克思说：“市民社会并没有借助安全这一概念而超越自己的利己主义。相反地，安全却是这种利己主义的保障。”在市民社会中，人不是作为整体的一部分出现的，相反地，整体对于社会中的个人来说却是他原有的独立性的限制。把市民社会中的人们连接起来的唯一纽带是人们的需要，是他们

① 请读者好好注意这一点，才不会被公民、市民社会这两个词的语音相似弄糊涂。

② 法文称安全为 sûreté，称侦缉警察为 police de sûreté。

的私人利益，是对他们财产和利己主义个人的保护^①。

马克思在这些话中部分地还暂时保留着旧的、可以说是马克思以前的一套术语，即所谓“德国的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一套术语。这也是不足为怪的，因为这些话属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过渡时期。然而老的术语并不影响这些话在很高的程度上成为实质上准确无误的。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社会分为阶级。因此，“人的政治组织”就是一种旨在保卫统治阶级利益的组织。所以，它本身就是利己主义的表现。不过“政治组织”的利己主义是阶级的利己主义，而“直接的市民社会”的利己主义则是单个人的利己主义……无政府主义者和阿·拉布里奥拉不喜欢阶级的利己主义。因之他们就想破坏表现阶级利己主义的“政治组织”。可是，为使“直接的市民社会”摆脱“政治组织”而破坏“政治组织”，无异于让阶级利己主义替个人利己主义作牺牲。若说这是前进，那不过是个人利己主义的前进。

拥护马克思学说的人对整个问题的看法则完全不同。他们不希望为“市民社会”而牺牲“政治组织”。他们希望消灭“市民社会”为一方和“政治组织”为另一方之间的对立本身。

这种对立现在是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而存在着。要取消它，必须取消资本主义固有的生产关系。为此必须使生产资料变成公有财产。随着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变成公有制，“直接的市民社会”同“人们的政治组织”之间的对立也会消失。当（资产阶级的）“人”所统治的领域同现在构成“公民”封地的领域合而为

^① 参阅《Gesammelte Schriften von Karl Marx und Friedrich Engels, von 1841 bis 185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从一八四一年到一八五〇年），第1卷从1841年3月到1844年3月。施图加特，1902年版，第419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1卷第439页。——译者注〕。

一的时候，“人”就成了“公民”，“公民”也就成了“人”。国家就会“消亡”，不过完全不是通过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所希望和所预言的那种死亡的方式“消亡的”。

阿·拉布里奥拉说，其成员没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社会一定会自发地采取代议制社会的政治形式(第12页)。他在同一页上说，凡是占统治地位的各社会集团之间没有共同利益的地方，代议制就会自发地产生。这个思想，按照他所表述的这个样子，自然是不对的：在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各奴隶主社会集团之间也没有共同利益，但是古代社会根本不知道代议制。不过在这个表达得不正确的思想的根子里却有一个正确的、虽说是很模糊的猜测。阿·拉布里奥拉模糊地猜测到：现代的“政治组织”是由现代的经济，由现代的“市民社会”建立的，如果取消人们现代的政治组织，而照旧保留“市民社会”，那么，这个“市民社会”就会“自发地”产生现代的“政治组织”。为了摆脱窘境，他就想出了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称之为“互相贸易往来，甚至同时使用货币的独立的合作社”的那个东西。然而同一位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就象我们上面已经看到的，正确地反驳他说：从这种合作社的空想中必然得出的逻辑结论就是“社会分裂为阶级”，即恢复“其成员没有共同经济利益”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用阿·拉布里奥拉的话说，又会“自发地产生”代议制。由此可见，我们“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通过空想领域的漫游以后平安地回到原来的出发点。我看，这意味着原地绕圈子，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认为这是帮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快武器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我们中间谁是对的，我不作结论，请读者给我们评判。

为了取消市民社会和“政治组织”之间的对立，正如我说过的，必须把生产资料转为公有制。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完全不是属于工团的所有制。工团即职工会代表产业工人的利益，就是说，它所

代表的不是整个生产者阶级，而只是这个阶级的特定部分。作为整体的生产者阶级的利益究竟在哪里得到反映呢？就反映在这个阶级的政党身上。所以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公有制，作为整个社会——减去剥削者——根本利益之所在的事业，只能是政党的事情，而决不是工团的事情。

阿·拉布里奥拉象所有的工团主义者一样，认为整体的利益可以由工团联盟来保证。但这是一个错误。工团联盟在这里只能起到例如联邦院 (le conseil des Etats, Ständerat)①在现代瑞士宪法中所起的那种作用。大家知道，这个联邦院反映着不同于整个瑞士的利益的瑞士个别州的利益。它是州的分立主义的象征。瑞士国家的整体利益是由国民院 (le conseil National, Nationalrat)②来代表的。“联邦院”由各个州的代表组成，每州两人（如果这个州由两部分组成，则每一部分派一个代表）。因此，有一万七千居民的乌里州在联邦院里拥有的席位，就跟居民数目达五十万的伯尔尼州一样多。由此可以看出，如果谁说“联邦院”完全可以代替“国民院”，那是很错误的。绝妙的是我们，比方说，就可以在浸透着工团主义精神的法国“劳动总同盟”中看到这种现象。在它的代表大会上，每一个即使最微小的工团也和最大的工团一样拥有同等的表决权。人们不止一次地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消除这种不能容忍的反常现象，给予每一个工团在代表大会上的表决权的数目要同这个工团成员的数目相适应。然而始终最坚决地反对这个做法的正是最“杰出的”工团主义者，这就暴露了他们的分立主义精神。谁对工会和党的关系问题有兴趣，我着实劝他仔细观察一下法国“劳动总同盟”那里发生的事情。这样的观察比一切抽象的论据都更使人相信：任何工会联盟都不可能代替无产阶级

① 或译“联邦议会”。——译者注

② 或译“国民议会”。——译者注

政党。

下面我还要回到党同工团的关系问题上来，不过现在我得继续同我们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周旋一番。

四

这位惊人的“理论家”在自己的书的第七章中用一整列确实可笑的理由企图证明马克思——《共产党宣言》两位作者之一——本来就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充分地批驳了阿·拉布里奥拉这些可笑的理由，他引证了马克思的小册子《法兰西内战》中的一段话，其中就有这样几行文字：

“如果合作制生产不应当仍然是一个诱饵、一种圈套，如果它应当代替资本主义制度，如果合作社应当使全国生产服从一个总计划，从而把它置于自己的监督之下，并结束作为资本主义生产不可避免的结果的经常的无政府状态和周期的痉挛现象，那么，诸位先生，如果这不是共产主义，又是什么呢？”^①

因此，阿·拉布里奥拉在这个问题上的一切诡辩和谰论都可以心安理得地不予理会了。更有益的将是让读者了解同一章中这样几页的内容：我们的作者在这几页里歌颂着自由竞争的绝顶美妙。这是一首完整的赞歌。在议论“契约”时，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用他的嘴说话；在歌颂自由竞争的良好后果时，大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用他的嘴吟唱。

赞歌是用这样扬扬得意的调子开始的：“社会主义如果理解为取消一切寄生的酬金的手段，结果它就同自由竞争的作用相符了”（第181页）。这种论调不能不叫读者大吃一惊，因为这些读者早就不看英国自由贸易派的作品，也没有机会认识所谓纯粹政治经

^① 这几行文字在我分析的这本书的第263和264页上〔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379页。——译者注〕。

济学（“*economia pura*”）的意大利学派的著作。因此，为了杜绝一切误会，我让赞歌的作者本人发表意见。

“顺便说说，自由竞争对市场的影响难道不是表现在引起普遍的最大繁荣的倾向上吗？这是千百次从各种各样的（分析的、图解的、逻辑的和历史的形式）理由中得出的证明，这是所有的人本来都应当掌握的。由此产生这样一个简单的论题：自由竞争不会造成任何人的特权地位，而是使每一个生产者都有可能根据他不获利（？）也不受损失的条件提供自己的产品；可是另一方面，自由竞争又迫使生产者采用技术进步的一切成果，从而向消费者索取相对说来最小的价格”（第 183 页）。

一幅极为令人愉快的图画：自由竞争的结果，生产者受到了它的良好影响，既不获利，也不受损失。纯粹的世外桃源！不过请等一等，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自由竞争其所以好，还因为它不造成任何人的特权地位……，除了享有特权的，即除了拥有生产资料的。非常非常叫人高兴！我们才懂得，自由竞争的世界乃是一切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不过且往下听：

“生产者们都非常相信，自由竞争制度只会促进消费者的利益，——阿·拉布里奥拉唱道，——他们不知疲倦地声明抗议这种竞争的缺点，他们组织成强大的辛迪加，其明显目标就是争得保护关税税率”（第 182 和 183 页）。

首先我要指出，为了避免术语混乱，翻译者最好在这里不用辛迪加一词，而用托拉斯一词，让辛迪加这个术语专门表示工人的工会^①。不过这是枝节问题。主要的是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完全不懂得他所歌颂的自由竞争本身怎样产生垄断，在这种场合也就是产生托拉斯。实际上，现代的托拉斯正是自由竞争造成

^① 法文 *syndicat* 一词有两个意义，一指资本主义国家的垄断组织，音译为辛迪加，一指法意等国的工会，通译工团。——译者注

的，而且正是由于自由竞争才存在。

马克思在同蒲鲁东辩论时早就指出过：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垄断否定竞争，同时又必然产生竞争^①。然而马克思的辩证的论据不可能在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的形而上学头脑中留下多少明显的痕迹。这是不言而喻的。形而上学者只知道自己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或者或者（或者垄断——或者竞争），除此以外，都是鬼话。

现在且听听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关于自由竞争对无产阶级状况的有益影响是怎样唱的：

“它对资本的影响无疑是有利于工人群众的。在需求动摇不定的情况下，它使纯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收入减少到最低限度。在经济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脱离直接工业活动的资本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东西……凡是存在着绝对的竞争自由的地方，脱离经营生产和管理工厂的理智职能的纯资本主义占有都丧失了相当大的重要性。它不允许从工人劳动中作无偿的大扣除”（第183、184页）。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这些话在何种程度上符合现实情况，不过首先我请读者再记住这样几行文字：

“资本的积累也需要由于花在保管上的劳动而产生的 一定的

① “在实际生活中，我们不仅可以找到竞争，垄断和它们对抗，而且可以找到它们的合题，这个合题并不是公式，而是运动。垄断产生着竞争，竞争产生着垄断。垄断资本家彼此竞争着，竞争者逐渐变成垄断资本家。如果垄断资本家用局部的联合来限制彼此间的竞争，工人之间的竞争就要加剧；对某个国家的垄断资本家来说，无产者群众愈增加，各国垄断资本家间的竞争就愈疯狂。合题就是：垄断只有不断投入竞争的斗争才能维持自己。”（卡尔·马克思：《哲学的贫困》，维·伊·查苏利奇译，格·瓦·普列汉诺夫编，圣彼得堡1906年版，第119—120页〔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142页。——译者注〕）。

报酬；只要存在着这类劳动，资本家就理应得到被称为利息的报酬”（第189页）。

总之，资本应该得到报酬，这种报酬叫做利息。但是事情毕竟不完全同资本的这个功绩和谐一致，所以减少资本由此获得的报酬原来是“幸福”。我们且看一看在“经济关系”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即在自由竞争找到最广阔的活动场所的英国，这种幸福有多么伟大。

根据1901—1902年的资料，英国所谓国民收入的总数共为1,751,000,000至2,000,000,000英镑^①。从这个总数中，工人阶级得到690,000,000英镑，而资本（注意：只是利息形态的，而不是利润形态的）则分得360,000,000英镑。请看，自由派工团主义海怪所歌颂的“幸福”暂时在英国还没有达到多少使人注意的规模：资本家作为单纯拥有生产资料的人，就是说个人一点儿都不亲自参加生产过程，他们所获得的比工人通过艰苦劳动所挣得的数目的一半还要多。英国资本家所获得的“报酬”确实是相当大的。诚然，英国资本所得到的巨额利息，极大一部分是海外投资的利息。因此，英国人的“幸福”本身的真正规模在这里是不清楚的。为了弄清问题，我引用在联合王国营业的股份公司的资料。这些资料属于1902—1903年。

这一年，“public companies”^②的数目为29,165个；它们的收入达到239,000,000英镑。从这里扣除属于某些不完全符合股份公司通常概念的企业所得的50,000,000英镑，我们得到179,000,000英镑^③，这就是其资本总数为1,850,000,000英镑的股东们的“报

① 一英镑等于十卢布。

② 股份公司。——译注者

③ $239,000,000 - 50,000,000 = 189,000,000$ ，而非179,000,000，所以这里的数字有错误。——译者注

酬”。结果是大约百分之十的利息^①。不过，再说一遍，股东的“劳动”是与直接的工业活动分开的。因此，请您自己判断一下，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硬要我们相信在“经济关系比较发达的国家里，脱离直接工业活动的资本几乎不会产生任何东西”，这个话对不对。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听了以后却一再称赞不已。这位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真是一个奇怪的马克思主义“正统派”！非常奇怪！……

自由派工团主义海怪继续唱他赞美自由竞争的颂歌：

“交换价格的规律导致产品实际价值的均等（在这里我们且把经济上的平衡怎样决定产品实际价值这个不恰当的理论问题撇开不管）；然而如果随着历史的进步，资本主义积累的报酬率是在降低，那么另一方面，劳动的价值即劳动力的价值就会不断的提高。这是通常的现象。四十年前工人为了养活自己和家庭。一碗稀粥和一块劣质面包就满足了，现在他们却提出了大得无比的要求。关于不让剥削妇女和儿童的所谓劳动保护的法律，大大地促进了劳动力价值的提高。另一方面，工人在工会组织的帮助下，成功地使竞争的影响不足为害”（第185页）。

在这里我们首先指出下面一个精彩的情节。

为了使工人阶级能够亲自体验到“自由竞争”的良好影响，工会组织应该“使”这种影响“不足为害”。怎么会这样呢？难道良好的影响是有害的么？如果是有害的，那么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怎么敢断定，“社会主义如果理解为取消一切寄生的报酬，结果它就同自由竞争的作用相符了”？十分可惜，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他那篇有趣的跋文中没有给我们说明这一点！

接着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劝我们相信，“所谓劳动保

^① 参看《Riches and poverty by Chiozza-Money》[奇奥扎-孟耐著：《财富和贫穷》。——译者注]伦敦1905年第90—91页。

护的法律”大大地促进了“劳动力价值的提高”。你看，真没有想到！我们本来相信了得到阿·拉布里奥拉-蒲鲁东坚决支持的那个断言无产阶级应当起来反对国家对社会经济生活任何干涉的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的。真理到底在哪里呢？十分遗憾，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他那篇有趣的跋文里没有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不过这也还不是最主要的。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说得完全正确：四十年前工人满足于一碗稀粥和一块劣质面包，现在他们却有大大得多的要求。但是，是否可以由此得出结论说，“劳动的价值即劳动力的价值在不断的提高”呢？完全不可以！

假定四十年前生产“一碗稀粥和一块劣质面包”需要花费国家一年中生产性消耗的全部劳动总量的一半。又假定现在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维持提出了大得无比的要求的工人的生活，只需要国家在同一时期中生产性消耗的劳动总量的三分之一。我们看见了什么呢？四十年前“统治阶级从工人劳动中所作的无偿扣除”等于此劳动的一半；现在这种扣除则达到三分之二。如果情况是这样，那就决不能断言，劳动力的价值在不断提高。然而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还是肯定这样讲。究竟有什么根据？真可惜，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他那篇有趣的跋文中没有向我们说明这一点！

没有也就只好没有。我们且试着自己分析一下。说“从工人劳动中的无偿扣除”现在比“四十年前”更多，这对不对呢？无可争辩是对的。特定国家的“经济关系越发达”，该国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程度就越高。威纳尔·桑巴特^①在其《Warum gibt es in den Vereinigten Staaten keinen Sozialismus?》^②一书中说得对：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美国那样雇佣劳动受到资本家这样的剥

① 桑巴特(Werner Sombart, 1836—1941)，德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译者注

② 《美国为什么没有社会主义?》。——译者注

削。这种现象怎么解释呢？正是因为任何地方劳动都没有这样的生产效率，换句话说，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地方象这个国家那样，生产力达到如此高的水平。

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对我们说，自然，美国坚持保护关税税率，因此这个国家的工人阶级就不可能充分体验到自由竞争的有益影响。要证明这个理由站不住脚是容易的；不过这样做就需要篇幅，我的篇幅不多。因此，我就来谈谈早已放弃保护关税率的英国。

请看一下这个表。

年 代	工资总额 (单位: 百万英镑)	赋税收入总额 (单位: 百万英镑)
1860	300	290
1865	340	385
1870	365	440
1875	465	560
1880	440	560
1885	440	580
1890	550	640
1895	580	660
1900	710	790
1901	705	800

这些数字有两个很大的缺点：夸大了关于工资的数字①，同时又缩小了赋税收入的真实数量，因为缴纳这种税的人通常都指出，

① 英国的统计学家们在计算工资总额时通常都表现出过分的乐观情绪。关于这一点请看我的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中《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论文二第四、五、六节。——译者注]。

税比实际数字低。然而即使从这些很不确切的数字中也可以清楚看出：在英国，“从工人劳动中的无偿扣除”比工资增长得更加迅速。这就是说，工人在英国受到资本家方面越来越强烈的剥削^①。

既然如此，怎么可能断言：“社会主义如果理解为取消一切寄生的报酬，结果它就同自由竞争的作用相符了”？怎么可以说，竞争的规律“是同资本的利益相反的规律”？（第186页）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听了这种大资产阶级的胡说以后怎么可以认为阿·拉布里奥拉是为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快武器的、严肃的理论家呢？

好象奥斯特罗夫斯基^③的柳比姆·托尔卓夫说过：“我们大家都在悲剧中间通过。”关于阿·拉布里奥拉的书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跋文，如果用柳比姆·托尔卓夫的话来说，可以说：大家，书的作者加跋文作者加它们轻信的读者，——他们大家都在误会中间通过。例如，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拿出一副专家的博学神态告诉我们说：“意大利工团主义比所有的主义都接近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第259页）。在我们听了阿·拉布里奥拉-蒲鲁东和阿·拉布里奥拉-庞塔勒奥尼所有那些话以后，读者自己可以看出：在刚才

① 甚至耶方斯^②（英国“纯粹经济学”学派的台柱之一）也承认，最近“四十年”间货币工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用黄金生产的增长来说明，——我会说，可以用花费在开采黄金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来说明。他是对的。不过由此可以得出，货币工资的增长可能伴随着工人在国民收入的劳动价值中所占份额的减少。耶方斯没有得出这个必不可免的结论，而是利用自己正确的意见作为反对工会的理由。这从他对待工会的那个观点看来是合乎逻辑的，顺便说说，他的这个观点完全不正确。不过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这里不予讨论。

② 耶方斯(Jevons, William Stanley, 1835—1882)，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数学派的代表人物，也是逻辑学家和哲学家。——译者注

③ 奥斯特罗夫斯基，亚历山大·尼古拉也维奇(1823—1886)，俄国大剧作家。——译者注

我引用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为数不多然而很有表现力的话语中“误会”是何等之多。实际上，在阿·拉布里奥拉的观点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没有丝毫共同的地方。只要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费一点气力读读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另一篇也是讨论《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中所分析的问题的著作，他就会从拉布里奥拉本人那里听到这一点。这另一篇著作篇幅不大，因此更容易弄清楚它非常非常有教益的内容。

我指的是登载在1905年12月《Mouvement Socialiste》^①上的文章《意大利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②。

如果我为了说明被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弄得如此混乱不堪的问题而从这篇不长的文章中摘引相当多的文字，读者是不会抱怨我的。

五

“我开始——阿·拉布里奥拉在那里说——公开声明，无论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现在都是产生社会主义的那个事实的新性质的产物(*le produit du caractère nouveau qu'a pris le fait qui engendre le socialisme*)。按照我的意见，这两者都为这个新的经验证明是正确的。自然，如果我们开始互相考察我们关于工人阶级为了达到社会主义本来应该走的道路，作为我们对于现今社会中起作用而其存在先前本不可能注意到的那些力量所得到的特殊观念的结果的那些意见，我们的辩论就会得到许多的好处。”

这究竟是怎样一些新力量呢？这个问题把我们带进了对象的

① 《社会主义运动》。——译者注

② 阿·拉布里奥拉的这篇文章是用意大利文发表的。不过我手边没有意大利文原本。这里我补充一句：意大利原本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一书题为：《Reforme e Rivoluzione Sociale》[《改良和社会革命》。——译者注]。

“筋脉内部”，象格·依·乌斯宾斯基^①的魔鬼所说的。阿·拉布里奥拉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这样的：

“**马克思主义**，我所理解的这个名词不是指卡·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和经济学说，而是指这种学说的特殊运用，即被他运用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瓦解过程。马克思主义是十九世纪上半叶历史经验的真正产儿。我们根据吉芬^②和舒尔采-格弗尼茨^③的描述以及根据恩格斯在他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的著作中所作的还要悲惨的描述所了解的那种社会状态，对马克思主义起了决定性的影响。”^④

应当说明这种社会状态的特点。在小生产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资本主义，利用了既没有斗争习惯也没有意识到自己阶级利益的工人阶级缺乏经验这种情况。工作日是极长的，也是极端令人疲倦的；工资低到最低程度；对女工和童工劳动的剥削成了普遍现象。梅里瓦尔^⑤在谈到美国奴隶主的棉花生产时指出，利物浦和曼特斯特都是建立在美国种植场里备受折磨的奴隶鲜血的基础上的。我们有更大的权利可以说，四十年来英国无产阶级为英国的富强作出了牺牲。这种可悲的社会状态产生了与此相适应的社会主义观点。“看来资本家之间非常尖锐的相互斗争，由于工人对天然的性缺少先见之明，一定会使得无产阶级的经济状况不断恶化。

① 乌斯宾斯基，格列勃·伊万诺维奇(1843—1902)，俄国著名作家。——译者注

② 吉芬(Giffen, Robert, 1837—1910)，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译者注

③ 舒尔采-格弗尼茨(Gerhart Schultze-Gaevernitz, 1864—1943)，德国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家，布伦坦诺学派信徒。——译者注

④ 《Le Mouvement Socialiste》[《社会主义运动》。——译者注]，1905年12月1日—15日，第395页。

⑤ 梅里瓦尔(Merivale, Herman, 1806—1874年)，英国殖民理论家，牛津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任英国殖民地常务次官多年。——译者注

另一方面，竞争是某种凶恶的力量，它不断摧毁资本家的队伍，自动地引起社会的改造，使社会从没有纪律的和无人领导的生产过渡到不大的一群资本主义生产者所建立的工业制度。在整个四分之一世纪中从葛德文^①到哈勒^②和汤普逊^③，这两个因素在英国反资本主义的文献中都得到了详细的分析，这时马克思还没有把当时的各种观察和学说系统化，也没有在《共产党宣言》中叙述它们，赋予它们简洁的形式。”

这个《宣言》所表达的思想，正确地反映着当时可悲的社会状态。不过请问：《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们对这种状态所作的预言是不是得到了证实呢？阿·拉布里奥拉绝对地肯定说：不，没有得到证实。

“在四十年间，而且在全世界 (et dans toutes les parties du monde)，工资增加了百分之三十、四十，有的地方增长了百分之五十。Index-Numbers(指数数字)表明：消费品的价格到处都下降了。经济危机(马克思起先认为它每隔五年必然出现，后来又承认每十年以后必然会出现)开始在一次和另一次之间以越来越长的间歇分开来。它们的影响越来越变成地方性的和有限的，同时这种影响只扩展到某些工业部门。仔细研究危机的本性，就可以看出：危机的产生是由于这个还太年轻而且还仅仅在追求比较稳定的适应性的经济制度缺乏平衡。较老和较合乎理智的(plus assagies)社会比起较年轻和较无节制的(et plus intempérantes)社会离开危机更远一些。的确如此。最猛烈最严重的危机最近二十年来出现在德国

① 葛德文(Godwin, William, 1756—1836)，英国哲学家、小资产阶级作家，无政府主义者。他的主要著作《政治正义论》已有中译本。——译者注

② 哈勒(Haller, Carl Ludwig, 1768—1854)，瑞士法学家和历史学家，农奴制度和专制制度的辩护人。——译者注

③ 汤普逊(Thompson, William, 1785—1833)，英国经济学家，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信徒。——译者注

和美国，即出现在这样两个国家：它们是按其产生的时间说比较年轻，因此也就比较倾向于某些工业热情的 (*plus portés à certaines audaces industrielles*) 两个资本主义机体。”

现在我们看到，《宣言》的作者们在哪一方面犯了错误。他们以为，——象阿·拉布里奥拉继他们之后用不能清楚思维的人的那种不清楚的语言所说的那样，——他们以为资本主义产生着罪恶的不断的进步。但这种看法也是不正确的：资本主义产生的罪恶在《宣言》问世以来的那段时期内一直在减少。在我们已知的自由竞争的良好影响下，工资一直在提高，至于说到工业危机，那么第一，它们变得越来越少了，第二，受到它们损害的主要是年轻的和无节制的社会（“年轻之过！”）；比较上年纪的、由于经验而比较聪明的、因之也比较理智的社会受它们的损害则越来越少。这自然是很好的，因为理智毕竟应该不但在天国，而且甚至在这尘世的生活中也都得到自己公平的“报酬”。然则在《宣言》关于向社会主义过渡所说明的观点方面，情况（由于整个这种“经验”）现在又怎么样呢？很糟糕！阿·拉布里奥拉说，社会主义预言的旧基础崩溃了，因为它原来纯粹是虚幻的东西 (*purement illusoirs*)。

完全可以说：连篇的废话。但是在这里，阿·拉布里奥拉替“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磨快了”的那件武器又在哪里呢？一点痕迹也没有，有的乃是“磨快了”来反对《宣言》作者们的武器。而这种武器是阿·拉布里奥拉从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主要是从舒尔采-格弗尼茨那里（参看他的两卷本著作 *«Zum sozialen Frieden»* [《论社会和平》。——译者注]）租借来的。我们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原来是现代资本主义辩护士的门徒。我不准备在这里考察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在他们“对马克思的批判”中所提出而阿·拉布里奥拉又继其后加以重复的那些理由在何等程度上是“虚幻的”。这一点我已经在收进《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这本论

文集中的几篇文章里谈过了^①。我只指出一点：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劝我们用阿·拉布里奥拉“磨快了的”武器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些改良主义者，在这种场合也体验到了“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所受到的同样的影响，因为除了最近二十年来各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用来反对马克思的那件武器以外，他们也没有任何别的武器。阿·拉布里奥拉也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他才说，按照他的意见，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新经验中同样得到自己的证实。他只是表达得不完全确切。“新经验”事实上在那里完全落空了；“新经验”实际上没有驳倒马克思，而是证实了马克思。但有一点却是对的：无论改良主义或者工团主义在最近几十年的资产阶级经济学文献中同样得到自己的“证实”——如果在这里只可能这样说的话！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是爱德华·伯恩斯坦的亲生兄弟。

常言道：告诉我你跟谁相好，我就可以对你说，你是怎样一个人。如果谈到文献，我建议换个说法：告诉我你不能理解的那个作者的名字，我就可以对你说，你自己是怎样的人。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理解不了阿·拉布里奥拉。这就告诉我们，上帝和自然给了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本人怎样一种理解的尺度。

我感到遗憾，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评价“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时闹出了这样的笑话。不过我更遗憾得更多的是：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至今既不理解他自己，也不理解我国很大一部分读者群众。人们都认为他是（他自己也真诚地认为自己是）迫不及待地拚命“向前”冲的、好钻研的智者；只是他还没有好好地分析过到底哪里是“向前”哪里是“向后”。哎，不懂事的毛孩子，象果戈理的瓦西里沙·卡施帕罗芙娜·错普车夫西卡关于自己的侄儿所说的那样。

^① 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617—682页。——译者注

而现在，我们的毛孩子至今还在“种种误会”之间徘徊着。过去他迷恋阿芬那留斯的哲学是误会。现在他钟情于工团主义者阿·拉布里奥拉原来也是误会。

不过我们且回到这个阿·拉布里奥拉上来。他再次指出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产生于同一历史经验后，为了使甚至脑筋最迟钝的人也看得清问题，便补充说：

“无论这个或那个（即依然是改良主义或工团主义。——格·普·）都否定了传统的社会主义公式，甚至（它们本身并没有发觉这一点）引证了同一个基本原理，但是它们从这个原理中作出了不同的结论。”①

这是对的！不过仍然不能不对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轻率表示惊奇，仍然不能不对他没有花点气力较好地了解一般说来意大利的工团主义的特点，特别是阿·拉布里奥拉的工团主义的特点表示惋惜。可是，阿·拉布里奥拉所暗示的，在运用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这两者所共有的基本原理时的那个差别在哪里？这可以用不多的话加以说明。

改良主义，——自然同样还有修正主义，因为这是同一个现象的两个不同的名称，——改良主义屈服于主张“社会”改良的资产阶级理论家的影响，夸大资产阶级国家干涉资本和雇佣劳动之间的关系的意义；它完全错误地认为这种干涉是达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主要手段。“革命的”工团主义屈服于现代曼彻斯特派的影响和复活蒲鲁东，因此起来反对国家，而且由于自己的无政府主义热情，以至有时甚至在国家干涉可能取消资本主义剥削某些对无产阶级有害的、虽然是本质的方面，从而给工人阶级带来一定的好处时，也拒绝采取国家干涉的手段。②它（同无政府主义

① 同书，同一页。

一起) 错误地认为破坏国家是达到无产阶级斗争的最终目的的主要手段。这也就是全部。在其余方面,——以及在主要方面,即在对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进程的观点上,——改良主义和“革命的”工团主义彼此是同一的。它们合起来就是类似一双手套那样的东西: 在某个意义上左手套同右手套是相反的。但这无碍于两只手套完全相似。

工团主义同修正主义是相反的。但它们的这种对立性是建立在它们内在的同一性的基础上的。头脑肤浅的人只看见它们的对立性, 却看不到它们的同一性。

作为理论, 阿·拉布里奥拉的工团主义只是“对马克思的批判”的一个变种。这种所谓的批判是同样的庸俗, 同样的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根本原理完全无知的基础上, 就象来自改良主义阵营的“批判”一样。这一点, 从我们在阿·拉布里奥拉关于最近四十年来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论文中读过的那些东西中已经很清楚地表现出来了。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东西中也可以同样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阿·拉布里奥拉承认: “它们共同的历史学的和心理学的 premise (即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共同的 premise。——格·普·) 可以表述如下: 因为经济过程的经验表明, 工业生产不一定同资本家与工人的社会分化现象联系在一起, 所以一切都归结为这样的问题: 应当沿着什么道路才会达到由工人生产者管理和直接领导的那种工业组

② 1907年6月29日到7月1日在斐拉拉举行的工团主义者代表大会上通过了(6月30日会议上)一项决议: 坚决摒弃现代国家在劳动和资本相互关系上的任何干涉(参看《L'Azione Sindacalista》[《工团主义者的行动》。——译者注]1907年第190号)。这个决议充满着无政府主义精神。的确, 发言反对它的有一位意大利工团主义理论家, 这就是恩利科·列昂奈, 他承认国家干涉有某种好处。但是人们没有考虑他的理由。这是容易理解的: 这些理由违反了他自己的理论。

织”。

不用说，我绝不会对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的文体负责。的确，他本人对我刚才摘录的这段话的文体所负的责任也应当承认是有限的，因为我是根据他的意大利文著作的法文译本翻译的。不过，我摘引的这段话所表示的思想就是这样，对待一个有这些思想的人，无论他用什么语言来表达，都终究不可能抱着别的态度，比如幽默的态度。已故的格·伊·乌斯宾斯基在他的为数不多的批评文章之一中指出过：存在着这样一种人，他们任何时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老老实实在地表达思想。这号人不会说：“砖头掉到地上”，而一定要用学者的口吻说道：“在重力的影响下，一定质量的物质接近地心到这样的距离了”等等。用格·伊·乌斯宾斯基的话说，这号人力求“用男低音思考”，正象自以为“成人”的另一些小學生力求用低音说话一样。阿·拉布里奥拉总是“伴着男低音思考”，因此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就觉得他好象“成人”了。阿·拉布里奥拉那装腔作势的男低音在整本书的字里行间嗡嗡作响；这种男低音也在现在引证的文章里，以及（顺便说说）在凡是谈到同时为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所固有的那些前提的地方都嗡嗡作响。这种装腔作势的男低音越是深沉，阿·拉布里奥拉就越是沾沾自喜。不幸的只是即使最深沉的“男低音”也没有能力用言之成理的内容来填充空缺。

“社会主义的必然性，——阿·拉布里奥拉嗡嗡地说，——不是由机械过程的进一步发展决定的，这个过程会自发地（brutale-ment）消灭大部分资本家，以适应少数财阀的利益，也会把开始由一些资本家管理、后来则由有组织的工人集体管理的广大的社会机体放在个体生产过程的地位上。”

这句话的意思当然很晦涩，不过其所以如此，只是因为我们的作者是“用男低音思考”。实际上这意思很简单：经验表明（即资产

阶级经济学家使得阿·拉布里奥拉相信。——格·普·), 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马克思讲过的那种生产集中根本不会实现。因此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完全不会推动社会朝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似乎不再是这一发展的必然结果。而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恰恰是建立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经济上必然向社会主义发展这个基础上,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原来是“虚幻的”。那还剩什么呢? 这个问题且让“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本人去回答吧。

“不过这个必然性 (即仍然是社会主义的必然性。——格·普·), ——他继续用男低音说道, ——是由有组织的工人的意志造成的, 因为工人确信, 支持资本家与工人之间的这种社会分化现象是无益的, 于是建立了新的社会关系总和, 结果就一定要导致资本主义的消灭。由此可见, 社会主义本身经受了唯心主义复活的辽远的影响, 而这种复活现象似乎现在可以在一切社会科学中看出来”。①

概括一下。先前,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作《宣言》的那个时代, 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是经济上必然的事情, 而现在, 半个世纪的经验使我们相信, 这样消灭的经济必然性完全没有了, 于是一切都仅仅取决于人们的意志。换句话说, 这里的意思就是: 先前, 在《宣言》的时代, 人们认为, 变生产资料为公有制将是人类意志的事业, 这种意志又是由资本主义发展进程本身决定的。然而半个世纪的“经验”表明, 这一发展的进程完全不是这样, 即并不是人们的意志在这个过程的影响下朝向了公有制。但是完全不应该因此而伤心; 相反, 应当对这一点感到高兴, 因为人们的意志本身走向和我们的愿望相符合的方向。连阿·拉布里奥拉的亲兄弟爱·伯恩斯坦也没有说过如此虚妄庸俗的胡言乱语!

① 同书同一页。

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这些议论中答应我们不涉及马克思的历史学说即历史唯物主义。然而使他迷醉的“批判”精神把他压服了，于是他向我们宣告了社会学中唯心主义的复活，即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破产。他对我们讲的是怎样一种唯心主义呢？就是这样一种唯心主义变种，它用人们的意识和意志来说明社会的历史发展。这是最差劲的一种唯心主义。谢林和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不是这样：他们懂得，社会现象的科学解释只有在人们的意识和意志能够解释为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的场合才会存在。这个道理，空想社会主义却不懂得，它认为人类意志和人类意识乃是社会历史运动的最后的、比其他一切原因都更深刻的原因。科学社会主义的主要功绩在于它发现了文明世界所面临的那种社会改造的经济必然性，对于这种社会改造空想社会主义只看作人类意志合乎愿望的努力的可能的结果。因此可以说，在自己的书中冒充马克思的真正的解释者的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论文中欢呼社会主义从科学观退回到空想观上去（不过一厢情愿而已）。我同意，“推翻”，哪怕只是想象中“推翻”科学社会主义，一定会使例如尼·卡列也夫教授先生高兴，他完全有权认为这是主观主义的复活。不过，这怎么能使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高兴呢？

猜吧，我亲爱的……

的确，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对于阿·拉布里奥拉这篇我们和读者一起现在为其内容叹为观止的、富有教益的论文，看来是没有丝毫理解的。然而俄国人民说得对：看鸟看飞。从《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这本书里只要读两第三章就足以想象出阿·拉布里奥拉在理解马克思主义方面同我国的主观社会学家们何等接近。

六

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书的第 135 页上写道：“马克思学说开始

了两个奇谈。第一个奇谈是：仿佛人类社会的进化通过机械自动的、几乎命定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始终向着数学上确定的方向……第二个奇谈可以看作从第一个奇谈中得出的实际结论。既然世界是自行发展的，所以没有疑问，有意识地和有计划地干涉它的发展过程是无益的。”

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正统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什么人断言过：人类社会的进化通过几乎命定的形式进行的呢？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和任何时候这样说过！第一个奇谈是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捏造的，是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家”虚构的。而拉布里奥拉先生却把这个奇谈算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账上。他说：

“马克思主义有了这样的概念，就会象那许多唯心主义学说之一那样，无论如何要给我们搞一个社会进化的具体公式。马克思主义同唯心主义体系之间的这种类似性，可以如此明显地在最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头脑中看出来。甚至普列汉诺夫也认为其所以能够赞扬圣西门，只是因为圣西门认为，从确切研究过的过去中可以得出关于未来的结论。圣西门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黑格尔作为最典型的唯心主义代表人物，他创立了整整一系列公式化的模型，这些模型应当确切地描绘出艺术、宗教、法律中永恒历史过程的本质”（同一页）。

最简单的礼貌心本来应当阻止拉布里奥拉谈论黑格尔，因为他对黑格尔的学说没有丝毫概念。我早已说过，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在历史观方面比那种在分析社会发展原因时没有超出人类意志、人类意识的肤浅的唯心主义要具有“科学形式”（用现在一些人的说法）得多，而我们的作者在其《意大利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就转到了这种肤浅的唯心主义的观点。在这里我不认为有必要再来长篇大论地谈这一点。至于说圣西门以及“甚至普列汉诺夫”的“十足的唯心主义”，那么他们那里发生了如下一件“不可

思议的事件”。

在对“甚至普列汉诺夫”加以责难的时候，阿·拉布里奥拉引证了我的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我在那里说道：

“以圣西门这个学识渊博的天才人物为例，就可以最明显地证明，这种观点（即“人的本性”这个唯心主义观点）有怎样的局限性，它怎样的不能叫人满意，它使所有持这种观点的人走进了怎样无法通行的矛盾的迷宫。圣西门用最坚定的信心说：‘未来是由一条锁链的最后一些环节组成的，这条锁链的最初一些环节构成过去。如果很好地研究过这条锁链的最初一些环节，那么确定以后的环节就容易了；因此，从很好地研究过的过去中很容易推出未来。’这是十分正确的。但是立即产生一个问题：根据什么理由把这个对历史发展各个不同阶段的相互联系了解得如此清楚的人算作空想主义者呢？不过只要你们进一步认识一下圣西门的历史观点，你们就会看到，把他称做空想主义者不是没有原因的。”^①

接着我指出，圣西门的社会观点浸透了唯心主义精神。阿·拉布里奥拉读了我的小册子，记住了涉及圣西门的地方，他绷着脸，用他那装腔作势的低音叱责道：“请看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走到了何等地步！甚至普列汉诺夫也不知道圣西门是十足的唯心主义者！”他的这个感叹来得如此突然，而且它本身又如此不可思议，所以一开始我被它弄得莫名其妙：我搞不清楚“此话从何说起”。只是后来我才猜想到，问题本来非常简单：阿·拉布里奥拉在自己的书的这一页上得出了一个信念，一个象他的其他许许多多的信念一样如此匆忙地得出的信念：唯心主义的本质在于承认社会发展前后阶段之间的因果联系。因为我觉得承认这一点正是圣西门的理论功绩，所以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认为必须最严厉地

^① 参看我的小册子的俄译本第9—10页[见《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文版第17页。——译者注]。

对我呵斥一番，以便最迅速地摧毁“第一个奇谈”。

如果我的揣测是对的，那么呵斥就不再是难以猜测的了。不过在这种场合下甚至也难以设想，一个敢于否定现在似乎已经被公认的那条真理的人，即否定现在由过去产生，它本身又孕育着未来这条真理的人，能够说出怎样奇特的怪话来。

但是无论怎么样，一个事实是：在这里，阿·拉布里奥拉至少有独创性的功绩（这就是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承认他有这个功绩并非无缘无故的！）。他的结论是：我们这些自认为“正统”并且以“正统”自豪的马克思主义者，其实根本不“正统”，因为我们传染上了唯心主义。这是新鲜事。我们的“批判家”中间暂时还没有谁责备过我们犯了这个罪过。但是拉布里奥拉的独创性是十分特殊的一类独创性。读者记得，在《意大利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文中，我们的作者满意地欢迎他认为无可争辩的事实：唯心主义对社会主义学说的影响在增长。现在他为我们所谓唯心主义而生我们的气。他的独创性就是最罕见的彻底性。虽说他责备我们的事过去任何时候都还没有人责备过，然而他对我们的了解并没有胜过比方某个时候批评我们的俄国主观主义者：卡列也夫、米海洛夫斯基、克利文科等人。因为这些人也坚决相信，按照我们的意见，“人类社会的进化通过机械式地自动的，几乎命定的形式进行的，而且始终向着数学上确定的方向。”“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①，甚至在看起来他们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的时候也是如此。

第二个奇谈！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以及我们“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中间什么人断言过：因为世界是自行发展的，所以人们对世界发展过程的任何自觉的干涉都是无益的呢？我们中间没有任何

^① “心有灵犀一点通嘛”。——译者注

人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点说过这个话。我们的“批评家”、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敌人之所以替我们这样说，是为了歪曲我们的思想。阿·拉布里奥拉到底凭什么要把这个“莫须有的谎言”硬加在我们头上呢？又只好莫名其妙，又只好搞一些多少或然的猜想。我觉得最可能的是这样一种情况。当阿·拉布里奥拉写下这里使我们感兴趣的那几行文字的时候，他——以闪电的速度从一种历史观飞到另一种历史观——坚持的正是他在《意大利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文中发表过的那个观点：人类的意志是社会运动最深刻的原因。是啊，对于一个坚持这种观点的人来说，“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应该是一种宿命论的学说嘛。又是“Les beaux esprits se rencontrent”，虽然看来他们是朝着完全不同方向；现在阿·拉布里奥拉再一次加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身上的正是过去我国主观社会学家对它提出的那个责难。

我们这位作者指出今天这种形态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多么糟糕以后，就力图证明正确理解马克思的思想时马克思主义应当是怎样的，我们必须向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学习如何正确地理解马克思。好啊，来学习吧。

他嗡嗡地说：“历史，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它的直接动力是人的意志和情感。其所以如此，主要因为社会环境的条件是限制个人和集体希求变动的一种惰性的物质、一种力量。”（第19页）

究竟谁怀疑人的意志和情感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动力呢？没有任何人。恩格斯在自己的小册子《费尔巴哈论》中写道：

“就个别人说，他的行动的一切动力，都一定要通过他的头脑，从而影响他的意志，才能使他行动起来。同样，市民社会的一切要求（不管当时是哪一个阶级统治着），也一定要通过国家的意志才能取得立法的承认。这是问题的形式方面，这方面是不言而喻的”^①（第44—45页）。

社会科学的全部问题仅仅在于：直接动力（人的意志和情感）是自己推动自己呢，还是这个直接动力应当是另外某个原因的间接表现呢？恩格斯在上述小册子中是这样说明这个问题的：

“不过要问一下，这个形式上的意志（不论是个别人的或整个国家的）有什么内容呢？这一内容是从哪里来的呢？为什么意志正是向这方面而不是向别的方面呢？”（同页）

马克思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应当到社会经济中去寻找，而经济的发展归根结底又是由生产力的发展决定的。阿·拉布里奥拉……他呀，照例在他无法解决的困难中无可奈何地挣扎着。

“社会环境的条件是惰性的物质。”很好！然而读者，请说说，什么是我们和你们周围的社会环境呢？这显然就是我们周围的人类社会。社会由人群组成。人的情感和意志是历史过程的直接动力。社会环境怎么会是惰性的物质呢？怎么会“因此”，即因为社会环境是惰性的物质，人的情感和意志才是历史的直接动力呢？此中奥妙，大矣乎……

或者，也许我没有正确理解我们这位马克思的唯一正确的解释者么？也许我的错误在于我说到社会环境的地方他本来是说的“社会环境的条件”么？假定如此，我且赶快来修正这个可能有的错误。

什么是社会环境的“条件”呢？

历史唯心主义者（象伊·泰纳^②）会回答你们说：社会环境的条件，这是特定环境即特定社会由以组成的人们的心理属性。阿·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4卷第247页。——译者注

② 泰纳，伊坡里特·阿道夫（Taine, Hippolyte Adolphe, 1828—1893），法国资产阶级文艺理论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他的名著《艺术哲学》有中译本。——译者注

拉布里奥拉很难理解，因为他自己就不理解自己。不过假定这一次他同意了历史唯心主义者的看法：要知道他就在不久前还欢迎过唯心主义在社会科学中的复活呢。那时我们会得出什么结果呢？我们会得出：“惰性的物质”是社会环境由以组成的人们的心理属性。这还是“不能自圆其说”。因此我们且用唯物主义来理解一下……“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的思想。

历史唯物主义说：首先必须把社会环境的条件理解为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结成的相互关系；作为社会发展的直接原因即最近原因的人的意志和情感，归根结底是由这些关系决定的。如果唯物主义地理解……阿·拉布里奥拉，那么有什么结果呢？结果就是：这位“杰出的理论家”又一次地在胡说八道。而现在，这胡说已经是加倍的了，如果不是三倍的话。

第一，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彼此结成的那些相互关系，无论如何不能称之为“限制个人和集体希求变动的惰性的物质。”诚然，这些关系决定着特定时代人们所可能的历史行动的界限。但是另一方面，也是由于这些关系才促使人们采取历史的行动。这到底算什么“惰性的物质”呢？

第二，只有连自己也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的人才会把在这一或那一过程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称为“物质”。要知道术语的使用那是有界限的。

第三，如果按照阿·拉布里奥拉在论意大利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文中向我们宣布的最新观点，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根本不可能是经济必然性的事情，而是在不以经济为中介的人们的意志的影响下完成的^①，那么要知道，这就是说，人们在

① 如果阿·拉布里奥拉在这篇文章里承认人的意志应当以经济为中介，那么他把旧的、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同新的、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就会失去任何意义。

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是“惰性的”或“非惰性的”，就同按照自己直接的意志的决定而处在这些相互关系中的人们之为“惰性”和“非惰性”是一样的。这到底算什么“惰性的物质”呢？
Loin de là①！

第四，接受阿·拉布里奥拉先生的唯物主义解释——在这个场合下即是接受社会环境的条件这个术语——，就等于完全抛弃阿·拉布里奥拉，而且坚决地转到这同一个无与伦比的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对之进行过彻底审查的那个“正统的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来。

第五，……不过足够了！我们看到，从“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那里，我们暂时还学不到什么东西。现在看一看，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从他那里会发现什么。

在另一个地方我们从他那里自然会发现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我们听说，“历史是人们的受制约的②意志的产物，是他们自觉的、为实在的现实所限制的努力、热情和意愿的产物，而人们是按照周围的社会环境和物理环境的特点形成的”（第18页）。又是社会环境！不过先前，有其条件的这个环境是“惰性的物质”，而现在它却成为由社会人的意志所制约的因素。这是“两个很大的区别”。可是如果阿·拉布里奥拉在那里说得对，如果历史运动的直接动力即人的意志本身是受制约的，即是间接表现的，那么我们又得同样坚决地回到“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回到阿·拉布里奥拉重新审查它以前的那个样子，我们还要恭恭敬敬地对我们的“理论家”说，如果意志是由社会环境制约的，那么他在《意大利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一文中把唯心主义的社会主义同唯物主义的社会主义对立起来，把人的意志同经济必然性对立起来，就应当承认是

① 根本算不了！——译者注

② 着重点是我加的。

最明显最无聊的谬论。

人的意志受社会环境的制约。然则社会环境又受什么“制约”呢？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学说所回答的问题。如果在另一个地方欢迎唯心主义复活的阿·拉布里奥拉在这里承认历史唯物主义正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他同意社会环境的发展由生产力的发展所制约，那他为什么攻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正是这样讲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呢？“何事起喧哗”？不得而知！

七

在《意大利的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文中，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坐在唯心主义的椅子上；在《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中，他企图坐在卡尔·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椅子上，甚至自封为马克思学说唯一正确的解说人。不过要正确地解释某个人的学说，首先应当理解它。而这一点，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可没有做到，因为他根本不理解马克思。他说：“历史唯物主义最困难的理论问题之一，正是个人的和集体的意志努力为一方，同特定社会制度的内在规律为另一方之间的组合”（第145页）。

阿·拉布里奥拉先生这里所说的困难，某个时候在社会的和历史的文献中确实存在过。不过十九世纪上半叶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已经把它克服了。历史唯物主义利用了德国哲学的理论遗产，所以它不可能认为在这个已经解决的课题上有任何困难。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家们从课题的答案为已知出发^①，事实上就很少再来讨论它了。然而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就把一些不熟悉德国哲学思想史的人搞糊涂了。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对于伟大的德国唯心主义者，只知道他们是唯心主义者，而且知道得很少！他以应当得

^① 关于这一切请看我的《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一书。

到更好的幸运的顽强精神闯进开着的门，而且总是绊着了门坎，失去了平衡。

他问自己：我们有没有权利假定特定社会制度的内在规律，可能会被人们按照他们预先想好的计划所破坏或改变。对于这个问题他给自己的回答是这样的：

“在某些场合下，自然有权利。当社会制度进入批判时期，就是说，当社会制度产生了一个由于自己存在的特殊条件而或多或少关心于改造现存社会结构的阶级的时候，这个阶级的知识界在某种程度上就会作为进化的动力起作用。人们的计划，意志和意图会提出它们的要求；最后，个人可能对社会进化的方向起决定性的作用。当一个特定的制度濒临崩溃，而另一个制度开始诞生的时候，人的意志就会对社会的命运获得在情况的正常过程中它绝对不会具有的那样强大的力量。”

历史是人造成的，而人的意志和意识则受社会关系的制约。如果这是对的——阿·拉布里奥拉先生本人，虽说只是暂时地，虽说用了极不清楚的形式，也还是承认这一点的——，如果这是对的，那么在人的意识（和意志）同社会关系发展的规律之间就不可能有任何矛盾，因为意识和意志正是朝着社会关系客观发展进程推动它们走去的那个方向。这是非常简单的真理；然而一些天赋不高或者被某些教条主义偏见弄瞎了眼的人却不懂得这个简单的真理。我们的作者也属于不懂这一简单真理的人士之列。他甚至料想不到，人们给自己“绘制”的那些“计划”本身，归根到底是社会发展“内在规律”活动的产物。因此他仍然无法理解人们的有计划的活动怎么可能给予社会合乎规律的发展以反作用。对于他说来，很有特色的一点就是：他认为人们有计划的活动只不过表现为他们破坏或改变“特定社会制度”的规律罢了。而任何特定社会制度的基本发展规律都在于：社会制度从本身中产生出自己的否定，或

者如果高兴的话，也可以说，从本身中产生出自己的变化和破坏。可见，如果人们的特定阶级改变特定的制度，换句话说，如果特定的制度在特定阶级的人们有计划活动的影响下改变了，那么，这种情况之所以发生，不是因为人们摆脱了这个制度的基本发展规律的影响，而恰恰是因为他们服从了这种规律。阿·拉布里奥拉先生得出的结论是：人们的有计划的活动只有在一些时期，即在他称之为危机的时期才能影响社会的发展。在这里，他又是一团糟。如果我们同意象圣西门那样分为危机时期和有机时期（唯心主义者圣西门在某件事情上还是有用的哩！），我们就必须说，在危机时期，先进社会阶级的意志是要消灭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而在有机时期，它就要巩固这些关系。也就不过如此罢了。谁不理解这一点，他就不知道马克思主义的起码常识。

而因为拉布里奥拉先生显然不懂得先进社会阶级的意志怎么可能促进特定社会生产关系的巩固，所以，他得出一个结论说，人的意志只有在特殊的时刻才能够取得“对社会命运的强大力量”，而“在正常的情况过程中”它就根本不会具有这种力量。这样的失误只能说是由于庸俗的历史二元论。这种二元论用一条深深的和长长的鸿沟把人的意志同社会发展的客观进程分隔开来，鸿沟的两边只是在有的地方才用一些桥互相连接着，“不正常的情况过程”就可以从桥上通过去。从现代历史一元论（即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来，人的主观意图——他们的意识、他们的意志、他们的计划、他们的情感——只不过是同一过程的一个方面罢了，这个过程的另一方面乃是社会关系的客观发展过程。但是，同阿·拉布里奥拉先生讲历史一元论是完全无益的：何必对牛弹琴①。

很可能（可以进一步说：无疑的），某些改良主义者在他们同工团主义者争论时都把“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描绘成荒唐可笑的样子，就象阿·拉布里奥拉在他的书里向我们绘出的画像那样。然

而到底凭什么叫“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替改良主义的理论罪过和一切别的罪过负责呢？改良主义根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恰恰相反，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否定！况且我们已经知道，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否定，按其精神跟对它的别一种否定最为近似，这别一种否定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便是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先生。然而如果这是对的，如果象我上面所说的那样，爱·伯恩斯坦是阿·拉布里奥拉的亲兄弟，那么为什么把马克思主义拉进他们的家庭纠纷？各斗各的吧，外人不参与……

我们曾经看到，我们这位作者企图把自己打扮成马克思理论唯一正确的解说人，他遭到了最不光彩的惨败。也许他本人感觉到：扮演这样的角色对他是不合适的。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他越来越暴露出自己对蒲鲁东的不能自己的向慕。在自己最后一本著作《La 'Commune' di Parigi, raccolta di otto conferenze》

① 在这个场合，自由派的庞塔勒奥尼再一次把他搞糊涂了。在199页上拉布里奥拉宣称：“我们完全按照经济生活的基本规律来理解社会主义。从这些规律中，我们知道，生产诸因素（在这种场合下就是劳动）的报酬，不是依赖人的意志，也不依赖立法对经济过程的干涉，而是依赖劳动生产率，依赖劳动供应本身的条件，依赖资本增长的程度，依赖工人发展的程度，以及一般说来依赖经济平衡的所有其他条件。经济过程是由它本身的有机规律决定的，这规律不可能随人任意破坏。”谁使阿·拉布里奥拉相信，劳动报酬（即工资。——格·普·）不是依赖人的意志，而是依赖劳动生产率呢？不是任何别的人，而是资本主义辩护士庞塔勒奥尼。庞塔勒奥尼一伙人（帕累托②等等）故意把经济规律同工人提高自己劳动力价格的意图对立起来。谁承认这种对立可以容许；谁同意在正常的情况的过程中工人阶级的状况完全不依赖它的意志，他实际上就不会有任何别的选择，只好在不正常的时刻以前，在社会革命以前，把人类意志的胜利搁置起来。这个无稽之谈的涵义是这样的：如果不预先设法去掉一切种类的曼彻斯特主义，即去掉旧的英国自由贸易派一类以及最新的意大利“纯经济学”一类的曼彻斯特主义，就不可能担当起解释马克思的任务。

② 帕累托(Pareto, Vilfredo, 1848—1923), 意大利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1893年任洛桑大学政治经济学教授, 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义先驱者之一。——译者注

(Lugano 1907)①中，他直接承认，他认为蒲鲁东主义是完善的和正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 (una perfetta e precisa teoria del socialismo proletario) (第71页)。在那里他完全正确地补充说，今天的革命的工团主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蒲鲁东的复归 (Il sindacalismo rivoluzionario dei giorni nostri è in gran parte in ritorno a Proudhon) (同一页)。由于这个有趣的自白，我谨向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致以最真诚的祝贺。

一旦手里拿着《La“Commune” di Parigi》这本书，我就不想同它分手，除非弄清楚了书中对我们这位“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说来很有特色的如下一段话。

阿·拉布里奥拉说，马克思很严厉地评判了蒲鲁东。然而他的这种严厉的评判应该重新审查。一般说来，马克思很不喜欢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竞争者 (sic!)②。他同维利希斗争过，同魏特林斗争过，同巴枯宁斗争过，同斯·穆勒③斗争过，同拉萨尔斗争过，也就是说，同所有的社会主义大著作家斗争过。他同恩格斯的亲密友谊是一个真正的心理之谜，而德国社会主义者长期地把出版马克思传记搁置起来这样一种情况使这个谜变得特别突出 (messo in rilievo dalla circostanza)。为了尽力解开这个心理之谜，我们这位马克思的唯一正确的解说人自动提出了这样一条深思熟虑的见解：马克思很穷，而恩格斯很阔。此外恩格斯写下了遗嘱，把自己的财产交给马克思的女儿们。(Da notare: Marx era molto povero ed Engels molto ricco. Inoltre Engels lasciò eredi della sua fortuna propria figliole di Marx) (第72页)。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妙得出奇的想法，给关于马克思私人生活的这个最天才最

① 《巴黎“公社”，由八篇讲稿汇编成的论文集》(罗加诺，1907年)。——译者注

② 原来如此！——译者注

③ 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斯·穆勒并不是社会主义者。——译者注

高贵的谜保留了位置。评论是多余的……

因此我不再祝贺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了：大概他自己现在也对阿·拉布里奥拉先生所表现的这种不可饶恕的轻率作风感到遗憾。

八

讨论阿·拉布里奥拉是枯燥的，甚至是非常讨厌的：不管从智力方面还是从道德方面他都根本不使人觉得有味。但是还是应该讨论他，因为无论他的智力怎么可怜，无论他的知识积蓄怎么贫乏，无论他的个人道德怎么卑鄙，他事实上却是——而且不单单在意大利是——最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之一。法国谚语说得好：国内皆眇盲，独眼龙称王。

我们现在要说明一下，我们的作者是怎样看待他在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时如此大吹大擂的那个“社会革命”的。我要事先告诉胆小的读者：在这个革命中根本没有任何可怕的东西。

“就象基本的马克思主义原理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把一切连续的社会改造都算在通过自发发展的道路进行的经济改造的账上。①社会主义的基础和本质，这就是从最近的和偶然的目的一比较远大的目的的工人组织。社会革命的气压表，这就是同现代社会相矛盾的革命意识的发展，即正是在职工的工团中所获得的那种意识的发展。工人阶级对生产的自动领导（其实这就是通常用富于表现力的词语称之为社会主义的凯旋的那一切）只有通过工会组织不断干涉经济过程才会实现。个别工业部门工人的工团夺取这个部门的生产工具的革命行动决定着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而这一行动又是同职工的工团有义务实现的整个生活的

① 提醒读者一句：同一个阿·拉布里奥拉先生感到高兴的是唯心主义在现代社
会学中的复活。

其他一切活动直接联系着的”(第 200 页)。

胆小的读者可能觉得是一场令人惊悚的社会灾难的那件事，仔细看来不过是“职工组织对经济过程的一系列连续的干涉”而已。然而改良主义者根本没有任何想法要反对这种“对经济过程的干涉”。恰好相反，他们需要这种干涉，而且他们中间某些人，例如在意大利极为有名的列·比索拉蒂^①，就在连续“干涉”的基础上建立起一整套社会改造理论。比索拉蒂和阿·拉布里奥拉之间的区别在哪里呢？区别只在于：列·比索拉蒂需要的是国家方面的干涉，而拉布里奥拉需要的是工团方面的干涉。和平的改良主义和革革革命的工团主义原来又是——可叫天真的人惊讶不止——最亲最亲的亲戚。

总之，“社会革革革命”不过是“对经济过程的一系列连续的干涉”。这一点也不可怕。而阿·拉布里奥拉 à la^② 的“革革革命者”应该是可怕的，他也希望是可怕的。因此我们的“理论家”又一次给自己戴上红色的弗利季亚式的帽子^③。他指出“革革革命的”时刻主要是他称之为决定性打击的时刻，它的特点就是工团掌握特定工业部门的生产。对这件事，读者，您终于害怕了吗？放心吧，在这里事情也不是您想象的那样糟糕。当然，拉布里奥拉现在不可能预言这种夺取生产工具的过程是怎样发生的；不过他能够“甚至预见它是通过工团租借生产工具的形式进行的（这种租借很快就会变成纯粹的剥夺），或者通过用酬金赎买的方式进行。然而无疑的是，不论租借也好，赎买也好，或者直接夺取也好，——所有

① 比索拉蒂(Bissolati Leonida, 1857—1920), 意大利社会党创建人和该党改良主义极右翼首领之一。——译者注

② 之流。——译者注

③ 弗利季亚帽，是古代居住在小亚细亚西北地区的弗里季亚人戴的帽子。这是种锥形高帽，尖顶向前倾折，通常为红色，象征自由。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党人曾用来作为帽型。后世遂以为革命者的标志。——译者注

这些可能彼此同时发生,也可能一个接着一个相继出现,这取决于每一个个别场合的那种情况是否需要”(第 202 页)。

问题不在于人的头上戴了一顶弗利季亚式的帽子,或者别的什么装饰品,而在于他的头脑中有什么。阿·拉布里奥拉先生的头脑中“预见”到对生产工具的夺取是通过租借方式出现的。蒲鲁东再一次发挥自己的作用了:社会“革革革命”原来是契约。喏,契约中当然没有甚至会使胆小的人觉得可怕的任何东西。这个“预言”的滑稽可笑,只有我们弄清楚“革革革命”策略的主要特点依我们社会“革革革命家”看来是些什么的时候,我们才理解它的全部深度。因此有必要认识认识这些特点。让“革革革命家”来讲话吧。

“使旧有的机体瘫痪——这就是革命过程的任务之所在;用停止血液循环来打击中心——这就是革命策略之所在”(第 27 页)。

以下阿·拉布里奥拉用几页来总结自己对革革革命和革革革命方法的说明,他说:

“现在,看来我们已经能够解决应该怎样理解革命和革命方法的问题。我们看到,革命(如果考虑它的形式上的过程)就在于消灭旧的国家机体,同时在这里,最主要的与其说是通过怎样的道路(是立法呢,起义呢,还是兼此两者呢)达到这个目的,不如说是事实本身。革命以国家为对象,以破坏国家为目的”(第 33 页)。

你看多么强烈的情感!“破坏国家……”“停止血液循环……”“使旧有的机体瘫痪!”我们这位阿·拉布里奥拉先生简直是个迷人的伙计,甚至是超人!而如果他是迷人的伙计,甚至是超人,那么我们这位贵族女学生式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怎么会不爱上他呢?不过迷人的伙计和超人一心只想着自个儿。女学生对他有了意思;可他对女学生却没有意思;他没有白白地通过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蒲鲁东和典型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的学校。在

普·普·通·通·的·写·字·纸·上·“破·坏·国·家”，“停·止·血·液·循·环”，“使……瘫·痪……”以后，他把这些印·花·纸·储·存·起·来，然后走到公·证·人·那·里，缔·结·“租·借”契·约、“赎·买”协·定。对于这种·人，可以用涅·克·拉·索·夫·的·诗·句·问·问·他，不过把诗·词·稍·微·改·动·一·下，

你是要想实现，
什么罪恶诡计，
是想破坏国家，
还是……单单缔结协定？

“严肃的”人也许要责备我，说我在嘲笑阿·拉布里奥拉。“严肃的”人是不对的；马克思早就非常严肃地说过：嘲·笑·可·笑·的·东·西，这也就是对它采取严肃的态度。

可是，如果“严肃的”人一定要我“用学者的方式”谈谈杰出的工团主义理论家，那我也不反对这样做。

“用学者的方式”来谈，应该说，阿·拉布里奥拉由于他那所在皆然的习惯，在这里也并不理解“政治组织”同“公民社会”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他没有想到，如果消灭其一，我们也就会“瘫痪”其二。他“破坏国家，又保存公民社会的法律制度”。也就因为这个，他去找在国家的废墟上幸免于难的公证人；也就因为这个，他使自己变得极端可笑；也就因为这个，我想对他说：你们那里没有谢德林，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先生！……

阿·拉布里奥拉扯起嗓门大声疾呼地反对改良主义者。但是我们和读者早已知道，“革命的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有血亲关系，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是爱德华·伯恩施坦的亲兄弟。因此，我们和读者在《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一书中读到如下的几行话就不奇怪了：

“所谓改良乃是实现革命理想的手段。（你们和改良主义者之间的“形式上的”区别在哪里呢？——格·普·）革命，如果可以这

样说的话,是从经济过程内部冒出来的,是从无产阶级在生产的外部环境中顺利地实现了一系列的改造中冒出来的;革命会使工人们最后借以夺取经济企业的那个坚决行动缓和下来。谁也不能预见这个时刻恰恰在什么时候来到。唯一可以预言的就是:它只有在工人达到高度的发展水平和教育水平这个保证社会向前运动的必要条件的时候才会到来。因此,工团主义运动的主要任务就在于发展工人在技术、智力和道德方面的品质,使得他们有能力担任各种社会领导职务”(第203页)。

把生产资料变为社会所有制,其前提是有这样一个高度发展的工人阶级,它有能力担任各种社会领导职务,这一点谁也没有否认过,谁也不会否认它。但是,现代工人运动的主要任务毕竟不在于为工人之参加各种社会领导职务作准备。用人为的方法是无法把任何人培养得能够进行这种领导的。运动的主要任务在于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发展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第一,向无产阶级说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第二,向它指出这些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固有的那些倾向;第三,使它懂得,为了(依据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所固有的倾向)用消灭这些关系的办法来解放自己,它究竟应当做些什么。我们看到,拉布里奥拉所宣扬的理论在所有这三方面都完全是无能为力的。就是因为这个道理,这些理论(即一般说来工团主义,具体地讲就是我们的作者所宣扬的这种工团主义)一旦在无产阶级队伍中间传播,就必然会使它的阶级觉悟模糊起来,而无助于提高这个觉悟。也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我们应当象同类似于它的改良主义理论作斗争那样,坚决的同它进行斗争。

Pour la bonne bouche^①, 我请读者再注意一点。按照拉布

① 最后才是妙着。——译者注

里奥拉的“预见”，在不同的工业部门，工团在不同的时间掌握生产（“工团掌握特定^①工业部门的生产”，第201页）。因此，拉布里奥拉式的社会革革命是按部分实现的。同一个作者写道：“关于特定社会组织的部分改变的可能性的思想……对我们说来，乃是改良主义的心理基础”（第196页）。这真好极了！真不赖，“理论家”！

九

阿·拉布里奥拉从弗·科尔伯的论文《谈总罢工问题》中引用了下面几行话，这篇文章登载在1904年德文的修正主义杂志《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②上：

“我们完全指靠事物的有机发展，并且用一切手段力求影响它的发展和加速发展的过程。我们的健全的策略建立在已有理论认识的进化的基础上。从这里必须大胆地得出进一步的结论，并且弄清楚我们的策略和灾变论之间存在的矛盾。Hic Rhodus, hic salta^③，这就是我们的意见分歧的基本点”（第9页）。

对此我们的作者大声嚷道：

“相信‘事物的有机发展’需要放弃任何革命的影响。如果驱散笼罩在这种空谈头上的典型德国式的浓雾，那就会发现，社会主义制度原来是自行到来的”（同上页）。

所有这些话根本不对。相信事物的有机发展本身还根本不需要放弃任何革命的影响，只要假定革命影响本身是“事物有机发展”的产物就够了。要知道连小孩子也懂得这个道理！如果驱散笼罩在德国修正主义者的议论周围的“浓雾”，那就只会发现，他们根本不懂得进化和革命之间的关系，而且因为不懂这个道理，他们才

①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② 《社会主义月刊》。——译者注

③ 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译者注

断言，只有进化的概念符合事物的实际进程，而革命的概念则是某种虚构、“不科学的”体系。凡是思想清楚的马克思主义者都应当全力反对由于德国修正主义者所谓的对马克思的批判而造成的那种概念混乱。但是为了同这种混乱作斗争，首先必须自己懂得进化跟革命有什么关系，而我们的作者并没有做到这一点，他在此书的全部篇幅中为改良同革命的区别何在这个问题毫无结果地挣扎着。他在这个问题上糊涂到何等不可救药，下面一段不长的摘录可以说明。

他在第25页上写道：“事实上不可能认真地谈论革命的目的，并把它们同非革命的目的对立起来。社会的任何最终目的，就它不同于实在的现实来说，本身已经是革命的了，换言之，它本身就带有否定的性质。但是不能肯定说，无论什么样的目的都决定了应用完全特定的手段的必然性。革命是一种手段，正如立法、信念的力量和道德动机是一种手段一样。革命是用来实现特定的意图的。同时它完全不依赖于目的是否将会达到”（第25页）。

简言之，这就是说，“革命”概念不可能当作目的，因为革命是手段。假定是这样；我们且记住这一点，并且继续读下去。在第37页上，我们遇到这样一段说明“十八世纪法国人”的观点的话：

“他们的观点可以包括在下面的话中：专制制度的本质在于君主自由地处置社会上的一切。当这个制度还有力量的时候，任何拟议中的人民监督大概都会变成监督的幻影。至于说到贵族，那么，难道这个阶级的特权不正是以承认人为的和继承的特殊权利为基础的那个制度的根本吗？当这个阶级还保持着合法的、国家承认的存在的时候，它的影响始终会以这种或那种形式表现出来。从这个观点出发，十八世纪的法国人已经不可能停留在单纯地减轻罪恶的思想，而是相反，他们一定要得出必须根除罪恶的结论。对于他们说来，问题不是这个制度的缺点，而在于制度本

身，问题不是对政权机关信任的多少，而在于这个政权本身，一句话，问题不是改善现存的制度，而在于摧毁这个制度。”

由此可见，当问题谈到某种社会罪恶的时候，人们对它可以提出两种不同的任务：或者仅仅减轻它，或者把它完全消灭掉。如果整个的这一社会制度都是罪恶，那我们就可以说，在第一种场合下人们给自己提出的目的是改良，第二种场合则以革命为目的。而如果把改良同革命对立起来（拉布里奥拉先生在他的书的几乎每一页上都是这样做的），那么，跟同一个拉布里奥拉相反，我们可以有充分的权利说，革命可能正是目的，而且作为目的，它同改良是对立的。这就意味着，拉布里奥拉在第25页上所说的完全推翻了他在第37页上所说的话。然而拉布里奥拉并不停留在他在这一页所说的话上；在自己的书的另一些地方，他再一次挣扎着，不过却在新的意义上。试试吧，照着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劝告，拿起阿·拉布里奥拉“磨快了的”武器同修正主义者和改良主义者作斗争吧，那时，除了最荒唐的概念混乱，什么结果也不会有。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天真到了顶，竟想使读者相信，意大利工团主义的“巨大功绩”（sic!）“乃是机智地分清了改良主义的和革命的方法”（第260页）。不用说，卢那察尔斯基先生的跋文是批判地对待阿·拉布里奥拉一书的好指南！

在阿·拉布里奥拉讲到马克思的所有的话中，正确的只有一点：改良主义者完全徒劳地宣称马克思主义 *par excellence*① 是和平发展理论。不过就是在这里（在这里，一个可以思考的人看来很难犯错误），工团主义“杰出的理论家”也放出了最稠密的“浓雾”。此其一例：在《资本论》中，他（即马克思。——格·普·）发表了“两个权利之间的争论只能由力量来解决的观点”（第156页）。马

① 主要。——译者注

克思的确发表过这样的观点，而在马克思以前还有黑格尔也发表过。不过请看一看拉布里奥拉是怎样评述这个观点的。

马克思提出这个见解是在讲劳动日那一章里。资本家力求延长劳动日；工人则希望缩短它。作为劳动力买者的一方有理由，作为劳动力卖者的另一方也有理由，各有各的理由，而在平等的两个权利之间，争论只有由力量来解决。关于这一点拉布里奥拉写道：

“《资本论》的这个地方，对于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确定暴力的作用来说是极为珍贵的。作为根本的原理，我们有一定的劳动日。存在着两种互相对立的企图：一方面要扩大劳动日的限度，另一方面则要尽可能地缩小它们。这就有了斗争，结果是劳动日缩短了。但是这个结果应该归功于什么呢？力量的优势。从这里又产生一个新的经济学原理，这个原理在习惯影响下开始被当作规律。因此，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一样，都是所向无敌的强制力的结果。有条件的暴力产生经济学原理的基础。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第150页）。

《资本论》中的这个地方，无论从经济学意义还是从历史意义说，事实上都是很重要的。不过阿·拉布里奥拉是否正确地理解了它呢？

什么“力量”决定着资本家和工人之间关于劳动日长度的争论呢？显然，首先是互相斗争着的各阶级的那些经济力量，其大小决定于特定时期特定社会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一般性质和这些关系的发展程度。试问：修正主义者或者改良主义者中间谁肯定过，工人和企业主之间的争论不应当取决于互相斗争着的各阶级的经济力量呢？没有，没有这回事。因此，用不着把《资本论》的这个地方当作反对他们的方法的论据塞给他们。

然而关于劳动日长度的争论，也可以通过国家干涉来解决。当然，国家干涉本身乃是每一个特定社会中力量对比的结果。但

是这种干涉同“革命的方法”毫无共通之处，这一点，我们这位大声反对改良主义的革命工团主义者应当好好理解。因之也就不能据此保卫“革命的方法”。

最后，应当同意，在某些例外场合下，关于劳动日限度的争论可以由工厂主害怕自己工人的“暴动”（捣毁机器，损坏建筑物等等）这个简单的情况来解决。不过，只有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初阶段，在工人阶级很不觉悟的状况下才会发生这样的事，而马克思在谈到解决劳动日限度的争论的那个力量时所指的显然不是工人暴动，不是捣毁机器，也不是损坏建筑物。

这是什么呢？阿·拉布里奥拉先生怎么能够援引《资本论》的这个地方来证实他所谓马克思根本不是仅仅拥护和平发展的人这个其实完全正确的思想呢？这答案简单得出奇。拉布里奥拉把力量(Gewalt)一词译成了暴力(意大利文作violenza)①。因此他得出了结论：关于劳动日限度的争论是由暴力决定的，因之也就是由工厂主和工人之间的打架决定的。就算马克思认为甚至象关于劳动日长度的争论这样的利益冲突也由打架决定，那么，很明显，资本主义社会的全部历史就是一场连续不断的革命(revolution en permanence)，很好地研究过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马克思就不能不重视暴力在人类历史上的重要作用。Eins, zwei, drei! Geschwindigkeit ist keine Hexerei! ②

什么是有条件的暴力(更确切些说：受约制的暴力；意大利文是

① Gewalt一词在《资本论》中我们感兴趣的这个地方法文翻译为force(力量)，而不是violence(暴力)。参看《Le Capital》[《资本论》——译者注]第1卷第101页。俄译者也是这样理解Gewalt一词的，参看《Капитал》，第1卷圣彼得堡1899年版第175页。然而阿·拉布里奥拉认为，把它了解为打架的意思更加恰当些。关于力量同暴力的关系，参看我的小册子《暴力和力量》，奥·卢滕贝格女士译自意大利文。

② 一、二、三！手脚快没有什么巧妙！——译者注

la violenza condizionata)?《资本论》中上述地方怎么会得出经济规律和政治规律一样都是所向无敌的暴力的结果呢?这颇难理解,在这里又使人感觉到阿·拉布里奥拉的思维上有一层稠密的“浓雾”。

在解释马克思关于暴力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过程中可能的作用的学说时,阿·拉布里奥拉说:“我认为恩格斯对革命的著名观点不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更有甚者,我倾向于认为,现在,经过八年的时间,恩格斯本人就难以写出他在《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著名序言中说过的话。这篇序言只是在德国局势的影响下和在已经迅速改变了的条件下写成的”(第160—161页)。接着他补充道:“不能不承认恩格斯的著作对群众的情绪,因此也就对社会的进步有抑压的影响,但是直到现在还没有引起哪怕是稍微详尽的反驳。这本著作是最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实际倾向的著作之一,而马克思主义过去是而且将来永远是作为社会进步因素的伟大的力量哲学、天才的精神暴力的理论”(第162页)。

对此我首先要向拉布里奥拉“著作”的俄译者(自然也向俄译本的编者)提出一点意见。在这里“精神暴力”一词是毫无意义的。意大利原本印的是:violenza intelligente,意即:合理的即合乎目的的暴力。

不过拉布里奥拉是在这里敲打已经开着的门。早在1900年,法文《Socialiste》就登载了恩格斯给保·拉法格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出,著名的《反杜林论》作者考虑了德国当时特殊的条件,坚持了合法主义,对于他的某些德国同志对他的观点所作的那种不适当的广泛解释是很不满意的。在我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二版序言^①中,我敢说我对这个问题作出了“详尽的”解答。这里再重复说明就不必要了。

阿·拉布里奥拉深信，我们大家都应当回到“没有普选权(!)和没有议会制”的马克思，即“回到48年和71年的马克思”那里去(第199页)。这自然是明显的而且又是双料的胡说，没有任何必要对这一点进行解释；我们最好来谈谈阿·拉布里奥拉怎样看待工团同社会主义政党的关系这个问题的。

十

用他的话说，工人阶级的政治活动应当从工团这些反映工人全部生活的现实单位出发。“同它们一起，——他说，——社会主义政党作为脱离现时真正的工人组织而独立的机构，逐渐变为多余。起先，当我们还站在不觉悟的、自私自利的和为穷困所压抑的工人阶级面前的时候，社会主义政党实际上是无产阶级全部夙愿和希望的象征。而现在，当工人已经开始表现自己的主动性的时候，党就必须俯首听命，并成为那些承认参加选举运动为适当的工人的工团的简单的选举组织”(第207页)。

在这里，拉布里奥拉——应该给他说句公道话——是十分诚实的。一个确信蒲鲁东的学说是最完善最正确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理论的人，不可能作别的推论。不过我们已经知道，任何个别的工团、任何工团联盟都不能取代工人阶级的政党。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党代表着整个无产阶级的普遍利益。它的事业正好应当是使资本主义所有制变为社会所有制(而不是变为工团所有制)。因此把党的作用归结为“简单的选举组织”这种思想，在我们看来不过是从完全错误的理论前提中得出的正确的结论^②。考察阿·拉布

① 参看国外版：在俄国出版的看来作了某些删节。[见《阶级斗争学说的最初阶段》一文，《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564—568页。——译者注]

② 原文为 *правильным выводом* (正确的结论)。疑为 *неправильным выводом* (不正确的结论) 之误。——译者注

里奥拉这些错误的前提是整个我这篇文章的目的，我不再回头讨论它们，而只限于分析我们的作者为了保卫他关于党的作用的观点所提出的某些次要的理由。

他肯定说，作为两个种类不同的组织的党和工团的存在，有可能造成政治和经济之间分裂的危险，这种分裂反过来又会是党政治上腐化堕落的根源。“一般说来可以看出，——他说，——正是在政党和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着更加紧密更加经常的联系的地方，比方象德国的情况那样，党的生活就更加健全。甚至社会主义政党一般也难免不政治上腐化，尽管在它那里，政治和经济之间，‘思想’的信徒和这种思想应当表现其利益的那个阶级的成员之间，无疑是有更多的联系的”（第 204 页）。

完全正确，任何政党同它所代表的那个社会阶级之间存在的联系越是紧密越是经常，这个政党的生活就越是健康。这一点在我们俄国特别需要记住。因为在俄国，由于各种不利的历史条件，工人阶级和它的政党之间的联系到现在一直都是不牢固的、不完全的和一般说来不能令人满意的，党内生活中许多很不健康的现象都可以因此得到说明。但这完全不是反对本来的政党的理由。政治上腐化是非常不受欢迎的。然而不受欢迎不光只是政治上腐化而已。在北美工会的“领导层”中可以看出许多极不健康的现象。这些“层”不止一次地应该对这些有充分的权利可以归入“腐化”一类的行为负责。然而要知道，北美工会的“领导层”根本不是政治组织。就是说，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政治同经济的关系，而在于“领导层”同被领导的群众的关系，也可以说，这里的问题既在“政治”，又在“经济”。这种关系远非始终也远非到处都是它应当是的那个样子；它甚至往往是完全不正常的；不过我再说一遍，不仅在政治组织中，而且在纯粹经济组织中，这种关系也往往是不正常的。很明显，不正常的关系一定要被正常的关系所消灭、所代

替。然而从这里还完全得不出阿·拉布里奥拉所推荐的党和工团之间的那种关系就是正常的这个结论。恰好相反，这种关系原来是完全不正常的，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关于这种关系的思想本身是建立在完全错误的前提上的。

最最有意思的是：当问题讲到工团同党的关系时，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就开始用工团主义者的语言说话。的确，他的最后结论不象工团主义者从自己的议论得出的那些结论。然而毕竟很有特色的是：在这一类议论方面，卢那察尔斯基先生若干时期以来同工团主义者是步调一致的，他在这里也完全没有走错脚步，——一句话，他是作为很有前途的新兵……请原谅，是作为刚入门的工团主义者行进着。

他写道：“工团联盟是工人阶级组织的自然形式。这里组织起来的正是阶级本身，即无产的生产者本身。

“党是思想体系的联盟，这是一些信仰一致的人。知识分子、小市民、甚至资本家都可以做社会主义者，也就是说，都可以成为党员。

“结合为工团的是经济地位的共同性，结合为党的是思想体系的共同性。

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站在什么立场上呢？是站在思想体系、传统的纯洁性之思想体系前提上呢，还是站在经济前提即阶级地位上呢？”（第 253 页）

拿自己不充分熟悉的题目来讨论的那些思想家，他们的思想体系是特别动摇的。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这种场合无疑属于他们一类，因为他把社会存在和社会思维两者之间的关系解释得很糟糕。

不是思维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思维。这是无可怀疑的。在这种意义上，我们马克思主义者的确是站在“经济前提即阶级地

位”上。然而为存在决定的思维本身又是存在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力量。存在越是发展，它在自己的历史运动中所达到的那个阶段越高，对于它的进一步发展说来，它所决定的思维就变得更加必要。存在所决定的思维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作用是特别重要的。就因为这个道理，轻视思想体系特别在马克思主义者中间是不能容许的，是不可原谅的和有害的。马克思主义者应该知道和记住：按照他们的历史理论，“意见”、“思想体系”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存在决定的，因此任何特定的思想体系都适应着一定的社会存在状态，最后，当社会存在的发展把掌握关于这一发展进程的正确意见并且准备为了无产阶级的利益而积极参与这个进程的那些人团结为一个政党的时候，无产阶级就在这个党的身上（这个党的活动乃是不自觉的历史过程的自觉表现）取得了自身解放的绝对不可替代的武器，无产阶级的运动也就达到它的全盛时期。

马克思说，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这句话的意思不是说，工人阶级一切形态的斗争都是政治斗争，而是说这种斗争的最高形态是政治斗争，是以“思想体系的共同性”为基础的政治斗争，即以对运动的最终目的的共同观点为基础的政治斗争。

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应该重视“思想体系的纯洁性”，他们之所以不能不是“不能容忍的”，乃是因为在他们看来，存在是由思维决定的^①，而对于存在的进一步发展又是必需的，——总之，因为他们不是折衷主义者，不是“主观主义者”，不是修正主义者，也不是工团主义者。

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所鄙视的“思想体系的纯洁性”证明（大家知道，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在思想体系方面远不是“纯洁的”），要

^① 按原文是如此（быт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мышлением），疑为：“思维是由存在决定的”（мышление определяется бытием）之误。——译者注

使无产阶级能够把自己的“经济前提”同其他阶级的“经济前提”划清界限，正确地理解“经济地位”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只能对党要求“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工会则一定要接受各种工人参加，即使他们还没有提高到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的水平，即使他们还不明白无产阶级运动的最终目的，而且暂时还只限于进行改善出卖劳动力条件的斗争。不这样做就不合理，因为那就会分散无产阶级的力量，从而削弱他们反资本的阵地。无怪乎施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根据我的建议）在—项关于党和工会的关系的决议中决定：绝对不应当忽视工会活动的统一性。

正是因为捍卫“思想体系的纯洁性”（顺便说说，这也就意味着确定运动的最终目的）是党的使命，而不是工会的使命，所以运动的领导者不应当是工会，也不应当是工会联盟，而应当是党。

但是我知道，人们可能把我这句话的意思了解得完全相反，甚至简直会按照乌格留姆—布尔切也夫^①的方式来了解，就象我国布尔什维克习惯于了解这类问题—样。

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方式进行领导。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正象我们已经知道的，他不以“思想体系的纯洁性”为“根据”，而以“经济前提”为“根据”）也曾希望“社会党善于培植，来得及培植工团主义运动……并且向它阐明道路”（第257页）。不过我不象他那样来了解这件事情。

使他痛心的事实是倍倍尔主张工会中立：在他看来，中立意味着“削弱工会内部的社会主义宣传”（第251页）。但这是一个错误。宣传是党的事情，而工会中立丝毫不会妨碍党以其所能有的全部力量进行这种宣传。

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指出，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也坚持工会中

^① 乌格留姆—布尔切也夫是谢德林的作品《—个城市的历史》中的—个笨头笨脑、鼠目寸光的官员的典型人物。——译者注

立。这是完全正确的，可惜它所证明的根本不是卢那察斯基先生想要证明的东西。

修正主义者捍卫工会中立，其目的在于使工会变成反对党的堡垒（党重视他们所讨厌的“思想体系的纯洁性”）。修正主义者说“工会应当中立”、意思是说，“应当利用工会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斗争”。所以，这里的争论实际上就在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所——用法国人著名的说法——“鄙弃”的那个“思想体系的纯洁性”。所以，为了同修正主义者进行斗争必须紧紧依靠“思想体系的纯洁性”。取消工会中立在这里是无济于事的。即使我们使工会在形式上紧紧地从属于党，可是党内修正主义者的“思想体系”占了上风，那么，取消工会中立就只会是“马克思的批评家”的一个新的胜利。

十 一

为了开导读者，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从埃克（即耶克）^①引用的马克思致国际各支部的函件中摘录了两段话。他认为这两段引文十分重要，它们实际上也是十分重要的。而广大的读者却很少知道这个包括两段引文的函件。因此我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从这个函件中摘下来的两段引文完整地抄录如下。

第一段引文：“工会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工人阶级组织的中心（1866年写的），象中世纪的城市公社过去是资产阶级组织的中心一样。如果工会在资本和劳动之间日常的游击战争中是消灭工人互相竞争的绝对必要的手段，那么更加重要的是工会的第二个属性——即工会是能够消灭雇佣劳动和资本统治这个制度本身的一种组织力量。”

^① 见《国际》一书。

第二段引文：“工会过分专门地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在反对资本的直接斗争上，它们还不完全了解自己的活动在反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斗争中的意义；它们对一般的社会政治运动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但是近来它们开始懂得了自己的伟大历史任务。”马克思号召工团主义者“学会作为自己阶级的组织中心而自觉地进行活动，支持一切能够实现自己阶级的目的的社会政治运动，并且把自己看成是工人阶级积极的先进的战士。这样他们就可以使得一切劳动居民阶层都注意他们的策略，并且可以说服最落后的工人相信他们的目的绝不包含任何狭隘自私的东西，而是相反，他们的目的在于解放一切受压迫的群众”。（埃克：《国际》，“知识”出版社第59和60页）①

我觉得好象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之所以引用这两段极其重要的话，部分是由于想给工团主义者以友好的帮助这样一个对他说来十分自然的愿望。当然，工团主义者在同不大内行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很容易利用这两段引文达到自己的目的；不过在这个场合下，甚至马克思关于工团能够消灭雇佣劳动制度所说的这些话也不会把内行人弄糊涂。

自然能够！当然不会！但是怎么样呢？整个问题都在这里。而对这个问题马克思早在《国际》的第一篇宣言中就已经回答过了。他在那里说道，有组织的工人的伟大责任“在于夺取政权”②。换句话说，组织为工会的工人应当去建立政党，这个政党要完成的任务同工团主义者推荐工人去做的工作是截然相反的，就是说，提到首位的并不是“破坏国家”，因之也不是破坏国家政权，而将是夺取这个政权。光是这一点就已经包括了对工团主义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谴责。

① 参看耶克：《第一国际史》中文版第52、53页。——译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34页。——译者注

不过这是题外的话；主要的是我想把卢那察尔斯基先生引证的两段话拿来同下面第三段也是从马克思那里引来的话作一番比较：

“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们无论如何不应当同政治团体联在一起或依附于政治团体。如果不这样做，那就是说，它将受到致命的打击。工会是社会主义的学校。工人在工会中会变成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每天都在同资本进行斗争。所有的政党，不问派别如何，都只是在短期内鼓舞工人群众；反之，工会则牢固地和长期地同工人群众联系着。只有工会才能造成真正的工人党，也才能使工人的力量同资本的威力对抗。绝大多数的工人不分党派都认为物质状况一定要改善。只要工人的物质状况得到改善，他就更有可能致力于教育自己的子女；他的妻子和儿女就不必到工厂去找事做，他本人就有更多的可能努力使自己在精神和身体方面得到发展。那时他就会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虽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这段话是从马克思同德国工人运动的一位活动家的谈话中摘录下来的。这篇谈话登载在1869年社会民主党的《Volksstaat》^①上。可见，它同卢那察尔斯基先生据以引用上面这两段话的那个函件恰恰是属于一个时期。密切注意《Volksstaat》的马克思对该报复述自己的这些话并没有做任何修正。这证明他认为他的谈话是传达得正确的。他这篇谈话的中心内容是什么呢？

首先就是工会应当中立。

有人反驳我说^②：西欧当时的形势和现在不一样。这是对的。但是差别在哪里呢？最主要的差别是现在已经不能说：一切政党

① 《人民国家报》。——译者注

② 今年八月当我在施图加特把这篇谈话的情况告诉考茨基的时候，他就这样反驳过。

都只在短期内鼓舞着工人；反之，工会则牢固地和长期地联系着他们。现在有一个牢固地和长期地鼓舞着觉悟工人的政党。不过现在（而且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是如此），甚至许多按其觉悟还不能参加党的工人也认为一定要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工会必然要比党“更加广泛”：它应当把工人提高到党的水平。既然工会应该比党“更加广泛”（就我所指出的意义而言），那么使它从属于党是有害的。

因此有理由认为，马克思要是还在的话，也会主张德国工会中立。自然，他所谓的中立是倍倍尔所说的中立，而不是修正主义者所讲的中立。至于俄国，那么他大概会重复说，在这里，“如果工会想完成自己的任务，它就不应当同政治团体发生联系或者依附于政治团体。”原因很明显：在俄国，“政治团体”太多了，俄国还没有象西方那样的党，而如果各个工会都想使自己依附于俄国为数众多的“政治团体”的话，那么它们就不得不分裂成许多部分，象我们在西疆地区所看到的情况一样，这对工会的事业是最大的危害。

但是，这自然完全不是意味着党本身在对工会的关系上应当守中立。不，它不应当始终守中立；它应该采取一切措施在组织为工会的工人中间传播自己的思想。只有在这个条件下它才会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责任：在组织为工会的工人追求最终目的的运动中成为他们的领袖，而同时又不强制、不破坏、不损伤、不分裂他们的这些工会。

我不得不说出很多使阿·拉布里奥拉先生不愉快的话。临别之前我愿意称赞他一句。在他的书的第106页的注释中，他说道：“革命主义和选举的不可容许性之间的联系，如果不是无聊的把戏，就是纯粹的虚构”。这句话很聪明，所以我很愿意向“布尔什维克们”和安·卢那察尔斯基先生介绍这句聪明的话。一般说来，学习是有益的；此外，向你自然而然产生同情的那些人学习，也是愉

快的。

第二篇文章

恩利科·列昂奈和伊万诺埃·波诺米^①

恩利科·列昂奈：《工团主义》。格·基尔德措夫译自意大利文，附作者给俄文版写的序言，斯·多罗瓦托夫斯基和亚·查卢什尼科夫出版社，莫斯科1907年。Ivanoe Bonomi, *Le vie nuove del socialismo*. 1907. Remo Sandron, editore. Milano Palermo, Napoli.^②

一

恩利科·列昂奈是“革命的工团主义者”；伊万诺埃·波诺米是“改良主义者”。在意大利，象在所有的地方一样，“改良主义者”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在许多方面彼此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他们互相敌对。不过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已经说过，他们是亲兄弟，尽管他们互相敌视。只要用心读一读我上面抄下了书名的那两本书，就足以相信这个思想是正确的。的确，这两个互相敌对的兄弟，各有特殊的气质；但他们气质上的差异并不排除他们有相同的面貌。而且不只面貌相同；他们出生在同一个家庭，长期接受同样的影响，有许多相同的意向。凡是一般对全世界工人运动的状况

① 波诺米(1873—1951)，意大利国务活动家。意大利社会党右翼首领之一，1912年被开除后，另组改良社会党。第一次大战期间是社会沙文主义者，历任部长、政府首脑、议长。——译者注

② 伊万诺埃·波诺米：《社会主义的新道路》。1907年。米兰，巴勒莫，那不勒斯，桑德隆出版公司版。——译者注

和进程、特别是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状况和进程感兴趣的人，只要更仔细地看一下他们的“家族的特点”，那是大有裨益的。感谢阿·拉布里奥拉的书，我们已经部分了解他们了。不过第一，油不坏粥，第二，在恩利科身上我们遇到了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的另一个变种，它在某些方面比阿·拉布里奥拉所代表的那个变种还更有特色。因此我们现在来研究一下列昂奈，并且比较比较他的观点同改良主义者波诺米的观点吧。

我从列昂奈开始。首先我要指出一点。恩·列昂奈称自己的翻译者是他的天才的朋友（作者给俄文版写的序言，第Ⅲ页）。我不反对说基尔德错夫先生有天才，不过为了公道，我要说，他把自己（当然也是很天才的）意大利朋友的书翻译得并不那么好。不是说他歪曲了列昂奈的思想；不是的，在这方面译文在大多数场合下是忠实于原作的。但是列昂奈的思想被基尔德错夫先生译成了某种奇怪的语言，不仅充斥着外来的语词，如 «концепция»、«ситуация»^① 等等，而且到处是简直可笑的错字。例如在第35页上我们读到：“它（即改良主义。——格·普·）实际上不可能把任何肯定的东西同关于阶级斗争的规律对立起来。”原文是：“alla legge della lotta di classe”（第48页）。这意思是：“阶级斗争规律”。恩利科·列昂奈这里的说法也是很不当的（一般说来他极少有这种情况），但他毕竟没有象基尔德错夫先生强迫他的那样说得如此荒谬，因为阶级斗争规律——如果这种规律存在的话——同关于阶级斗争的规律距离之远，正如万有引力定律与关于万有引力的定律之间距离遥远一样。据我们所知，甚至谢德林的彭帕杜尔分子^②中间暂时还没有一个人颁布过关于万有引力的定律。同样，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颁布过基尔德错夫“天才的”译本中谈到的

① «концепция»（概念）、«ситуация»（形势），是两个从法语音译过来的俄文词。——译者注

那个关于“利己主义”的规律。对于这个问题也没有任何参议院式的“解释”^②。这种邈邈的不规范的语言有什么用处呢？还有比这种语言更糟糕的东西哩。在基尔德错夫先生译本的第113页上谈到“提香的高里塞，在这里多神教徒的灵魂表现出傲慢的残酷精神”。我敢请基尔德错夫先生相信：任何地方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什么提香的高里塞（тициановский Колизей）。列昂奈说的是“Colosseo di Tito”（第114页），即 Колизео Тита，而这完全是另一回事^④。看来这也许是微不足道的事情，不过这一类在任何著述中都不雅观和不能容忍的小事，在讨论工人读者特别感兴趣的问题的那些著作中，就特别的不能容忍。本来应该用双倍细心的态度对待这样的读者，而在我们这里，我们“天才的”作者们和译者们却根本没有想到他们。特别是译者！看一看西方社会主义作家们的著作的俄译本吧，你们对译文质量极为拙劣会惊讶不止的。的确，这里也有一些出色的例外情况；但这恰恰是仅仅证实一般规则的例外。而这个规则之有损于读者的利益，这一点看来是不言自明的。

至于列昂奈的书的内容，那仍然是《同志报》（1907年12月7日第443号）上的弗·托特先生感到很满意的。弗·托特先生在

② 彭帕杜尔是十九世纪俄国著名的讽刺作家谢德林的《彭帕杜尔和他的女人们》中的主人公，是昏聩的、刚愎自用的大官僚的典型。——译者注

③ “参议院式的解释”（сенатские разъяснения）：当时俄国执政的参议院尝为国家杜马代表选举法的许多条文作出解释，经过这番解释，条文就变成了相反的东西。——译者注

④ 普列汉诺夫这里的意思是说基尔德错夫翻译错误。提香（Тициан Вечеллио，Tiziano Vecellio，1490—1576），天才的意大利画家，威尼斯画派最大的代表人物。高里塞（Колизей，Colosseo），半圆形剧场，古罗马宏大卓越的建筑物，供斗兽、斗剑和马戏表演之用，建于公元一世纪。而列昂奈的原意是“蒂都的大剧场”。蒂都（Tito）是一世纪罗马弗拉维王朝的皇帝。Collesseo 即为蒂都所建造。——译者注

他讨论此书的一篇短短的书刊评介中说道：“恩·列昂奈是最深刻的，同时也是最广博的工团主义理论家。说他广博是因为他完全不否定代议制，也不把工会限定为将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组织”。我暂时不来谈生产者的这种或那种组织能否替代“资本主义制度”，即能否替代特定的生产关系总和这个问题。这一点下面再讲。我得承认：托特先生对列昂奈此书的这种赞扬的评论使我大为惊讶，因为我在这本书里所看到的既不是深刻的也不是广博的观点。而且不单这本书如此，一般说来，恩利科·列昂奈别的著作也都这样。他的著作使人感到兴趣的地方不是它们的积极属性，而恰恰只是它们的消极属性。它们的消极属性确乎是非常之大的。不过要知道评论家先生并不是因为这一点才称赞列昂奈的啊……

二

只要弄清楚恩·列昂奈是怎样理解所谓社会主义中的危机的，就足以判断他“思想的深刻”了。下面就是他论到这种危机时所说的话。

据他说，危机“出乎意外地在历史和批判面前暴露了 (sic!)^①，因为伯恩斯坦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挑起了论战，切尔凯佐夫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科尔纳利森在荷兰、万-科尔在丹麦、安塞尔在比利时挑起了论战”(第13页)。

让我们暂时来谈这一点吧。到现在为止我们都以为，在理论方面“危机”在于：自封为马克思的学生的某些社会民主党人开始“批判”自己的导师。原来我们搞错了。“危机”不在于批判，也不是批判引起的：它只是“在批判的面前”暴露了。这的确是出乎意

① 原文如此！——译者注

外的。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我们从列昂奈那里知道，荷兰人万-科尔在丹麦“挑起了论战”……，而切尔凯佐夫先生在“俄国社会主义者中间”进行了同样的论战。我们的“思想深刻的”作者显然把这位无政府主义者当作了马克思过去的学生。他对科尔纳利森也犯了同样的过失，因为科尔纳利森还在“危机”开始以前就牢牢地站在无政府主义立场上。由此已经可以看出，列昂奈对“危机”的报道是多么的好！不过往下他还更好地暴露出他的“广博的”知识。他说：“社会主义运动最卓越的发言人现在已经公开地承认：资产阶级社会的大灾难，即两个敌对阶级之间的最后搏斗……不过是‘毫无意思的幻想’。长长的数字系列和无穷的三段论连锁很殷勤地证明了，社会主义者的批判和学说的最积极的预言被社会过程的进化本身推翻了……多么讽刺啊：旧的原则被它们的保护者本人给推翻了”（第14页）。

您可以看得出来：在这里已经绝对无可怀疑的是，我们的作者把无政府主义者切尔凯佐夫和科尔纳利森当成了“社会主义运动最卓越的发言人”和遭到批判家先生们“重新审查”的学说的“旧原则的保护者”，即当成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保护者”。切尔凯佐夫先生做了这些原则的保护者！再也不可能想出比这更滑稽可笑的事情了！必须对上述原则很内行，才会犯类似的错误。可以想象得到，这样深知这些原则的人讲到“社会主义中的危机”时能够说出怎样的胡言乱语来！

在社会主义实践方面，恩·列昂奈也是同样内行的。在自己的书的第10页上，他肯定地说：“有光荣历史的‘国际’给我们留下了1863年日内瓦代表大会的决议作为它的最后遗嘱，在决议中”如何如何。列昂奈究竟指的哪一项决议，对我们并不重要；对我们说来重要的，而且（这是读者容易了解的）重要的是1863年“国际”没有通过任何决议，原因简单：那时它还没有建立。这个著名的

工人协会举行的日内瓦代表大会不是在1863年，而是在1866年，这也不是它最后一次代表大会，而是第一次代表大会，因此会上通过的决议决不可称为它的“最后遗嘱”。这些错误如此粗鲁，如此不能原谅，而且如此难以置信，所以坦白地说，我在读完谈到日内瓦大会的几行话以后就想起，在这里是不是列昂奈“天才的朋友”基尔德错夫先生弄错了什么，因此找来了原本。但是，这一回查阅再次使我相信，俄译者虽然笨拙和草率，然而一般说来还是忠实地传达了意大利文作者的思想：在原本中我发现了同一个1863年和同一个“最后的遗嘱”（ultimo atto testamentario）。当然，基尔德错夫先生可以改正这个错误。不过，要改正这些或那些错误，首先必须看出错误来，而要看出错误，就应该了解所论的那个对象。而这一点嘛，看来是不能要求于我们“天才的朋友”的。他没有研究过这个对象，他只是满足于认识认识他天真地以为似乎是西欧无产阶级运动的“最后一言”的那个东西。于是他就着手把这个“最后一言”翻译为（确切些说：呆译为）俄文，并且用所有的逻辑“珍珠”和历史“钻石”把它装饰起来。他无力改正自己朋友的错误，不管是在这位朋友谈到国际的那个地方，还是在我们读到如下一段话的那个地方：“这些德国社会主义者毫不拘束地用社会民主党的名义称呼自己的党为逻辑的噪音，这种逻辑噪音很象同一个马克思在《内战》中因为法国1830年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精神以及参加革命的社会成分的极端复杂而如此尖酸刻薄地加以嘲笑的那次社会革命”（第21页）。可是，不，请等一等：在这里看来基尔德错夫修改了某些东西。原本中说的不是1830年社会革命（这种革命不曾发生过），而是同一年的社会民主派。当然，这也是胡说，因为1830年的法国根本没有社会民主党，但列昂奈毕竟没有说基尔德错夫先生强迫他说的话：所以，在这里很可以看出类似修改未遂罪的某种东西。同样的未遂罪也表现在抹去列昂奈这里所引证

的那本马克思著作的书名——*Lotte civili*，即《内战》，这大概就是《*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①；而代以马克思的另一本著作的书名：《内战》，即论述巴黎公社的《*法兰西内战*》。^②不过这种根本不是由于通晓业务、而是由于名称上简单的语音近似所造成的不成功的修改，彻底毁坏了一切，因为在《*法兰西内战*》这本小册子里对 1848—1849 年法国社会民主党根本没有任何嘲笑。简言之，两个“天才的朋友”中谁也没有达到“天赋的高度”……

附带说说，现代国际社会民主党同 1848—1849 年称为社会民主党的那个法国党根本没有任何共同之点。至于“逻辑的噪音”，即恩·列昂奈关于社会主义概念同民主概念完全不一致的那个思想，那么在这里，通过他的嘴巴说话的是蒲鲁东、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和其他无政府主义理论家。

三

恩·列昂奈本人认为，必须“细心地分析社会主义在学理方面所出现的危机的内在内容”（第 18 页）。这无疑是对的。然而为了判断“学理”方面出现的危机，必须懂得“学理”，而我们已经看到，很难指望列昂奈有这种知识。但是无论怎么样，我们且听听，按照他的意见，“危机的内在内容”是什么。

他说：“社会主义的危机，一般地否定了马克思认为将迟早要自动地导致用暴力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那种增长着的对抗的存在”（第 19 页）。

① 《*法兰西阶级斗争*》。——译者注

② 这里的意思是说：列昂奈本来引证《*法兰西阶级斗争*》，但是他写成 *Lotte civili*，没有打书名号；基尔德错夫却误译成《内战》。这两本书都是论述法国国内战争的，不过前者论述 1848 至 1850 年的内战，后者论述 1871 年内战。——译者注

总之，马克思肯定了，而“危机”（即科尔纳利森在荷兰，万-科尔在丹麦，切尔凯佐夫在俄国挑起的“危机”）则否定了会自动导致消灭资本主义的那种社会对抗的增长。危机的内在内容也就在于“危机”对马克思所肯定过的东西的这种否定。很好，虽然不是很有条理。可是在这场争论中到底谁对呢：马克思，还是危机？关于这一点，恩·列昂奈是这样说的：

“我赶紧对最初的社会主义的修正主义^①这些议论的无可指摘的严格性表示自己的敬意，主要是对它作出这些声明的勇敢精神和毫不勉强的态度(!)表示敬意。实际上，如果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没有这样起作用(sic!)^②，象马克思对它(?)预言过的那样，即它所朝的方向不是在资本所有者和穷苦工人之间掘开越来越大的鸿沟，因此也就在数量上增加关心于消灭资本主义的劳动者阶级；如果和马克思的预言相反，有产者的数量越来越增长，而资本和劳动之间利益的对抗，由于工人工资的提高，受到了很大的削弱，——如果这一切实际上都是对的，那么看来由此不可抗拒地自然会得出如下的结论：受到日益增长的对抗这个虚幻的怪影鼓舞的旧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策略，整个地遭到了破产。正当生活的事实本身准备夺去阶级斗争脚下一切基地的时候，‘虔信的’社会主义者仍然留在不可调和的阶级斗争基地上的种种努力看来一定会是徒劳的”（第15—16页）。

您懂吗，读者？我也——不懂。一方面，修正主义者的议论是逻辑上无可指摘的，对此我们的作者赶紧向他们表示自己的敬意；而另一方面，只是“看来”这些议论是逻辑上无可指摘的，因此，大约应该把列昂奈所表示的敬意当作只是看似的。这就弄清楚了吧！不，无论修正主义者的逻辑性怎么样，列昂奈先生的逻辑性却毫无

① 着重点是列昂奈先生加的。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希望是糟糕的：他不善于使自己的议论前后一贯。

列昂奈先生继续道：“由此不难理解，为什么敌人们高兴得这样不断地搓手。幸运的是敌人们把影子当作物体；他们认为，思想和学理中的危机乃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业和过程遭到破坏的原因和理由”（第16页）。

这好象会使我们走出困惑莫解的境地：修正主义者的议论是无可指摘的；然而如果以为这些逻辑上无可指摘的议论可以破坏“社会主义运动的事业和过程”，那就错了。假设我们的作者想说的正是这一点。然而要知道我们和他现在讲的不是“社会主义运动的过程”，而正是“学理”；要知道列昂奈先生自己承认必须“细心地分析社会主义在学理方面所出现的危机的内在内容”，而且本人就邀请我们这样做。于是我们也希望响应他的邀请，于是我们也企图“细心地分析”；于是我们就来问问他：“在学理方面”究竟谁是对的呢：马克思，还是逻辑上无可指摘的和为此受到我们的作者尊敬的修正主义者呢？但是要从他那里得到这个问题的详细答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写道：“一切东西，从价值理论开始到辩证方法，从资本集中化规律到周期性危机的学说，从剩余价值体系到对社会主义不可避免性的经济唯物主义证明，——一句话，在这以前一直是最权威的 and 得到普遍承认的社会主义学派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一切组成要素，现在都遭到了无情的破坏”（第14页）。

这几行话好象使人有理由认为，列昂奈先生认为修正主义者们提出来的反对马克思学说的那些“批判的”理由是极为令人信服的：如果他们不仅企图破坏马克思的学说，而且事实上这样做了，如果他们破坏了这个学说的全部理论基础，那么很清楚，真理就在他们一边。

不过，另一方面，同一个列昂奈也写下了这样几行话：“改良主

义^①一般无法从它所掌握的统计材料中得出会同资本集中化规律背道而驰那样的原理；它只得出了这样的结论：这个集中化不是以马克思预言过的那样速度实现的”（第 35 页）。

马克思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预言过资本集中化的速度呢？他的预言到底是指那个国家呢？列昂奈先生没有提出所有这些问题。他没有工夫干这样的芝麻小事，——算了吧！然而要知道，不管怎么说，无可怀疑的是：如果修正主义者无法推翻“资本集中化规律”，那就可以得出结论：真理（至少在这方面）不在他们一边，而在马克思一边。

再问一次：我们到底应该怎样看待社会主义中的危机？谁是对的：马克思，还是他的批判家们？

四

我们必须从列昂奈先生那里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用他的话说，“修正主义企图粉碎马克思的学说，其方法是：第一，驳斥马克思所预言的财富集中化，证明他关于劳动条件恶化的原理（贫困化理论）不能实现，第二（不是第三吗？——格·普·），举出资本家人数增加的事实”（第 35 页）。

我们已经知道列昂奈先生是怎样看待资本集中化问题的。现在看一看他对“贫困化理论”的想法。

“日常生活的普遍改善和工资水平的提高，——他说，——还不能作为推翻劳资间日益尖锐的对抗的规律的充分理由……根据格弗尼茨^②和纪德^③的研究和用工人本人的话说，工资的提高是

① 列昂奈先生在这里把改良主义与修正主义等同起来了，他这样做自然有充分的权利。

② 即格哈尔特·冯·舒尔采-格弗尼茨。

③ 沙尔·纪德(Charles Gide, 1847—1932)，法国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折衷主义者，鼓吹小资产阶级“合作社会主义”。——译者注

工人阶级努力同资本进行直接斗争的结果。因此工资的提高说明最近二十年来劳资间的斗争日益尖锐化了，说明斗争的形式表现为越来越强调工人的组织性、人数和纪律的力量，即强调马克思所叙述的那些因素的力量。总之，马克思的预言不是被生活驳倒，而是为生活充分证实”（第 36 页）。

结论是：在这个场合，真理在马克思一边，而不在修正主义者一边。如果列昂奈先生自己不违反逻辑，如果他那个“因此”本身哪怕有一点逻辑根据，那就又根本弄不明白：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批判家”先生们似乎无可指摘的逻辑性实际表现在哪里呢？不过问题也就在于：我们的作者这里的议论完全不正确。

第一，从“贫困化理论”观点看来，重要的不是工资提高了还是降低了，而是决定工人剥削程度的剩余价值率是提高还是降低了。如果获得同样工资的十个工人，以前用自己的劳动一天内创造了等于 A 的价值，其中 $\frac{1}{2}A$ 以工资形式留给了工人，而 A 的另一半就成了剩余价值，则此剩余价值率为 50%。如果现在同一些工人创造出等于 $A + \frac{1}{2}A$ 的价值，其中 $\frac{3}{4}A$ 作为工资交给工人，而其余的 $\frac{1}{4}A$ 作为剩余价值为企业主所得，那末这个剩余价值率就仍然和以前一样等于 50%，就是说，它仍然是不变的，尽管工资提高了。最后，如果在同一时期工人创造的价值等于 $2A$ ，他们以工资形式获得 $\frac{3}{4}A$ ，则企业主得到 $A + \frac{1}{4}A$ ，这就是说，工资的提高无碍于剩余价值率的提高，即无碍于工人剥削程度的提高。而工人剥削程度的提高等于他们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相对恶化。因此，这里使我们发生兴趣的问题的全部实质就在于解决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是向着无产阶级社会地位相对恶化进行，还是相反，向着相对改善进行。列昂奈先生所引证的格弗尼茨，以及许多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肯定说，情况正是走向改善①，而马克思主义者则证明，工人的社会处境在相对恶化，尽管他们的工资（货

币工资,甚至还有实际工资)有升高的趋势。这就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敌人向他们提出责怪的“贫困化理论”。至于马克思本人,那么他的“批判家们”跟在格弗尼茨和许多其他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之后把工人阶级境况绝对恶化的理论硬说成是他的思想。但这是十足的臆造。马克思一点也不怀疑工人境况相对恶化,在《资本论》第一卷中,他从理论上说明了这种现象。而关于工人境况的绝对恶化,他任何地方也没有肯定地表示过意见,看来他只是假定在一定的时间和地点的条件下有此可能。他在同蒲鲁东争论时写道:

“经济学家们……证明了,在现存的生产条件下,资产阶级的财富在增长,并且还应当更大地增长。至于工人阶级,那么更大的问题是他们的状况是不是因社会财富的增加而得到改善^②。经济学家们为了替自己的乐观主义作辩护,就拿英国的棉纺织工业工人为例,他们所看到的只是难得的工业繁荣时期工人的情况!这个繁荣时期和危机及停滞时期的‘正确的比例’关系是3:10。也许经济学家们所谈的改善是指那些为了使在同一工业部门干活的150万英国工人每十年中得到三年繁荣而不得不卖命于东印度群岛的几百万工人吧?”^③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从这种对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乐观主义的谴责到绝对恶化的学说还是遥远的;无可争辩的只是,在马克思同蒲鲁东争论的时期,他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如此大喊大叫的绝对改善是极其可疑的。他在表述自己的观点时说道:“只是因为工资在竞争的影响下波动着,时而高于时而低于维持工人生活

① 参看格弗尼茨的著作:《Zum sozialen Frieden》[《论社会和平》。——译者注]和《Der Grossbetrieb》[《大生产》。——译者注]。

② 着重点是我加的。

③ 《哲学的贫困》,维·伊·查苏利奇译,第71—7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36页。——译者注]

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是因为这样，工人才有可能在某种（即使最微不足道的）程度内分享社会财富的增长。但正因为如此，他们也可能饿死。”^①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这里承认绝对的、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改善是可能的，不过这种改善由于工人境况极端没有保障而成为泡影。马克思当时就说过这个观点，那时，据一些顽固地硬要人接受绝对“贫困化”理论的经济学家本人承认，工人阶级的境况至少在英国（即在比其他所有国家沿工业发展的道路走得更远的国家）绝对地恶化了。后来，马克思在这里称之为“经济学家的理论”的这个观点，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本人实质上都赞同、只不过被他们的乐观主义空谈弄得模模糊糊的这个观点，——这个观点，我要说，后来被马克思本人订正了和加深了；这种订正和加深的结果，叙述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我早就介绍读者去看这本书，我曾肯定地说过，那里对无产阶级境况相对恶化的必然性作出了理论说明^②。马克思的这个最后观点自然和他在四十年代所坚持的那个工资学说一样，值得同等的注意。如果列昂奈先生要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修正主义者之间的争论中主动地扮演法官角色，那他就必需全面地弄清楚这个观点，而他却并不认为有必要花费这份劳动^③。他不加批判地接受了他在“格弗尼茨和纪德的研究”中所发现的东西，只是力求借助于诡辩躲开这些研究家、特别是格弗尼茨所得出的那些结论。他得意洋洋地拿出他的诡辩来反对他们。但是他越是把希望寄托在诡辩上，就越是暴露出他在经济学问题上

① 《哲学的贫困》，维·伊·查苏利奇译，第72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37页。——译者注〕

② 我在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中回答彼·司徒卢威先生时比较详细地考察过这个问题。〔参看《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论文二。——译者注〕

是完全软弱无力的。

格弗尼茨及其同道们说了些什么呢？他们说，由于资本主义社会技术的发展，工人阶级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增大了，资本家的份额则减少了，于是这两个阶级之间的距离就变小了，工人接近于企业主。这种阶级间的接近，无产阶级份额的这种增大，即使一般说来是可能的，也不会不经工人的努力，即不通过工人同企业主的斗争而自然而然地发生，——这是不言而喻的。同人们根据我引用的列昂奈先生的话可能产生的看法相反，舒尔采—格弗尼茨实际上也没有否认这一点，不过他并没有更清楚地说明这种情况。对他说来，问题是这样摆着的：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是否有可能使无产阶级的处境得到改善，使这个阶级同资本家阶级接近起来，使它珍视事物的现存秩序，并且使它认为完全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思想是多余的呢？格弗尼茨肯定说：是的。这时他引证了他虚构的工人阶级在国民生产品中所得份额的增长。他号召“**社会和平**”完全不是意味着他希望结束工人为了向企业主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条件而同企业主进行的斗争。这只是表示他希望使工人放弃“最终目的”，即放弃这样的意图：结束那个逼得工人带着自己的劳动力到市场上去的社会制度。如果列昂奈反驳他这一点：工资提高证明工人和企业主之间阶级斗争的尖锐化，那么，他这样做就暴露出自己完全不了解格弗尼茨的“研究”。这位德国经济学家可

① 或者，他本来就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在他的另一著作即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L'Economia Sociale》[《社会经济》。——译者注]中马马虎虎地叙述了马克思的工资学说（第214—216页）；然而列昂奈对这个学说的意义了解得多么糟糕，从他称这个学说为生产费用论（!）（teoria del costo）就可以明显地看出来。用俄国话讲这叫做 попасть пальцем в небо [大错特错。——译者注]。列昂奈本人在上述著作中只得出这样的结论：工资在不同的工业部门是不一样的，但它在竞争和技术进步的影响下趋向于一个水平（第221页）。这不为多！

以回答他说：“如果您引证我的著作，那您就应当知道，我力图在著作中指明，当工人为改善雇佣条件所作的斗争采取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继续存在完全相容的形式时，这种斗争怎样改变着自己的性质。而且如果您想反驳我，那您就必须首先驳倒我的经济学前提。”可是我们的作者简直不知道格弗尼茨那里有任何特殊的、在修正主义者头脑中散播混乱的经济学前提。因此他也就解决不了问题；他只是在旁边搞一些笨拙的动作来回避问题。不用说，他出色地保卫马克思不受“批判家们”的糟蹋！

五

往下讲吧。“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在另一个地方正准备对自己进攻。它根本没有看出自己的不可原谅的逻辑错误，这种错误彻底推翻了它所谓阶级矛盾减弱的全部高谈阔论。（“无可指责的严格推理”原来就这么回事！——格·普·）怎么！大资本家的数目不缩减，而有产者的等级也没有减小的同时，无产阶级的人数却增长了么？但是要知道，在这里我们就不再有得救之道了……如果资本的集中化不是在马克思预见过的，显然被48年和66年英国的条件所欺骗的那种紧张形式下进行的，那么这就是说，现代的阶级斗争是在强大的、经过战斗锻炼的各敌对者之间发生的，而且剥夺的事业，仅仅通过广泛地和全面地强调剥夺的必然性的办法，仅仅通过工人群众和耐火的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着的冲突越来越急剧尖锐化的办法，是不能实现的”（第36—37页）。

当修正主义者着手重新审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时，他们既没有表现出广博的知识，也没有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他们想前进，事实上都倒退了，他们胆怯地和犹豫地向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观点靠拢。但他们大部分人毕竟善于或多或少清楚地懂得他们所争论的对象；他们力求知道事实；他们想解决资本主义现实的发展

进程最后到底怎样完成的问题。我们这位“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则根本没有走到这一步。他根本不需要弄清楚所争论的对象。他听说，马克思“预见过”资本“紧张的”集中化，而这种集中化在当代的现实中并没有发生。他并不认为有必要查明马克思“预见过”的究竟是什么，查明修正主义者是否很好地理解了他的“预见”。他情愿假定马克思“显然”被1848—1866年英国的条件所欺骗。他在庞塔勒奥尼先生和帕累托先生的“纯经济学”学校受过教育，对事实不感兴趣，也不关心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朝向哪个方面。如果资本的集中化进行得不是如此迅速，象马克思期待过的这样，那就更好了，因为这说明：第一，互相斗争的各阶级是强大的和经过战斗锻炼的；第二，为了消灭“耐火的资本主义制度”，光是（哪怕广泛地、全面地）强调这种消灭的必要性是不够的。一切都好，一切都是福，一切都尽善尽美，而且现代社会生活的每一件事实都表明恩·列昂奈固有的“概念”是正确的。

我愿意打赌，读者对所谓“强调”是莫名其妙的，这种“强调”之不能令人满意，如此突然地被资本集中化缓慢的进程所证明了。为了把读者引出困惑状态，我请他注意注意列昂奈先生下面一段话：“如果资本的集中化使资本家阶级数量削减，使它缩减到 minimum^①，缩减为一小撮金融寡头，那么这就意味着关心于保卫资产阶级国家的人的数目遭到了越来越多的削减，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的影响以及无产阶级之占有政权会自动地增长到 (sic!)^② 这种程度，以致很快使得这个政权服从无产阶级的利益。如果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资本集中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这一点正是改良主义不曾理解的，——那时民主化的改良主义就会获得它可以依靠的新的社会分子供自己支配。但是实际上社会过程是朝另一个方

① 最低限度。——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向发展的”(第 37 页)①。

现在就明白了：如果马克思主义者的预言得到了证实，如果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受到资本主义非常不好的影响，那么改良主义者(亦即修正主义者)就可以引证这个事实作为证明自己策略的理由。既然事情可能是这样，所以列昂奈先生连问也不问一下，这样的引证在何种程度上是有根据的。为了预先使得不可能作这样的引证，他赶紧同意改良主义者的意见：集中化事实上进行得很缓慢。他没有自己的看待事物的观点。他不加选择地抓住互相争论的各方的个别意见，希望用它们来证实他自己的策略思想，这种策略思想的本质可以归结为类似我们“布尔什维克”的政治思想的某种东西：无产阶级在任何条件下始终应当力求把自己孤立于所有其他阶级之外。他捍卫这个光辉的思想时不是思考，而只是争论。他是这样争论的：不管什么样的理由，不管什么样的“空话、空话、空话！”，都扔到论敌的头上去。这又不可思议，但这又是事实！而正因为又是事实，所以我请读者认真对待我们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文坛上有些十分有趣和极有教益的现象恰恰是由于它们具有否定的属性……

六

如果恩·列昂奈在反驳修正主义者时仍然认为自己必须向他们表示他最恭顺的尊敬，那么在对待“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态度上(他把他们的观点称为传统的社会主义)，他却始终是严峻无情的。这些倒霉的人到底犯了什么过错呢？呵，他们犯了严重的罪行！他们歪曲了——而且甚至几乎是自觉地，几乎是“带着预谋的计划”——自己导师的理论，因此恩·列昂奈不得不出来恢复马

① 我已经说过，“天才的”基尔德错夫先生呆译列昂奈先生的著作时，用的是很笨拙的语言，有时根本不象我们祖国的规范语言。

克思“概念”的原始纯洁性。我们且跟着我们这位作者走走，看他怎样收拾“传统的社会主义”，又怎样恢复马克思主义的真谛。

“在社会主义人士那里，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无休无止的说明和注释，社会主义运动的领袖们本人别有用心地把这些解释叙述得十分烦琐。他们歪曲了马克思主义，把它变成了只适用于政党的政治目的的干瘪公式。……荒谬地解释马克思所运用的辩证方法，按照它（按照马克思吗？——格·普·），任何运动都要导致自行消灭（！），而任何肯定都要导致自己的否定，——对这个方法的荒谬解释，使得一系列社会主义政党得出了下面这个令人愉快的结果，必须把马克思的革命观变成渐进的进化论的庸俗概念。资本主义本身准备着财富社会化的条件；因此无产者就应当帮助资产阶级实现暗藏的自杀这个秘密行动。如果同意特选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派分子的这种解释，那就真正只好大声叹道：啊，现代资产阶级的悲惨命运；你走向（谁走向？资产阶级的悲惨命运吗？——格·普·）权力、财富，你的力量在日益发展，但是你没有看出，你自己的野心（！？）怎样在为你挖掘坟墓，而死神已经降临到了你的头上！”（第22—23页）

这自然是很辛辣的，甚至是雄辩的，但是……究竟谁在什么时候说过，因为资本主义本身准备着财富社会化的条件，所以“因此”无产者应当帮助资产阶级来实现这个自杀的行动呢？没有任何人在任何地方说过这种荒谬的话，即使只是因为这里硬加在“特选的马克思主义者”头上的“令人愉快的结果”不仅是荒谬的，而且具有极端不确定的特点。这个“令人愉快的结果”甚至不是荒谬的思想；这是荒谬思想的某种暗示，是它的萌芽，还没有走出几乎完全不具形体的状态。帮助资产阶级自杀是什么意思呢？这种自杀行为的内容是什么呢？如果是说资本主义的发展准备着生产资料社会化所必须的物质条件，那么这个“行动”中“秘密的”和“暗藏的”

东西又是什么呢？谁说过：任何运动一定会导致自行消灭呢？对辩证法感兴趣的人，——的确，这些人甚至在“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队伍中间也始终是为数极少的，——这些人说过，一种运动创造出特定的形式以后，会使得这个形式（正是因为运动不会消灭，而是继续进行）走向瓦解，归于消灭^①。但是要知道，这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还有，究竟谁说过，任何肯定一定会导致自己的否定呢？列昂奈先生甚至料想不到，他这些话根本没有任何意义，如果不算这样一点的话：他认为任何“肯定”本身通常都同自身相矛盾，从而否定它自己。他如此心满意足，他如此相信他对“正统派分子”提出的各种责难具有不可摧毁的力量，以致禁不住一次又一次重复这些责难的诱惑，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把它们变来变去。

“因此看来，——他肯定地说，——把社会主义的策略建立在社会大动乱的基础上是无益的，因为资产阶级自己就承担了实现这种大动乱的任务；实际上需要逐步地夺取国家政权，这自然是为了在发生了大灾难以后把管理新的社会化生产抓到自己手里”（第23页）。

重复说这样的话是完全无益的：“正统派分子”中间无论任何人甚至做梦也决没有想到，仿佛资产阶级自己承担了“实现社会大动乱”的责任。而确定这样一点却是极为有益的：这个所谓对未来的“资产阶级自杀行为”的信念，按照我们这位作者的意见，也就是对他抱着敌意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们”最主要的错误。如果这是他们最主要的错误，如果正是他们的这个信念表现了他们同马克思的决裂，那就很明显，在马克思的学说中（象恩·列昂奈对它了解的那样）不可能有同如此荒谬的宿命论相类似的任何东西；很明显，马克思本人（还是象我们的作者对他的了解那样）是以完全不

^① 这个突如其来的思想，尼·加·车尔尼雪夫斯基早已极好地理解到了，并且很清晰地表达过。

同的方式想象全部事情的。不是这样的吗？看来是这样的。现在请读一读：

“你们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概念主要是从事于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到来的客观宿命性。马克思在自己的天才著作中，耗费了自己不朽天才的全部宝藏，用来科学地证明社会主义社会的不可避免性”（第 18 页）。

显然，所谓“天才的著作”必须理解为《资本论》。那么我要请问一下的确花过力气了解马克思的“天才著作”的读者：在这三卷著作中是否有许多篇幅用来“证明社会主义到来的客观宿命性”呢？说非常之少，不对吗？如果说非常之少，那么列昂奈先生为什么又这样认为呢？得了吧，他读过这部“天才的著作”吗？得了吧，他知道马克思在此著作中耗费了“自己不朽天才的全部宝藏”是用来做什么吗？不过问题不在这里。请继续听下去。

“社会主义的危机一般说来否定了正在增长的社会对抗的存在，而这种对抗，按照马克思的意见，迟早一定要自动地导致用暴力的手段消灭资本主义所有制……根据这个原则，传统的社会主义论证了它那集中心思夺取政权的策略”（第 19 页）。

由此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由此可以得出，——说这个话的时候，我希望恩·列昂奈本人（只要他愿意做一个公道的人）不拒绝对我的结论的“无可指摘的严格性表示自己的敬意”，——由此可以得出，“正统派分子们”完全没有背叛马克思。事实上，要知道现在的情况原来是：他们正是从他那里继承了自己的主要错误，即相信临来的资产阶级“自杀行为”，即认为消灭资本主义是“自动式地”完成的。要知道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恩·列昂奈讨厌的“令人愉快的结果”的最主要的和也许是唯一的始作俑者不是别人，正是为了证明“社会主义制度到来的客观宿命性”，“耗费了自己不朽天才的全部宝藏”的《资本论》的作者。为什么饶恕这个有害的头号异

端分子呢？为什么把他的罪过都推到他的继承人的头上呢？而如果必须把“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伪说同工团主义“概念”的真理对立起来，那么为什么必须同时依靠同一个有害的头号异端分子呢？为什么把这个“概念”称为理解得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呢？^①

七

我无法回答这些问题，而且老实说，也不认为有必要干这个事。我只想简单地确认这样一个不十分“令人愉快的”结果：到现在为止，在恩·列昂奈那里，“任何肯定”始终导致了“自己的否定”。现在我要来说明一下，他，列昂奈，由于某种不知道的、甚至有些“神秘的”原因而将其冒充为唯一真正马克思主义的那个概念，究竟是什么。

我们这位“思想深刻的”工团主义者这一次心情非常之激动，他得意洋洋地喊道：

“是呀，太阳照耀着，我们同拿破仑一起说；看不见太阳的人是瞎子……读者大概知道这正是历史唯物主义的概念：‘物质生活的生产形式决定着社会的、政治的和精神的生活过程’……明白无疑的是，构成国家的各种法律制度只是经济，即物质生活的反映、产物，或者象马克思所说的，只是经济的上层建筑。它们是由经济创立的，它们并不创立，也不领导经济力量。我们严格地站在这个立场上，从而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国家作为政治因素，没有掌握任何力量来实现社会经济关系的改造。然而这个完全符合经济科学的结论的经济学原则，从欧洲各国社会党的视野中无法补救

^① 在第18页上列昂奈说到马克思的“概念”的宿命论性质，这并不妨碍同一个列昂奈肯定地说，伯恩施坦“象所有热心的注疏家那样用荒唐的手法简单地把它（即历史唯物主义。——格·普·）描述为宿命的历史概念”（第31页）。诸如此类的矛盾在这个真是奇怪的人的整本书里比比皆是。

地(?!)和不可避免地放走了”(第 30 页)。

现在我们这里,感谢恩·列昂奈,“太阳照耀着”;现在我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没有伪造的马克思主义!糟糕的只有一点:根据恩·列昂奈的命令而在我们头上闪耀起来的太阳照得很没有光彩,简直跟月亮一模一样,这个月亮,用一个果戈理式的人物的话说,在汉堡被搞得迷迷糊糊。真正的马克思学说的本质似乎在于:政治因素不具有任何可以改变社会经济的力量。是这样的吗?为了不使读者深感委屈,我将不向他们说明事情根本不是这样,以及为什么根本不是这样。我向他们提出另一个问题:恩·列昂奈从哪里搞来他这个“明白无疑的”胡说?有个时候,我国“主观社会学家”曾经用这种精神了解马克思主义,他们对他们自己虚构出来的马克思理论的“狭隘性”轻蔑地耸起肩膀。但是,以为可敬的恩·列昂奈也受过我国“主观主义者”的影响,这个想法是完全没有任何根据的。他从哪里搞来这些观点的呢?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

并不是从现在向“马克思的批评家”鼓掌、而且象“主观主义者”那样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一种犯了极端“狭隘性”的错误的理论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搞来的。而是从本人某个时候就以唯物主义历史观为依据的那些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搞来的。这种“头等风格”的无政府主义者中间最出色的人才,就是米·亚·巴枯宁。

大家知道,如此顽强地在国际工人协会同马克思作战的米·亚·巴枯宁本人,曾接受过历史唯物主义。自然,他是按照自己特殊的方式接受的,但毕竟是接受了。在自己的著作《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中他关于马克思写道:“……没有疑问,在他针对蒲鲁东所作的无情的批判中有许多是对的;尽管蒲鲁东千方百计地要站在现实的基地上,他仍然是一个唯心论者和形而上学者。他的出发点是抽象的法的观念,而反对他的马克思先生则说出了和证明

了这样一个被过去和现在的全部人类社会史、民族史和国家史证实了的无可怀疑的真理：经济事实过去和现在始终先于法律和政治的权利。叙述和证明这个真理正是马克思先生主要的科学功绩之一”^①。

巴枯宁在承认马克思这一科学功绩的同时，又发现《资本论》的作者不善于（更正确些说，由于他固有的“机会主义”而不愿意）从自己伟大的发现中做出应有的结论。巴枯宁认为，如果“经济事实”先于其余一切社会生活的事实，那么这些其余的事实中任何一种都不可能反过来影响社会经济。因此当巴枯宁说社会生活永远先于社会思想，而“决不会成为它的结果”^②的时候，他是完全忠实于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的。大家知道，巴枯宁和他的门徒是以轻视的态度对待宣传的。大家也知道，除了破坏国家，巴枯宁不承认任何别的“政治”；这从一个深信“经济事实”先于政治事实、后者不可能对前者产生反作用的人方面来说，也是完全合乎逻辑的。如果马克思这个无比广泛、无比深刻、无比正确地理解了经济和政治的关系的人，认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乃是消灭资本主义必要的先决条件，那么巴枯宁就把这一点说成是马克思的不彻底性，说成是他性格中的坏品格，说成是他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愿望，“追求同激进的资产阶级勾结”。^③在他看来，这些勾结就是马克思政治纲领的全部实质。

这就是对历史唯物主义的极端错误的、而且当然绝对不会被“过去和现在的人类社会历史所证实的”理解，而现在，恩·列昂奈把它重新加热一下，端到我们面前，当作最货真价实的、最不掺假的马克思学说！由此可见，工团主义批判“传统的社会主义”时所

① 《米·亚·巴枯宁著作集》，伊·巴拉绍夫出版，第2卷，第173—174页。

② 同上书，第167页。

③ 同上书，第222页。

依据的理论原理，恰恰就是当年无政府主义者用来同马克思在国际中的政策和策略作斗争的那个东西。这种情况对于理解“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本性和策略是十分重要的。这一点必须记住。

不过我们在同其他国度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座谈时还会不止一次地遇到它。

八

我们在知道恩·列昂奈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理解多么好以后，也就容易懂得他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不可调和的敌视态度。这种态度也是他从各位无政府主义者先生们那里租借来的。所以恩·列昂奈用下面的话猛烈攻击“传统的社会主义”的时候，他决没有犯违反逻辑的错误——不违反逻辑在他那里是极为少有的。

“马克思的发现非常明显地证明经济权力先于政治权力，证明国家的威力无非是资产阶级经济统治(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осподства)①的产物，这个发现没有得到任何实际运用。无论在什么地方产生了社会主义政党，它们一开始就站在把这个历史真理翻个四脚朝天的那种概念的立场上；不是经济、经济力量和阶级利益产生继起的政治形式，而是相反，政治决定着经济——这种错误概念的本质就是如此”(第51页)。

这仿佛是逐字逐句从米·亚·巴枯宁那里抄来的。

请看我们的作者是怎样描述工团主义的优越性和“发现”的。

“它完全充满着马克思主义方法的精神，从经济的基地转到继起的社会学的归纳法，这无疑使它得到胜过改良主义的、不容争辩的实际的和方法论的优点，因为改良主义不是从经济基地转到政治上层建筑，相反地，它从国家政治出发，希图靠它帮助来实现伟

① 俄译本作“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经济国家”——译者注]，这当然是误植。原文(第68页)说的是“dominio economico”。

大的经济革命。社会主义研究的经济方法的这种发现使工团主义有可能不断地继续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和灵魂。……不过工团主义一利用它那富有成果的观察方法，就不能不迅速达到对产生社会主义危机的深刻原因的理解。它用来看清现代历史进程的广阔视野，使它有可能发现无产阶级为完成解放运动的循环所必需的实践、斗争和夺取的种种包罗万象的需要和新的形式。而且它最先看出了，社会主义之成为政党是它蜕化为民主制和丧失战斗精神的主要原因”（第44—45页）。

“经济方法的发现”、“富有成果的观察方法”、“广阔的视野”、“看清现代历史进程”、“发现包罗万象的需要和新的形式”，如此等等等等，——这一切都“最先”归结为大约四十年前米·亚·巴枯宁曾经作出的“发现”。响亮得可笑的空话，照例掩盖着最无价值的内容。所以必需有许多的善良意愿或者对事物漫不经心、疏忽大意的态度，才会在这个压根儿“没有脑筋”的地方看到哪怕是一丁点深刻思想！

问题不在于恩·列昂奈错了；拉丁谚语说得对：*errare humanum est*①。问题在于恩·列昂奈的无数错误暴露出他根本没有受过任何训练能够运用他希望加以运用的那些概念。下面就是极为众多的例子中的一个：

他在作出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sic!*)②解释”时说道：“马克思始终表明了这样一条真理：为了实现任何社会变革，必须在旧社会内部使得旧社会崩溃的经济条件成熟，以及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新社会的预备条件成熟。因此，无论是传统的社会主义，还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修正主义，都大错特错了，因为它们希望在现代社会的抽象条件中找到新社会结构的条件”（第48

① 人孰无过。——译者注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页)。

何谓“现代社会的抽象条件”？任何一个社会的“条件”怎么会是抽象的？这个道理，不管是我们，诸位读者，还是我们这位“思想深刻的”作者都是不知道的。其次，恩·列昂奈这里所暗示的那条被马克思表明的真理，实际上根本不是我上文引证的这几行话里所说的那个样子。马克思说的是：任何一个社会的结构，当它内部能够发展的那些生产力发展成熟以前，是不会退出历史舞台的，而新社会结构在它的存在所必需的那些物质条件产生出来以前，也决不会取代旧社会结构的地位。同时他始终把这些物质条件理解为相应的生产力状况，而整个社会的发展归根到底是由生产力发展的进程决定的。马克思指出了社会变革的根本原因何在。按照他的学说，这原因就在于生产关系不再适应生产力的状况：起初特定的生产关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后来它们变成了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东西，这时社会变革的时代就开始了。不过如此而已。如果可以从这里得出任何什么结论，那么“最先”就是：列昂奈先生尽管“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还是根本不懂马克思的历史理论。

请自己判断吧。当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同它的生产关系发生矛盾的时候，这就意味着，它的财产关系开始阻碍它的生产力的发展。为了使社会生产力有新的广阔发展的场地，应当改变它的财产关系。而为了改变财产关系，又需要什么呢？需要把政权从认为保存旧的所有制形式有利的阶级手中，转到认为建立新的所有制形式有利的那个阶级手中。这是明若观火的。可是政权这样转到先进阶级手中也就意味着此阶级的“专政”；巴枯宁一想到这里，就觉得是对工人阶级事业的卑鄙的叛变，而继巴枯宁之后，恩·列昂奈又如此坚决地谴责追求专政的意图。真可谓正中要害！

其次，如果政权能够促进所有制形式的改变，那就是说，在“经

济事实”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上层建筑反过来可以影响“经济事实”。而我们的作者跟着巴枯宁硬要我们相信这是不可能的，而且谁只要让自己接受上文指出的这种反作用的可能性，谁就犯了反对马克思学说的死罪。好一个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

九

列昂奈先生决定巩固“用现实主义解释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阵地，他继续说道：

“由此可见，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经找到。借助于自己整整一大批由国家支撑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诸制度，资本主义在它自己的工业环境中发展起来。因此，社会主义无论如何必须恰恰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在同一个经济基础上繁荣昌盛起来。这样的东西（怎样的东西呢？——格·普·）实际上只是工会组织”（第48页）。

您看，马克思的“概念”这里成了个什么样子。

按照马克思的意见，法律的、政治的等等“上层建筑”生长在经济基础之上。在已经为社会主义“找到了”“经济基础”的恩·列昂奈那里，资本主义——即特定的生产关系总和，即恰恰是那个其上建立着“上层建筑”的经济“基础”——“借助于由国家支撑的法律的、社会的和政治的诸制度”（即“上层建筑”）而发展。换句话说，历史唯物主义一经“现实主义的”解释，看起来就用头倒立起来了。不过仅仅是看起来而已。这个“一大批政治的”和其他的“诸制度”是什么东西呢？这也就是国家。因此，结论就是：资本主义借助于“国家支撑的”“诸制度”而发展。国家不是支撑在经济基础上，而是……支撑在国家之上。这简直是荒唐，它并不是证明恩·列昂奈在“现实主义”解释的借口下歪曲马克思理论的涵义，这“在而今

的时代”乃是司空见惯的现象，而是证明在谈到这个理论的时候，他根本没有把任何意义放进自己的话里。因此我说，仅仅看起来似乎他把马克思的理论用头倒立着。怎么弄成这样的！Ce serait trop beau!①

不过这也还没有结束恩·列昂奈的理论灾难。因为资本主义是在它自己的工业环境中发展的，所以，“因此”，社会主义一定要“恰恰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繁荣昌盛起来”。且推敲一下这个奇怪的三段论。

何谓资本主义？一定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何谓“资本主义它自己的工业环境”？显然，就是同一些关系的同一个总和。恩·列昂奈说资本主义在它自己的环境中发展这个话时，他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不知道他本来想说什么，但是我确定地知道，除了毫无内容的同语反复之外，他未能说出任何道理来。

往下在三段论中列昂奈先生就得出“所以，因此”等等。在我们着手确定这个“因此”的逻辑价格之前，我们问一下自己：在这里我们的作者怎样理解社会主义一词呢？

当我们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对立起来的时候，我们对这个词也无非是应当理解为特定的诸生产关系的总和。这正是取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那个诸生产关系的总和。然而如果这是对的，“所以因此”，社会主义根本不能实现我们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向它提出的要求：“恰恰在这个资本主义生产的范围内繁荣昌盛起来。”社会主义的繁荣昌盛，前提是消灭资本主义。说社会主义应当在资本主义曾经繁荣昌盛的那个经济基础上繁荣昌盛起来，就无异说社会主义应当在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的基础上繁荣昌盛。可是能够在这些关系的基础上“繁荣昌盛”的，也许只有（我们且向

① 真是妙不可言！

恩·列昂奈让让步)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

那么“工会组织”呢？工会组织，这完全不是社会主义；这不过是为了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同企业主进行斗争的工人的组织。这些组织之所以对工人有利，不仅因为它们是在为改善出卖劳动力的条件而进行的斗争中的堡垒；正如马克思某个时候说过的，它们“是消灭雇佣劳动制度和资本统治的组织因素”^①，——这是丝毫不容怀疑的；但这还不会使它们成为社会主义。同样的，这也还没有提供可以用“生产者的组织”进行的斗争的名义来否定政治斗争的理由。而且更不可能在以经济斗争的名义否定“政治”时引证马克思。在这个场合，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无比正确的将是引证米·亚·巴枯宁。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完全不排斥“政治”。恰恰相反！

马克思说：“经济关系首先把大批的居民变成了工人。资本的统治为这批人创造了同等的地位和共同的利益。所以，这批人对资本说来已经是一个阶级，但它还不是自为的阶级。在斗争中，这批团结起来的人形成一个自为的阶级。他们所维护的利益变成阶级的利益，而阶级同阶级的斗争就是政治斗争”^②。

同时仿佛是为了不给人对他怎样看待“政治”留下任何怀疑，马克思用同情的语气提到宪章派这个英国无产阶级的“巨大的政党”^③，而在我引证的这本书的最后一页上，他大声说道：“不能说社会运动排斥政治运动。从来还没有哪一种政治运动不同时又是社会运动！”^④

① 比较古·耶克(古·埃克)《国际》，圣彼得堡 1906 年版第 41 页。[参看耶克《第一国际史》中译本第 52 页。——译者注]

② 《哲学的贫困》，第 140—141 页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96 页。——译者注]。

③ 同上，第 140 页。

④ 同上，第 142 页。

十

未必需要引用新的证据来说明这个“一看就明白的”真理，恩·列昂奈绝对没有能力哪怕稍微分析一下修正主义者同马克思主义者争论的那些理论问题。但是这个令人失望的情况并不妨碍他对修正主义者比对马克思主义者更多得多地表示同情。从本质上讲，他也是“危机”的产儿，也是修正主义的产物。而且他本人就承认这一点，他说：“在社会主义危机的同一块土地上立刻标写了两个不同的解决问题的方法：一个专门是政治的（改良主义），另一个唯独是社会经济的”，即工团主义（第 27 页）。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看到，阿·拉布里奥拉也同样承认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有共同的起源。而且，正如我们下面会看到的，改良主义者波诺米也承认这个共同的起源。这些承认是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的。

用恩·列昂奈的话说，改良主义“容易在传统的党的基础上占革命主义的上风”，但它本身却经不起工团主义的批判。

这两个近支亲属之间的区别到底在那里呢？就在这里。

改良主义使社会主义离开“它那些顽固不化的原则而走向民主”（第 28 页）。

工团主义（即自称为而且衷心地自认为革命的工团主义）用来反对这种办法的是“另一种解决办法：它，根据生活经验和社会事实，乃是防止社会主义蜕化为资产阶级诡辩的唯一手段”（第 38 页）。

我认为，对工团主义的这个说明在这里仍然是极其自相矛盾的。因此我继续摘录：

“无论是改良主义还是工团主义对现代社会主义的重新审查——这两者都给自己提出同一个任务：使实践同原则一致起来。

作了极为细心的分析的伯恩施坦修正主义（考茨基对它的批判远不是赢得了胜利的）确定了下面一条不可辩驳的真理，即社会主义政党陷入了明显的矛盾：它信仰社会主义原则，可是它的实践只是民主性的。因此任务在于，通过把符合此民主主义实践的新的民主主义社会原则包括到纲领和实践中去的办法，使这两个矛盾的因素一致起来。改良主义是这样议论的。工团主义则从自己方面确定同样的东西。它说：社会主义政党在它所喜爱的政治领域中的全部生活同民主制根本没有区别，例外的只是形式的和遥远的理想。枯燥地强调不管多么遥远的理想还远不可能成为可以用来说明这些或那些社会力量的特点……正是因为这个道理，实践就应当同社会主义原则一致起来；必须使实践回到自己的（即回到实践的，基尔德错夫先生！——格·普·）纯粹阶级斗争的基础上来，回到生产的土壤上来，回到现代组织的范围内来”（第28—29页）。

现在，问题变得清楚得多了。改良主义想使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纯粹民主主义的政党，而工团主义则抛弃任何“政治”，并且建议无产阶级把自己的努力集中“到生产的土壤上来”，即集中到经济斗争的范围内来。

情况就是这样。恩·列昂奈成功地说出这样清楚的思想倒是罕见的事。不过往下他又稀里糊涂了。

“按照改良主义的要求，应当加以改变的正是原则；所以它的对象（就是任务、目的，基尔德错夫先生！——格·普·）带有主要是学理主义的性质；相反，对于工团主义说来，问题在于改正行动。因此它的使命是本质上实践的”（第29页）。

等一等，别着忙，列昂奈先生！如果事情是象您本人所描绘的这样，那么要知道，不是改良主义，而正是工团主义具有“学理主义的性质”。

伯恩施坦（“考茨基对他的批判远不是赢得了胜利的”）的“细

心分析”肯定说，“传统的社会主义”的观点在许多方面不符合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传统的社会主义者们”自己也感觉到了这点，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实践就不再符合他们的理论了。但是他们全都仍然坚持为生活所推翻的旧理论。因此他们也就陷入自我矛盾。然而如果理论为生活所推翻，那就只有放弃理论了。

伯恩斯坦先生的“细心分析”是这样议论的。同时，如果这个“分析”的基本命题确实是对的，如果旧理论事实上违反社会发展的新方向（而您本人虽然犹豫，可是最后毕竟会承认这一点，列昂奈先生），那么学理主义者就不是为了生活本身所提示的行动而放弃理论的人，而是尽管生活谴责了自己“顽固不化的原则”、仍然不愿放弃这些原则的那种人。

改良主义者有许多违反逻辑的过错。但是在这个场合其实应该承认他们的结论是无可指摘的：如果他们（用舒尔采-格弗尼茨之类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谈到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进程时所有说过的话都是对的，那么“顽固不化的社会主义原则”所值的价钱就会和明日黄花所值的一样多。所以，凡是努力使自己的“行动”适合这个过时的原则的人都应该认为是渺小可笑的、预先注定不会成功的学理主义者。

当然，改良主义者关于资本主义发展进程的新方向所说的话是不对的：“伯恩斯坦先生的细心分析既不能认为是细心的，尤其不可能认为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要知道，恩·列昂奈决不会同意这一点。相反的，他以为，就这里所讲的“分析”来说，比伯恩斯坦先生更强大的“野兽是没有的”。因此他不能有别的结论，除了或者转到改良主义者阵营，从而哪怕是部分地，哪怕是稍微一点点同逻辑和解，或者就彻底地同这个逻辑闹翻，并把那个惊人的概念混乱，把他称之为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的那个由旧的无政府主义和最新式的曼彻斯特主义组成的根本不能消化的杂烩奉献给工人阶

级，而每一步都自相矛盾。列昂奈先生作选择时是不会动摇的。

十一

“由此可见，社会过程的新的发展形式已经找到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过程符合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它不再依靠资本集中到人数日益减少的资本家手中，而是依赖于这个专业化的无产阶级机构的发展水平，这个机构自身内具有人类未来组织的萌芽”（第86页）。

恩·列昂奈……是这样说的。不言而喻，“专业化的无产阶级机构”就是工会。然而试问：难道工会的发展不是决定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程吗？难道这些工会的成长和策略不也依赖于资本的集中化吗？为什么恩·列昂奈虚构出这种根本不合情理的对比呢？同时，那个倒霉的、由于伯恩施坦先生的“细心分析”而大吃苦头的“正统马克思主义”又在哪里呢？

问题就在这里。

改良主义，正如我们的作者所说的，“由于预言过的资本集中化的破灭而暗淡起来了”（第87页）。而且它的这种“暗淡”对于同它有亲属关系的恩·列昂奈不会没有留下影响。这位“思想深刻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懂得——虽然照例是十分模糊地——“资本集中化的破灭”也许可以成为（顺便说说）反对它自己的“顽固不化的原则”的理由。于是，为了支撑住这些动摇的、虽然很强硬的原则，他想起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俄译本第141页）上说过：“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①。于是，虽然并不关心理论、但是毕竟被修正主义者的批判弄得有些“暗淡”的恩·列昂奈就抓住了马克思的这句话。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97页。——译者注

他放了一通这样的议论：“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本人说道，各种生产力中最有力的（最有力的力……哎哟，基尔德错夫先生！——格·普·）正是革命的工人阶级。然而作为正常生产的对立面的结果而获得的过程（?!——格·普·），还并不就是产生一定的社会变革的那个过程。每一天，可以说任何一分钟，现代工厂中的劳动力都同资本家的意图发生矛盾；每一天都表现了生产力的买者（资本家）和卖者（雇佣工人）之间无可救药的对抗。因此（我们对恩·列昂奈的‘因此’一词总是说得完全不是地方早已习惯了），当马克思谈到生产力和生产形式之间的‘社会冲突’，说它是从一个社会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形态学上的过渡的因素时，他所指的并不是各敌对利益的这些日常的冲突，而是现存的社会组织（生产形式）和本身又组成为一定的组织的生产（劳动）力之间的一定的冲突”（第 81 页）。

这种佞屈聱牙的胡言乱语的意思就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看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一切矛盾归结为工会起来反对事物现存的秩序。而且恩·列昂奈甚至没有想到，为了使上述组织同现存的秩序的斗争得到顺利的结局，必须存在着一定的客观条件，例如必须有我们这位作者认为遭到了“破灭”的那个资本集中化。马克思不仅仅说过，觉悟的无产阶级是最大的生产力。他还立即补充道，社会变革“预先以旧社会内部所能诞生的全部生产力的存在为前提”^①。可是这个重要的补充在恩·列昂奈的心目中失去了任何意义，他以为，“生产力”的概念被“觉悟的工人阶级”的概念完全包括了。因此，恩·列昂奈的“社会主义”也就获得独特的——“唯意志论的”——性质，这种性质使它同已故的空想社会主义大大地接近起来：现代社会的经济发展不管朝向了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4 卷第 197 页。——译者注

哪个方面，反正都一样，只要工会具有掌握生产资料的意志。如果“资本的集中化遭到破灭”，而关心于保护资产阶级国家的人的数目增多起来，那甚至更好；那时，按照列昂奈先生的意见，“改良主义脚下的任何基础就都被拔掉了”。

这不需要任何解释。“一看就明白”，我们的作者同马克思在一起根本不会走运。如果他某个时候自以为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那么这乃是最纯粹的误会。他反对“危机”之所以软弱无力，是因为“危机”迫使他毫无准备地对论战提出的各种理论问题作出判断。“思想深刻的”恩·列昂奈在这类问题上软弱无力的、傻头傻脑的和束手无策的，于是他随波逐流了，并且转过身来背对着他始终无法理解的“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然而如果说对德国修正主义者发生了影响的主要是丝毫不反对国家干涉社会经济生活的现代德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么，恩·列昂奈也就象阿·拉布里奥拉一样屈从于庞塔勒奥尼—帕累托学派的意大利“曼彻斯特分子”的影响。恩·列昂奈的全部“社会主义”都是建立在这个学派精心制订的“纯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的基础上的。而因为“纯经济学”(economia pura)通过自己的主要代表人物得出了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结论(不过这个结论完全符合它的真实本性)，所以恩·列昂奈象阿·拉布里奥拉一样把巴枯宁主义的胡椒粉撒在这种“纯经济学”淡而无味的稀汤里。我们已经知道，恩·列昂奈的“学说”同巴枯宁的学说多么亲近。现在我们来看看，它同“纯经济学”的关系如何。

十二

“产生过曼彻斯特学派^①的古典政治经济学，——恩·列昂奈

① 着重号是俄译本加的。在意大利文原本(第118页)中用的不是曼彻斯特派，而是 liberismo[自由主义——译者注]，不过意思显然仍然是一样的。

说道，——在以下方面同工团主义完全一致：国家，这是破坏经济的机关，而不是创造经济的机关；它是财富发展的障碍，而不是财富发展的创造性因素……‘曼彻斯特派’对国家经济活动的态度一般说来是大家知道的。曼彻斯特学派认为，国家干涉经济事务所能有的后果不过是浪费财富和由一个受宠者的阶级的利益偷换集体主义的最高原则”（第91—93页）。

如果产生过“曼彻斯特派”的古典经济学“在这方面同革命的”工团主义完全一致，那就应当设想，我们可以把这个话反过来讲：“革命的”工团主义在这方面同产生过“曼彻斯特派”的古典经济学“完全一致”。但是，能够这样设想的只是那些认为必须服从逻辑规律的人。我们已经知道，恩·列昂奈往往把这些规律当作沉重的包袱甩掉。

在自己的书的第148页上，他写道：“当现代自由主义^①的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② 之成为革命的公式，是在它通过古尔奈的口加以宣布的时候，是在国家刚刚形成时期的最晚近的古典经济学家们把它提升到光荣地位的时候^③。而在我们今天，当国家已经作为仅仅保护统治阶级的堡垒和机关而成立和巩固起来以后，对待国家的这种 *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 态度无疑会变成反动的公式，变成资产阶级保存自己的原则，变成没有生气和活力的标准，这是必须用工人阶级的名义加以否定的。”

你看，“完全一致”吹啦！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恩·列昂奈难道要嘲笑自己的读者么？不，他又是不善于使自己的议论做到前

① 为基尔德错夫先生写的注释。在第92页上，您把 *liberismo* 一词译成了曼彻斯特派。现在您让它保留原状，不加翻译，又不事先向读者声明。这样做妥当吗？请自己判断吧。

② 放任自流。——译者注

③ 列昂奈先生以为，国家只有宣布了“*laissez faire, laissez passer*”原则的时候才开始“形成”。

后一贯！

当他说“完全一致”的时候，他不过是表示对“曼彻斯特派”的向慕心情而已，这种心情在极大程度上是他和其他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所共有的，同时这种心情——象我们很快就会看到的那样——给他的全部经济学观点打上了自己深刻的烙印。

而当他宣布曼彻斯特派的基本原则是反动公式和没有活力的标准的时候，他就向这样一个不可避免的实际考虑屈服了：工人阶级在它同企业主的关系上不能不需要国家的干涉。

因此如果以前他同“曼彻斯特派”“完全一致”，毫无保留地跟在他们后面重复说：“国家干涉经济事务所能有的后果不过是浪费财富”，那么现在他就会觉得自己不得不作一个保留声明：“某些肤浅地解释工团主义的人，——他现在发觉到，——企图从它同曼彻斯特派的类似性中作出社会立法领域中一切活动都徒劳无益的结论。然而工团主义的自由主义^①不同于别的自由主义（即自觉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格·普·）的地方正是在于它是无产阶级的、阶级性的自由主义”（第147页）。当然这个话还是相当模糊的，不过请继续读下去：“在劳资竞争的压力下，它力求消除任何阻碍因素，消除国家对发展这个特殊形式的经济竞争的任何干涉，阶级斗争就是从这种竞争中产生的。然而正是因为如此，它不能不对这样的立法发生兴趣：这种立法会使现代国家通过官职等级、禁

① 这里以及下面的若干个“自由主义”，原文都是 либеризм（李伯尔主义）。列昂奈指的是哪个李伯尔，不清楚。当时俄国有一个米哈伊尔·伊萨科维奇·李伯尔（戈尔德曼）。他是崩得首领之一，也是著名的孟什维克。但他在意大利没有什么名声。列昂奈不大可能指他。从上下文意看，这里也不可能是“李伯尔主义”。很可能是漏排了两个字母，似乎应当是 либерализм（自由主义）一词之误。либерализм 一词来源于拉丁文 liber（自由的）。也可能普列汉诺夫在这个词后面直接加 ism，例如意大利文的“自由主义”就写作 liberismo，于是就成了 либеризм。——译者注

令、保护关税进行干涉的过程朝相反方向发展”(第 147—148 页)。

结论是：“革命的”工团主义之所以觉得自己不得不取得社会立法权，正是因为它力求消除国家对发展经济竞争的这个特殊形式的任何干涉。这又是十分不协调的。但这种不协调现象倒是极有特色的。它再明显不过地证明了，新的和似乎革命的“自由主义”，同具有“反动公式”，具有“没有生气和活力的标准”的旧的“曼彻斯特派”自由主义这两者之间的“类似性”，实际上是很大的。真是难以想象！旧的自由主义对新的自由主义的影响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致新的自由主义，只有在从旧的曼彻斯特派基本原则的观点看来它能够用渺小可笑的玩弄词句的手法来证明工人阶级最紧迫、最起码的要求是正确的那种场合，它才会决心捍卫这些要求！这意味着，这两种“自由主义”之间的“类似”，象两滴水一样，好似其中的一个（也正是自封为革命的那一个）思想上依赖于另一个，即依赖于任何时候也没有超越过多少坚决地保卫资本的利益的那一个，严肃抗议的任何气息现在甚至在意大利也都从它那里飞走了。

这种思想上的依赖性其实是很大的，我们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者”谈论一般的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时所用的那种亲近的温柔语调也就证明着这一点。

“以其最卓越的门徒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他说，——在某些方面是对阶级的经济学的否定，是对庸俗的辩护论的否定，在马克思看来，这种辩护论所抱定的目的只是发现和表述不同警察的观点背道而驰的那些规律和公理”(第 93—94 页)。

这里和“门徒们”有什么关系？难道自由主义的门徒们胜过了它那些鼻祖吗？当然没有！恩·列昂奈写下这句话看来唯一是因为它是偶然从笔下滑出来的。其次，自由主义任何时候都不是对马克思曾经大加讽刺的那种庸俗政治经济学的否定。再次，马克

思之所以对这种经济学大加讽刺，完全不是因为它似乎抱定了目的去仅仅发现不会和警察的“观点”发生矛盾的那些规律。这种经济学任何时候也没有抱定这样的目的。它的辩护论性质决定于这样一个简单的和众所周知的情况：它曾力图使我们的“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承认同自己类似的那些自由主义“门徒们”本人那些流行的经济学“观点”具有科学真理的意义。最后，这种经济学的辩护论性质还表现在它想冒称是什么“对阶级的经济学的否定”，即表现在它通过冒称是绝对不依赖任何阶级关系的“永恒”科学真理的预言家来掩盖自己的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性质。而且在这个场合，它的庸俗性是同它的自由主义配合得极好的。简言之，恩·列昂奈如此心爱的曼彻斯特派的“门徒们”，正是《资本论》作者如此辛辣地嘲笑过的那些庸俗经济学家。

这一切始终是我们的作者根本不知道的，这当然丝毫也不会使他的放肆态度收敛，恰好相反，而是大大增强了这种态度^①。他赞扬了自由主义以后继续说道：

“不过这个特点是所有革命时期都固有的，革命时期产生出种种大胆的思维形式，它们艰难地穿过狭窄的阶级的通道，避开山岭(sic!)^②，逐渐接近科学真理。从这个观点来看，自由主义可以说

^① 上面我已经举过几个例子，表明这种惊人的放肆态度的规模。这里再举两个。列昂奈先生在长篇大论地谈到他所谓暴力的革命疾病时，引证了法国工人运动的历史。他说：“二月以及后来六月的日子里，布朗基主义运动具有纯粹工人的性质，然而尽管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等等。——对我们说来，由于“勇敢无畏的”英雄主义而发生了什么事情并不重要，我们感兴趣的倒是二月和六月的日子原来是“布朗基主义运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就是这样写历史的！不过恩·列昂奈不止懂得法国历史，他也很懂英国历史。他告诉自己的读者说，“如果从纯粹偶然的观点来看宪章派大规模的街头示威游行，这些示威游行就以失败而结束了”，不过“1851年颁布的普选法”正是由宪章运动造成的。可是这个闻所未闻的“1851年颁布”并不是译手的笔误，原本上印的也是这一年（比较原本第201页和译本第157页）。

^② 原文如此。——译者注

是资产阶级生命的这些革命时刻的最高产物”(第94页)。

总之，自由主义原来是资产阶级革命能力的极端表现。历史上，事情根本不是这样；可是这跟恩·列昂奈有啥关系！对他来说重要的是自由主义避开了狭窄的“阶级的通道”，甚至避开了“山岭”，接近了“科学真理”。所以他对自由主义表示十二分热烈的赞扬；所以他用如下一段话结束自己的赞美诗。

“因此，如果科学的、有机完整地理解的曼彻斯特学派捍卫和阐明着成为工团主义良好基础的同一些经济规律和同一些公式，那是毫不奇怪的”(同上页)。

Das also war des Pudels Kern! ①

整个问题都在这里！这里只需要作某种小小的修改。大家知道，许多美国公民不爱称自己的语言为英语；他们的结论是相反的，英国用美国的语言(United States language)说话。列昂奈先生的结论也就是这样：曼彻斯特学派捍卫着工团主义所依据的同一些原则。但是这类天真的说法当然不会改变现象间的实际关系。实际上美国的语言就是英语，同样的，我引用的列昂奈先生的结论性的声明事实上也应当理解为相反的意思，这就是说，“革命的”工团主义捍卫着和——尽力地！——“阐明着”成为大资产阶级的曼彻斯特主义基础的同一些经济“规律”和同一些“公式”。意大利现代“革命的”工团主义最出色的和最值得注意的特点也就在这里。我们在研究阿·拉布里奥拉的“科学的”观点时已经同这种特点相识过了。现在我们在恩·列昂奈身上又看到了它。

十三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主义解释”曾

① 这也是问题的关键。——译者注

使我们的作者在政治“因素”同经济“因素”关系的看法上很接近于已故的米·亚·巴枯宁。这种接近等于“革命的”工团主义同无政府主义在理论上的接近。不过如果假定这种接近可以用工团主义理论家直接倾心于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来解释，那就错了。如果我们想仔细研究到底是什么东西使得恩·列昂奈提出了他那根本上错误的“现实主义的解释”，那么我们会看出，在这里主要的动力是列昂奈先生身上有一股倾心于“曼彻斯特派”的无法抗拒的力量：因为认为“政治”根本不可能给予“经济”任何影响的那个学说，如此有效地加强和“阐明着”曼彻斯特派的国家不干涉原则！诚然，列昂奈先生不善于始终一贯地坚持这个原则：我们已经知道，他也主张社会立法。不过我又知道，甚至在保卫这个立法时，他也力求以曼彻斯特派的基本原则为依据：他要反对摩西和先知们就有这么困难①。

但是，差不多在恩·列昂奈的全部议论中可以感觉到曼彻斯特派的初看起来并不始终都明显的影响。举个例子，他发表过这样的思想：如果在工人政党所代表的阶级达到应有的发展水平以前这个党就夺取了政权，那么从这里根本得不出社会主义意义上的任何好结论。这是非常正确的：在这里，看来任何思想健全的人

① 应当记住，他的大多数同志都根本否定社会立法。在工团主义者斐拉拉代表大会（1907年6月30日—7月2日）上通过了玛丽娅·里哲尔提出的决议案，决议说，社会立法不但对无产阶级没有好处，而且可能损害它，削弱它抵抗资产阶级的能力和它对自己力量的信心。（参看《L’Azione Sindicalista》[《工团主义者的行动》——译者注] 1902年7月2日。）由此看来，多数的意大利工团主义者都表明自己属于列昂奈先生称为“肤浅”的那些“工团主义解释者”（参看上文）。但是应当公正：不管意大利工团主义者怎样“肤浅”，然而无可争论的是，在这个场合逻辑在他们方面，因为根据他们的理论的基本原理就不可能坚持社会立法。而另一方面，所有希望保卫工人阶级利益的人如果不能不坚持社会立法，那么这种矛盾说明了这样一个明显的事实：这个以资产阶级制度庸俗辩护士的原则为依据的工团主义者的学说是违反工人阶级利益的。

都只会同意他的意见。而且这个正确的思想在列昂奈先生那里被这样一些考虑包围着，这些考虑表明：纯粹曼彻斯特派的社会经济生活观决不会离开他。他说，过早夺取权力的工人政党，“会在工人阶级这个生产的经济范畴还没有充分成熟到可以自动管理有社会效用的生产和可以在不同的生产者集团之间，在工团的庇护下形成自由的自愿的契约、协议和联盟的地方死亡”（第104页）。可以看出，无产阶级成熟性的标准在这里就是这个阶级有能力在契约的基础上组织社会生产过程，而契约这个老的蒲鲁东思想，我们已经在阿·拉布里奥拉先生的书中碰到过了，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契约本身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想而已。然而这个空想可以很好地装进“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曼彻斯特派偏见的框框里，因此，十分明显的是，列昂奈先生会用双手抓住这个空想。

再举一个例子。读者也许记得，我们的“自由主义者”对“传统的社会主义”的宿命论性质是多么强烈地感到愤怒。诚然，这个所谓的宿命论性质是“自由主义者”先生们自己编造出来的；然而如果我们的作者起来反对“宿命论”，——虽说这是他本人虚构的，——如果他在每一步上都突出自己学说的“唯意志的”性质，那么看来我们有权指望：在这种学说中我们连宿命论最轻微的痕迹也不会遇到。可是这个合理的指望看来会落空。列昂奈先生写道：“在我们的时代，工人阶级凭借经济规律的自发性正是在工会中创立起未来‘平等者的社会’的第一批核心，摆在这些工会面前的任务是组织生产，使生产有纪律地进行，使生产摆脱强者对弱者的任何霸权，摆脱对人类权力的任何监护。而且如果推动工人阶级实现这个任务的力量是必然的，那么成功也是必然的，最终目的也是必然的”（第113页）。如果这些话中有任何意义，那它们的意思就是：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是由经济必然性的力量产生的一种合乎规律的必然过程。但是要知道，这也正是“传统的社会主义”

所说的意思！而且列昂奈先生正是因为这一点责备它不可饶恕地倾向于宿命论。公道何在呢？为什么我们的“革命的”“自由主义者”在一个场合下尖锐地谴责他本人在另一个场合满怀信心地重复着的那个思想呢？事情又可以用他的观点同曼彻斯特派分子观点的“类似”来解释：经济规律（列昂奈先生这里所指的就是经济规律的“自发性”）就是被曼彻斯特学派，特别是它的最新变种即所谓意大利的纯粹经济学提升为永恒真理的那些规律。

这究竟是怎样的规律呢？在基尔德错夫先生译成俄文的这本书里，只是附带地谈到这些规律，尽管列昂奈先生在这里任何时候也没有离开关于这些规律的思想。不过在他的另一本著作中，即在1904年日内瓦出版的《L'economia sociale in rapporto al socialismo》（《处在同社会主义的关系中的社会经济》）中，他以专章论述这些规律。看一看这个不大的然而极有趣味的一章，对我们将是有益的。

最小手段的规律（la legge del minimo mezzo）在那里被宣布为政治经济学的基本规律。这个规律是说：“任何人都力求利用最小的手段达到最大的目的（il massimo scopo col minimo mezzo）。换句话说，既然给定了某种福利，那么经济动因（l'agente economico）就会力求用最小的花费获得它；而如果这些花费具有一定的数量，那么经济动因就会力求以此得到总数尽可能多的福利”^①。所有其余的规律都以这个基本规律为依据，由它来说明。这些其余的规律的内容意义如何重大，从我们的作者引用的例子中可以看出。“既然某种商品的数量已定，既然存在着对此商品有一定程度的需要的动因，那么商品就会有一定的价值”^②。且把这个说法中价值一词用价格一词来代替是否好一些的问题放在一边，不

① 《L'economia sociale》，第99页。

② 同上，第98页。

能不承认：这个真理具有更多的权利可以称为永恒的；它是简单的同语反复，或如法国人所说，是 *une vérité à la palisse*。^① 然而恩·列昂奈发现，“老的社会主义”是大错特错了，因为它“否定”植根于人的本性自身和产生于“自我保存的有机原则”、或者甚至产生于“保存力量的机械原则”的自然规律^②。为了教训那些想要怀疑这些永恒规律存在的人，列昂奈先生宣布一个重要的消息：他“听说过”(*si racconta*)，维利弗利多·帕累托——“当代最卓越的经济学家之一”——请求这样的怀疑论者中间的一个告诉他，世界上是不是有一个国家，在那里可以购买任何东西，而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③。这实际上是无可反驳的理由，因为买东西正是意味着为此交付一定的代价。维利弗列多先生这个简单的同语反复使自己的对话人大吃一惊，而列昂奈先生却以为这个简单的同语反复是经济科学最重要和最“永恒”的真理之一。

帕累托先生的对话人根本不善于反驳这位洛桑的教授，虽然他游历过许多地方，象我们的作者所说的。我不知道这位多少有些神话式的对话人究竟游历过什么地方。不过如果他在旅行时曾经遇到过比方锡兰的韦达族人，或者安达曼群岛的闵可卜人^④，或者处在同样的经济发展阶段的任何其他狩猎部落，那他就会懂得，这些野蛮人一般是不知道买卖的，至少在自己氏族内部相互交往中是如此，他就会懂得，他们常常互相取得“经济福利”，而根本“不为此付出”任何“代价”。这些原始部落的经济完全是建立在共产主义原则上的。同时要知道，这些野蛮人遵从“最小手段的规律”，

① 老调；明显的、早已知道的真理。——译者注

② 《L'economia sociale》，第 99, 100, 101 页。

③ 同上，第 102 页。

④ 闵可卜人，欧洲人对印度安达曼群岛上土著居民的称呼。1850 年这些岛屿上尚有闵可卜人五千人左右，到 1941 年仅剩六十一人，几乎全被欧洲殖民主义分子消灭。——译者注

就是说，一旦给自己提出一定的目的，他们就会力图用尽可能小的努力来达到它。因此，这个“规律”本身还说明不了人们经济关系中的任何东西，而且这也是容易明白的：因为这是心理学的规律，或如我们的作者宁愿说的，是生理学的规律，而经济现象以及一般说来社会现象，它本身是不能够用心理学或生理学的规律来说明的，正如不能用物理、化学或力学的规律来说明一样。政治经济学是关于决定人们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的那些规律的科学，而这些相互关系归根结底是由特定时期和特定社会的生产力状况来说明的，不过它们当然也要以人体一定的生理属性和心理属性的存在为前提，同样它们也要以“非生”物质一定的化学属性和物理属性为前提。在向前发展的社会中，生产力在增长，而随着这些生产力的增长，生产关系即社会经济结构也多少迅速地改变着。就是因为这个道理，政治经济学，象恩格斯在同杜林辩论时早已正确地指出过的那样，不可能对一切国家、时期和民族都是同一的：这种科学按其本质来说是历史的。谁忘记这一点，谁企图栽培这样的经济科学，使它的规律在现代英国就象在火地岛居民或澳洲土著中间具有同样的意义，——恩格斯继续说道，——他就得不出任何结果，除了一些最空洞最庸俗的老生常谈。^①可是有这样的人，在他们的心目中，最庸俗的老生常谈和最无内容的同语反复却具有重要真理的意义。列昂奈也属于这些人之列。他不仅对于被当今曼彻斯特派冒充为“纯粹经济学”的老生常谈抱着最大的敬意，而且还愿意根据这些老生常谈建立起自己的社会主义理论。因为在他看来，老生常谈和同语反复似乎是不依赖于时间和地点的条件的普遍真理，所以他确信，社会主义理论以这些东西为依据就会获得花岗岩般的稳固性。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3卷第186页。——译者注

十四

请看，他是这样分析问题的：

“按照快乐主义的假定（即我们已经知道的‘最小手段的规律’。——格·普·），每一个经济动因^①都力图达到一定的、表现为物质财富的供给总数，这个数目等于和他一样的另一个动因所达到的。事实上，如果按照竞争的规律……经济动因 A 获得比 B 更多的利润，那么这个 B 就会力求把自己的活动转移到和 A 同样的领域和同样的形式中去；如果用 A 作为资本家这个经济范畴的象征，用 B 作为无产者这个经济范畴的象征，那么 B 就会努力同 A 竞争。结果就会是两者利润的平衡；但是这个结果被有利于 A 的一种情况所预先防止：A 拥有外在的劳动工具，同时 B 却完全没有。然而 A 据有的资本不过是一种障碍而已：它并不会破坏 B 身上那种促使自己同 A 竞争的利己主义力量^②。结果 B 和所有处在和 B 相同条件下的个体就会产生一种压力来消除障碍。由此可见，聚集为工团的诸个体 B 的斗争，在每一个工业部门都是由同一的力量引起的。正是这种同一性使工团有可能充分发挥阶级斗争的全部力量”（第 107 页）。

这种斗争产生资本家的剥削，这种剥削，从我们的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看来，无非是消除那种妨碍“经济动因”利用自由竞争的一切巨大利益的障碍。资本主义作为使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永恒”戒律失去效用的制度被消除了！这是无与伦比的。

① 基尔德错夫先生不知为什么用 «фактор» [“因素”——译者注] 一词代替了 «агент» [“动因”——译者注] 一词。不过我并不认为需要这样做，虽然我懂得有一种观念的联想促使基尔德错夫先生放弃用 «агент»。

② 在这里，“有才情的”基尔德错夫先生的译文坏极了，所以我不得不修改它，使读者能够懂得恩·列昂奈的思想。

在《L'economia sociale》一书中，同一个无与伦比的思想叙述得更加明显得多，更加简略得多。在那里，小商品生产者社会（用我们这位意大利的巴贝夫的术语来说，就是“平等者的社会”——*sui generis*）获得最理想的形态。

“人是利己主义者。因此他永远力求利用最少的小时（劳动）来获得最大的满足（产品）。同时因为每一个人都固有相同的利己主义意图，所以谁也没有可能得到会比其他人根据同样数量的劳动所得到的份额更多的那一份产品；如果有什么人发现在什么地方有一个他可以从中得到更多产品的使用劳动的部门，那么其他的利己主义者就会集中自己的力量到同一个部门中去，而且会通过竞争使他的产品同他的劳动在比例上相称起来。所以，在所有的人充分进行竞争的情况下（*data la completa concorrenza*），大家都会用相同单位的花费得到相同单位的产品。换句话说，财产或个人占有物（*la proprieta o possesso di ciascuno*）是他自己劳动的结果，谁也不会从剥削他人中得到利润”^①。

一句话，“人们之间充分进行竞争”的王国，显然也就是现代工人运动应当追求的最终目的。可是到现在为止，究竟什么东西妨碍了这个理想的王国成为现实的王国呢？又是什么东西现在妨碍着人类享受充分的竞争呢？回答极为简单，而且一看就明白：财产不平等、垄断、资本主义所有制。这个所有制妨碍建立各种利益间的自然和谐，并且给社会关系带来不协调^②。它应当被消除掉，而且只有消除了它，自由主义学派所发现的社会经济的自然规律才会得到应有的活动范围。

我们的作者是这样议论的^③。而且他根据自己的这个议论，得意洋洋地声称：“快乐主义的和数学的经济学”（即当代的曼彻斯特

^① “L'economia sociale”，第190—193页。

^② 同上，第191—192页。

派。——格·普·)给人一种比马克思锤炼的武器更加强大得多的批判资本主义利润的武器^④。我不会劝他放弃这个信念；我只要指出一点就够了：他对曼彻斯特派最新变种的爱慕丝毫不会削弱他同旧日黄金时代的曼彻斯特派，甚至同他称之为自由主义学派中乐观派代表的巴师夏^⑤的“亲戚关系”(l'affinità)^⑥。我不知道列昂奈先生是否读过巴师夏的著作，不过凡是仔细阅读列昂奈先生的《社会经济学》的人，都一定会承认，这位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处在“法国和纳瓦拉^⑦”所有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中间最庸俗和最肤浅的人物最强烈的(直接的或间接的，这在此种场合下是无所谓的)影响之下^⑧。

十五

读者自然知道，谢·布尔加柯夫^⑨先生在他的《信仰领域里的漫游》中从马克思主义退到了唯心主义，甚至还象某些爱讲是非的人所补充的那样，退到了撒哈拉荒漠^⑩。对列昂奈先生，不能不说，

③ 恩·列昂奈根据自己这个议论，对资本主义提出谴责，说资本主义利润的存在“妨碍人的利己主义活动”(第199页)。他提出这个谴责时当然是自以为极其巧妙地揭穿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话。

④ “L'economia sociale”，第205页。

⑤ 巴师夏(Bastiat, Frédé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资产阶级社会阶级利益调和论的鼓吹者。——译者注

⑥ “L'economia sociale”，第119页。

⑦ 纳瓦拉，历史上是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地区，公元八世纪在这里建立起国家，905年桑乔·加尔西亚称王以后为纳瓦拉王国，直到十六世纪。——译者注

⑧ 作为例子，我建议读一读第84页。在那里他用严肃而且深思的神情重复着巴师夏最无价值的一句庸俗话，洛贝尔图斯在同拉萨尔通信时曾经对这句话十分公正地表示过愤慨。

⑨ 谢尔盖·尼古拉也维奇·布尔加柯夫(1871—1944)，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唯心主义哲学家、《路标》文集的作者之一。——译者注

⑩ 撒哈拉荒漠，原文为 к Саровской пустыни，恐系 к Сахаровской пустыне 之误。——译者注

他在政治经济学中从马克思退到了帕累托，甚至还退到了巴师夏。这个倒退运动，这个回到庸俗经济学的运动大概也就是我们的作者所谓工团主义者重新审查马克思的最重要的理论成果。我让读者去判断，到底应当把什么符号放在这个成果的前面：正号还是负号，加号还是减号。我只提出这样一点意见：

“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大声反对“知识分子”，说他们只会引起无产阶级队伍里的骚乱，只会使无产阶级脱离正轨。不能不承认，他们加在“知识分子”头上的责备中某一部分是有十分充足的道理的：知识分子参加工人运动，仅仅在一定的条件下才会对无产阶级有利，而当这些条件不存在的时候，这种参加就会变成有害的，因为那时它不会加速无产阶级觉悟的提高，而是延缓这个提高的过程。这些条件中占最主要地位的就是同无产阶级接近的知识分子对待统治阶级思想家独立的批判的态度。“知识分子”能够对工人阶级有益主要是（且不说仅仅吧）作为“思想杆菌”，即作为思想家。而且正是因为他们的作用几乎唯一的只能是这种“杆菌”的作用，他们就一定要“从自己身边除去老朽的人”，一定要摆脱应当结束其统治的那个阶级的思想家的影响。否则“知识分子”本身就会成为这个阶级思想影响的传播者，即是说，他们本身就会促使无产阶级在思想上从属于资产阶级，也即是说，他们本身就会干起反对他们参加工人运动时给自己提出的那个目的的事情来。不过要“从自己身边除去老朽的人”完全不象许许多多的“知识分子”所以为的那样轻而易举。为了做到这一点，背熟无产阶级利益同资产阶级利益根本敌对等等这样的原理是完全不够的。为了做到这一点，牢记某些“口号”，背熟某种信条问答，一般说来是不够的。背熟和牢记是记忆的事情，然而这里的问题同仅仅一个记忆毫不相干，因为这里必需思考，这里应当用独立的思想工作获得严谨彻底的世界观，这里必需用一个包罗万象的基本原则的精神说明自己

的全部观点。希望造福于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的不幸也正在这里；“知识分子”的绊脚石也就在这个地方。只有他们为数很少的代表人物才能够独立的和完全彻底的思维，而他们中间百分之九十五的人都具有——且用一下已故的卡罗宁^①的话说吧——五光十色的思想，同时这些“五光十色的思想”一半或者甚至四分之三是从无产阶级为了自身解放而与之进行斗争的那个资产阶级身上借用来的。因此，参加无产阶级的多数“知识分子”始终会在或多或少的程度上促使资产阶级思想家制订的思想得到传播。有时这类思想的传播受到“知识分子”本身环境的限制，看来并没有任何实际意义；人们迷恋着颓废派的诗篇、唯心论的哲学和“有教养的”阶级的现代精神生活的其他产物。不过已经无需谈论，这类迷恋的可能性本身，证明转到工人阶级方面的“知识分子”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精神上的共同性；需要记住的是：在同现代社会中阶级斗争看来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些观点中立的旗帜下，传染上这些观点的“知识分子”始终会把许多同运动的实际问题最直接地联系起来的思想带进工人的队伍。然而这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对于所有文明国家的知识分子，我想也可以这样说——具有很大的对思想的好奇心理，使得他们急忙扑向思想界的任何新鲜货色，同时却没有什本事对新思想采取深思的、批判的态度。结果他们就常常把仅仅是为了保卫过时的资产阶级制度而虚构出来或者在思想古董的库房中找出来的那些理论，当作社会科学中新的重要发现，甚至当作“永恒真理”加以接受。作为这类可悲的误会的明显的例子，可以指出：许多“知识分子”衷心地自认为是忠诚可靠的无产阶级思想家，却接受现代曼彻斯特派的理论——“纯粹经济学”。事情达到这种地步，那时这种牌号的所

^① 卡罗宁 (1853—1892)，俄国民粹派小说家尼古拉·叶尔皮吉福罗维奇·彼特罗帕夫洛夫斯基的笔名。——译者注

谓思想家，尽管他们对无产阶级有或多或少热烈的好感，都会变成向工人头脑直接传播资产阶级偏见的人，那时只要有点微不足道的、有时纯粹是偶然的理由就可以在同一些所谓无产阶级思想家的队伍里开始一场思想“危机”……。这样的“危机”几年以前由于出版了爱·伯恩斯坦先生几篇无聊的文章和一本糟糕的小书就发生过。

爱·伯恩斯坦先生即那些由于误会而被人看成是马克思主义行家的人物之一，作为“马克思的批判家”的角色出场了，他的出场鼓舞了欧美许许多多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走进了无产阶级的行列，但是没有任何爱好、任何能力理解和接受现代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这些“知识分子”坚决地起来反对“马克思的教条”，并且开始——如常言所说的——嫁祸于人。凡是他们自己对马克思学说不理解的地方，都宣布是这个学说的缺点；凡是凭着自己的力量通过同资产阶级思想家精神上的接近而取得的理论偏见，都声称是重要的科学真理，这个真理始终是马克思不知道、而他现代的门徒们又都理解不了的。看来在思想的市场上还从来没有如此强烈地需求过时的观点、老生常谈和毫无内容的同语反复，而且使用这些精神“宝贝”的人还从来没有……在前进运动的幌子下如此大步地急忙“倒退”……。

我们已经知道，“革命的工团主义”是这个独特的风暴时代的一种产物。我们已经知道的它的两个意大利理论家中间，任何一个人，即无论阿·拉布里奥拉还是恩·列昂奈，都不否认这一点。然而无论这个人或者那个人自然都不会同意说，这个产物的性质首先要用意大利那个知识分子阶层的缺点来解释，这个阶层的知识分子虽然参加了工人运动，背后却拖着一条大大的和长长的资产阶级辫子。而实际情况也正是这样。为了从思想方面理解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应当知道，崇拜这种工团主义理论的每一个

“知识分子”^①，都有两个属性：第一，一般说来对“传统的社会主义”、个别说来对马克思主义极不理解；第二，同意大利自由资产阶级思想家的某个变种有着不可克服的精神上的亲戚关系（“affinità”）。凡是不忘记这些属性的人，他虽然很费劲地（大家知道，没有任何事情比深入思考一种没有内在严谨性的学说更加困难的了），但毕竟能够十分清楚地认识“革命的”工团主义这种思想现象。

这里，命运的辛辣讽刺在于：正是那些特别大声地叫喊反对知识分子的人们，本身在极大的程度上具有知识分子最有害的和最糟糕的弱点。

十六

现代“曼彻斯特派”所宣布的“永恒真理”象圣经中著名的母牛一样干瘦^②。利用这些“真理”是不能说明任何历史现象的。既然列昂奈先生至少在着重谈到现代工人运动的进程和任务的地方仍然得研究这类现象，所以他认为自己必须再三向马克思求援和再次用各种办法来肢解他的学说，使之适应于自己的“自由主义者”的观点。

例如，恩·列昂奈在谈到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关系时，硬说马克思认为任何经济斗争都是政治斗争（第132页）。而马克思说过，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③。这完全是另一个意思。这完全不是说，政治斗争的概念永远可以代替经济斗争的概

① 大家知道，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主要是“知识分子的”运动。参加工会的工人在意大利主要是跟着改良主义走的。

② 语出《圣经》“创世纪”第41章第4行。据说法老作梦，梦见七只又丑陋又干瘦的母牛吃尽了七只又美好又肥壮的母牛，但它们并未因此变成肥壮的和美好的。——译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475页。——译者注

念，相反，而是说，当经济斗争逐渐扩大和深入，终于达到整个阶级反对奴役自己的生产关系的运动的规模时，它就一定会变成政治斗争，即变成争取掌握政权的斗争。只要政权还处在同保存资本主义所固有的生产关系休戚相关的那个阶级手中，就不可能根本改变现时的生产方式和消灭这些生产关系。因此，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曾经向无产阶级指出，夺取政权是“劳动者阶级的伟大使命”^①。但是不言而喻，当恩·列昂奈用他那“现实主义”的观点来理解马克思的时候，他是不能承认这个思想的真正的和直接的意义。他使这个思想受到逻辑的拷问，以求从它那里得到“自由主义”式的口供。

他说，“马克思主义思想的第一条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科学的工团主义大大地加深了‘夺取’一词的意义，给这个名词作了最正确的、其实也是符合它的本义的解释。社会主义政党在进行片面的选举活动中，由于混淆了权力和资产阶级立宪国家，即由于把权力同利用资产阶级各种国家机器混为一谈，而歪曲了夺取权力原则的最初的、实际的意义”（第135—136页）。

我们的作者希望用“混淆了权力和资产阶级立宪国家”这些话表示什么意思呢？这里什么地方有“混淆”呢？错误何在呢？是不是在于“立宪国家”被认为是统治阶级权力的“机器”呢？但这不过是简单地承认事实罢了，因为要知道国家的确是这样的机器，其实列昂奈先生本人往下几行就引证了恩格斯的一句话，承认了这一点：“国家——这是资产阶级社会为了整个保存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一般条件而采取^②的一种组织”。^③或者列昂奈先生认为这里的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13页。——译者注

② 供基尔德错夫先生参考的注释。“采取”一词在这里完全不得当，您不妨说“建立”。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36页。——译者注

错误也许在于他所讨厌的党认为可以“利用”由于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而建立的国家机器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需对这个机器作任何改变么？如果是这样，那么列昂奈先生又是在说“莫须有的事情”，因为国际工人协会总委员会还在评巴黎公社的宣言^①中就断然说出过这样的思想：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代的国家机器和运用它来作为改造社会的工具，但工人阶级必须根据自己的目的改造这个政治工具本身^②。自从这篇宣言问世以来（大家知道，它是1871年写的），社会主义者中间除了某些“马克思的批判者”以外，大概没有谁怀疑过这一点。

任何工具都必须符合它所服务的那个目的。这是十分容易了解的；而同样容易了解的是，如果不把一件工具夺到手，不掌握它，不能任意支配它，那就不可能改造它。而这个“永恒真理”又使我们碰到夺取政权的问题。为了对付这个纠缠不清的“棘手的问题”，列昂奈先生终于对它作了下面的回答：

“不是任何人数多少可观的社会主义派别，不是某个多少革命的社会主义政党，夺取和利用国家机器，以便让它来控制生产力。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权力，或者确切些说，获得国家权力，就是在革命时期，在从现在向未来过渡的时期，直接提升为生产的领导者。因此社会主义革命意味着把社会的轴心从对国家的政治管理转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即转移到这样一种无产阶级的权力：它象内部机器一样是从这机器的所有自然器官——工团的自发联合中产生的”（第136页）。

但是这是答案么，充分么？……把社会的轴心从对国家的政治管理转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这是什么意思呢？如果这里有什么思想，那也是用笨拙、平庸、假博学的空谈包裹得使人很难

① 这篇宣言的作者是同一个马克思。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7卷第355页。——译者注

弄明白的思想。社会的轴心“转移”到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就算是这样。可是这么一来，我们“在从现在向未来过渡的时期”将有权力，而且有中央的权力。这个权力同国际成立宣言所谈到的要夺取的那个权力有什么不同呢？可以看得出来，它将没有政治性质；否则“把社会的轴心从政治管理转移”云云这些话就没有意义了。但是如果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没有政治性，那我们应该怎样理解它的属性呢？恩·列昂奈援引无产阶级“直接提升为生产的领导者”来搪塞。可是这里的直接一词是什么意思呢？它显然只能有一个意思：无产阶级在不掌握国家权力的情况下“提升”云云；无产阶级在力求成为生产的领导者的时候避开、绕过这个权力。但要知道，说避开、绕过国家权力，这是容易的。如果国家权力妨碍这种迂回活动，怎么办？要知道，很可能（说得确切些，最确实的是）它希望，而且也不能不希望妨碍这种活动。其实我们和列昂奈先生都十分清楚，现在国家权力之所以存在正是为了保存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就是说，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既然冲突不可免，那么我们就只有：或者用无政府主义的方式来了解冲突，即把冲突了解为破坏国家，或者象《成立宣言》的作者那样来了解它，即了解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且运用它“作为手段”来达到无产阶级的“最终”经济目的。没有、也不可能有第三条出路。如果列昂奈先生还要去找这样的出路，如果他还要利用他那笨拙难懂的、假博学的空谈^①来发现它，那么这只是表明他完全没有清楚思考的能力。

其次，不妨问问：无产阶级的“中央权力”是否会有强迫性呢？如果不会，那么这和根本没有“中央权力”的情况有什么两样呢？而且我们的工团主义者的“概念”同古老的、陈腐的无政府主义“概念”有什么区别呢？如果会，那么新权力恰恰是我们同列昂奈先生

^① 普希金早就正确地说过：“空话难懂”。

讨论要“取得”的那个政权。诚然，迂回的和极端冒险的避开现政权的道路会使我们产生这种权力的“概念”；但“概念”将来还是存在，而且它的存在再一次告诉我们，甚至“科学的工团主义者”也不能想出一种根除资本主义的办法，可以使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变成多余。换句话说，在这种场合，即在承认我们所研究的权力的强迫性的场合，我们就得出国际工人协会的奠基人老早就得出了的结论，不过我们要通过曼彻斯特派的国家不干涉原则的泥潭和无政府主义否定“政治”的荒漠。这自然无助于弄清我们的概念。

然而我们将是正确的。列昂奈先生就这个题目对我们说的许多话，有一个有根据的思想为基础，不过这个思想表达得很糟，大概是因为思考得太糟的缘故。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消灭，社会分为阶级的现象也会消失，而随着这种现象的消失，任何一个希望继续存在下去的社会都不可能放弃、也决不会放弃的那个有强制性的权力，就会逐渐改变性质。这个权力的职能越来越缩小为简单的生产管理，因此这个权力越来越不象阶级社会里的国家权力，而越来越变成“社会理性”的表现。人类政治发展的“最终目的”不是无政府(анархия)，而是泛政府(панархия)。可是这种发展的必要的先决条件就是具有不同的、新的生产关系的新社会的存在。而如果无产阶级不获得政权，新社会便产生不了。所以，开始就“破坏国家”是可笑的和荒谬的，而开始就忽视它，那便更加可笑和更加荒谬了。

最后，还要注意一下我作的摘录中的下面一个地方。用列昂奈先生的话说，政权不应当由任何派别或政党“获得”，而要由整个工人阶级“获得”。不过，如果工人开始力求“获得”政权，如果他们走上政治斗争舞台，那么他们就必然会组成政党、工人阶级的党。别的道路是没有的。在政治斗争中，没有政权就无法办事。自然，我知道工团主义者在这个题目上通常的那些夸夸其谈，他们说：如

果政治斗争是必然的，那么可以由工会(即工团)联盟来搞。列昂奈也谈到这个联盟，并且还称它是自发的；他认为正是自发的工团联盟应该“获得”中央的权力。然而“自发的”是什么意思呢？这一点很值得同列昂奈先生谈一谈。

十七

再看看他的《工团主义》一书。那本书的第 118 页上说：

“职业工团从基本经济事实中产生出来正是一种必然性，而不是由于任何空想主义者或任何社会使徒的工作室里虚构的思想奇怪的影响，因此工团成了阶级意识的熔炉。按照平等者社会的方向改变和调整联合起来的工人的自觉意志的这种意识，不是唯心主义的传染病，不是用口头进行的某些有卓识远见的人物的思想的传播，而正是事业、行动和工团主义实践的产物”(第 118 页)。

我不想在这里讨论我上文已经提出过的我们这位作者的历史哲学思想的无可救药的内在矛盾性；我不打算解释那力图使工人的理论具有“唯意志的”性质，同时却把自己的全部希望寄托在同个别人物的自觉活动对立起来的必然性力量上面的人，是自打嘴巴；我也不准备查问“唯意志论”的拥护者是否有逻辑上的权利用轻蔑的态度谈论“思想的传播”。我只提出我引用的这几行话，并继续读道：

“从推动工人群众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的盲目利益的浓厚云层(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中后来会流露出阶级意识的光辉；这种现象的发生不是违反工人直接的和个人的利己主义，而是通过它的表现的中介，和由于它在工会这个必然形式内部的表现。”(第 119 页)

把关于利己主义的问题(用基尔德错夫先生奇怪的说法是“关于利己主义的规律”)放在一边，我们看到，工会要力求把所有那些

在“基本经济事实”影响下希望为改善自己生存条件而斗争的工人都包括进来。而在这里，列昂奈先生是完全正确的，这种情况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这种改善生存条件的“自发”斗争产生的结果就是“后来”从“盲目利益的浓厚云层中流露出阶级意识的光辉”。这也是完全正确的，虽说是用夸张的“文体”表达得不成样子。然而正是在这里我们才接触到问题的核心。

问题在于：并不是在所有联合为工团的工人那里，阶级意识的光辉会同时从什么“浓厚云层”中流露出来。不言而喻，在一些人那里这种光辉流露得较早，在另一些人那里则较晚：一些人已经懂得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然性；而另一些人则只想到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改善自己的生存条件；在一些人的头脑中已经产生了正确的社会观点，然而在另一些人的头脑中暂时还没有这样的观点。不管我们这位“唯意志的”作者怎样轻视思想，有一点却是明显的：对他有益的是问问自己，能不能想个办法“利用”先进工人的觉悟。当然，我知道，他认为觉悟工人应当在工会内活动，推动不觉悟的工人前进，促使他们表现“阶级意识的光辉”。我很高兴他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表明，甚至他这个在理论上对思想的历史意义理解得如此糟糕的人也仍然发现自己有时不得不承认思想实际上有很重要的作用。不过我可以断言，根据自己可悲的习惯，他在这里也不善于始终不渝。他得出的结论是：懂得运动的最终目的何在的先进工人应当把活动限制在工会之内。可是这对那个运动并不会有利。对这个运动会更有利得多的是，先进工人一方面继续在工会内活动，同时又结成类似无产阶级先锋队那样的特殊组织。这个先锋队的特点恰恰在于它的觉悟，在于它懂得运动的最终目的。如果被吸引参加（也一定要吸引参加）工会的，另外还有那些只遵从“关于利己主义的规律”、而且只想到出卖自己劳动力最有利的条件的无产者，那么，加入（也一定应当加入）

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就是已经不从个人的或工会的“利己主义”观点、而从阶级的“利己主义”观点看问题的无产者，在这种场合，阶级的“利己主义”同最广泛的利他主义是一致的，因为现在工人阶级的利益同除开剥削者的全体人类的利益是一致的。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将给全体无产者群众指明道路，并为整个无产者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它是阶级斗争的主要代表。而且惟独它才能恰当地代表全体无产者群众，这正是因为暂时还只有它以应有的明确性和广泛性认识到全体无产者群众的任务：要知道列昂奈先生本人就承认（的确是承认！）这一点，绝对肯定这一点。“而任何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因此我们这个为整个阶级的利益而不是为个别集团或个别职业的利益而斗争的先进工人组织，必然会取得政治性质，就是说，会成为或者会力求成为政党。这种情况必不可免，以致凡是组织为工会的工人的觉悟，在其发展中接近到我宁愿称之为由量到质、由自发到自觉、由纯粹经济斗争到政治斗争的过渡点，可以作为经济大改造的手段的那个地方，懂得运动的最终目的和实现此目的的条件工人组成为政党的过程，可以说就会自然而然地开始。一个例子：现代的英国，特别是不久前英国工党的赫尔代表大会。

而且正是因为这个过程是必不可免的，企图避开它就是不理智的、不合算的、有害的，而促使这个过程以尽可能有利于整个运动的方式实现，则是有益的、理智的、合算的。同时还应该避免可能会使这个必然的过渡成为混乱和分裂的根源的那些错误。而每当人们开始把党同工会对立起来的时候，它就会成为混乱和分裂的根源。这种对立可能通过两个途径发生：第一，可能以工会的名义轻视党；第二，可能以党的名义轻视工会，高傲地看待工会。意大利和其他国家的工团主义者犯了第一种过错；我们俄国的某些所谓马克思主义者犯了第二种过错。无论这些人或者那些人都大

大地有害于运动，所以无论对这些人或那些人都持否定态度，对有组织的无产阶级说来乃是某种“智慧的开始”。

当你同“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打交道的时候，你必需准备忍耐。我们同读者一起表现了不少的耐心。因此为了休息，我想笑一笑。

列昂奈先生在他的书的附录中硬要我们相信，阿根廷的工团运动比任何地方都更接近于直接的反国家政策的典型公式，这种政策就是根据我们在上面几页所叙述的那个工团主义理论得出来的。

这是hoch komisch^①，象德国人所说的那样。第一，甚至在工团主义者中间也只有不知道在阿根廷工人的工团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的那种人，才会把阿根廷当作工人运动的理想：我们从阿根廷的党向去年施图加特国际代表大会^②提交的报告中清楚地看到，工会运动在这个国家还没有走出“混乱状态”。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成功地获得对某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的影响，并且劝导他们极端厌恶“政治”。不过列昂奈先生对无政府主义者的同情——其实“自由主义者”也是如此！——未必会达到使他能够公开对无政府主义的成功表示高兴的地步。阿根廷的另一部分有组织的工人（“总工会”）并不否定政治运动，甚至在自己的章程中直接承认它。不错，“总工会”到现在还没有——正如我指出的这份报告所说的——实际运用过自己的政治观点。我们的作者如此喜欢的难道不就是这种情况么？如果这样，那么他高兴的不过是运动的不发达状态。而在这种场合，玻利维亚和智利也许比阿根廷更会使他高兴得多。

① 很可笑的。——译者注

② 《从防御到进攻》文集注：指1907年国际代表大会。[《从防御到进攻》是普列汉诺夫自己编纂的一本论文集，1910年在圣彼得堡出版。——译者注]

第二,甚至阿根廷,由于国内工人运动的“混乱”状态,也远不是那么接近工团主义的理想,象可怜的恩·列昂奈想象的那样。在那里——可惜呀!——除了工团组织的萌芽以外也有自己的党,这个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于1896年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它甚至还参加了选举。不错,1896年它只得到100张选票,但在1904年投给它的选票就有1,254张,它还成功地提出了自己的议员阿利弗列多·尔·帕纳齐奥。一句话,甚至在理想的阿根廷也到处有“国家制度”的传染病①。

然而不管阿根廷发生了什么事情,看来我们古老的欧洲很少可以拿自己工人运动的进程来安慰我们的“自由主义者”。这当然是很值得古老的欧洲夸耀的!

十 八

在理论方面,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是一种极端贫乏而且简直毫无价值的东西。在实践方面它也是极为虚弱的。甚至在不久前铁路工人代表大会上(在这些工人那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影响比任何地方都大),胜利落到了所谓整体主义者②手里,即落到了意大利党的“中心”手里。这个“中心”否定极端行为,根据恩利科·费利著名的和很成功的说法,它赞同改良而反对改良主义者,赞同工团而反对工团主义者。大多数意大利工人都否定“革

① 参看“L'internationale ouvrière et socialiste, Rapports soumis au congrès socialiste international de Stuttgart”, Bruxelles 1907, Vol. I, pp. 87—88, [《工人和社会主义者国际, 向施图加特国际社会党人代表大会提交的报告》—译者注], 布鲁塞尔 1907 年, 第 1 卷第 87—88 页。]

② 整体主义, 也叫整体的社会主义。它认为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各种社会主义理论只是纯粹的“整体的”社会主义的变种。整体主义是马隆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形成起来的, 是各种杂乱无章的教条的大杂烩。它实质上是企图为改良主义和阶级合作政策提供理论根据。——译者注

命的”工团主义。因此也许可能觉得奇怪，意大利的党怎么至今都对付不了这样一小撮人，他们虽然智力十分贫乏，在实践方面又极其无能，仍然有使无产阶级势力四分五裂的危险，他们在每一个适宜的、甚至不适宜的场合都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势力最凶恶的敌人。换句话说，不管在意大利，“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对无产阶级队伍的影响多么微弱，它毕竟比由于他们的观点令人吃惊地根本站不住脚而可以指望的状况要强大些。怎样来说明这种情况呢？

在这篇专门批判作为理论的工团主义的文章中，我不得限于研究我所指出现象的那些本身真正属于理论领域的原因。在这里我觉得考察一下伊万诺埃·波诺米的新书《Le vie nuove del socialismo》的基本原理是很有益的，因为这些原理涉及提到工团主义宣传日程的各种问题。

伊·波诺米这位意大利党的中央机关报《Avanti!》^①的编委，属于最著名最有教养的改良主义者之列。我在“仔细研究了”恩·列昂奈先生最主要的理论著作以后马上就读了波诺米的新书，我感受了每一个在同发育不全的小孩长久纠缠之后开始同聪明的成年人交谈的人都会体验到的那种印象：甚至在伊·波诺米紧紧接近“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观点的地方，甚至他重复他们的错误的地方，他都超过他们整整一头，因为他的思维合乎逻辑得多，他的论据要周密得无比。但是读完他的新书，你就会懂得“革命的”工团主义理论为什么在意大利获得了比由于它那极其微不足道的内在价值而本来可能有的更多得多的意义。

俄国民间有句话：长得漂亮没用，生而幸福才好。意大利工团主义很不漂亮，但它很幸福。它的幸福在于它的敌人们本身在理论上都武装得不好。

① 《前进!》——译者注

上面我引用了“整体主义者”领袖恩·费利的公式：“赞成改良而反对改良主义者，赞同工团而反对工团主义者”。这个公式再成功不过了。可惜的是，一个成功的公式还不足以保卫党内整个的派别。费利的公式不是严谨的观点体系的简明的表达。它的提出是由于正确的政治本能，而不是由于清楚的社会主义意识。因此“整体主义者”（让他们原谅我这个不雅观的称呼吧）不成功地保卫着自己成功的公式。不久前，这个公式的作者本人，即费利，在《Avanti!》上还出来反对了工团主义者，结果怎么样呢？这个改良主义者的敌人在批判“革命的”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时候，自己就表明本身是十足的改良主义者，他没有提出任何一条不是从改良主义者的武库中借来的论据。意大利的“整体主义者”都是“有右倾意图的”折衷主义者，即倾向改良主义的折衷主义者。如果他们的折衷主义暂时可以保证他们在集合着大多数力求避免采取极端行为的人的党代表大会上取得胜利，那么这种折衷主义现在在保卫党的纲领和策略的原则基础的斗争中，使得他们的理论阵地变成很不可靠的了^①。这也就是为什么他们在同工团主义者争论时不得不从改良主义者的武库中借用武器的缘由。而且由于同样的原因，在意大利不能不承认改良主义者仍然是工团主义最厉害的敌人。

然则在改良主义者的阵营中情况又怎么样呢？

说到改良主义者，那么他们反对“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斗争使得他们同这种工团主义者极为亲密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变得大大困难起来了。

波诺米先生的新书之所以大有教益，是因为它极其清楚地暴

^① 《从防御到进攻》文集注：现时在意大利党内，改良主义者（大概要长久地）成了占统治地位的流派，而恩·费利则更加增强了他的“右倾意图”，这甚至引起了改良主义者的愤慨。

露出改良主义者同“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这种亲密的精神上的血缘关系。

在这方面最值得注意的是该书第三部分，它的标题是«Le tendenze odiern del socialismo»（社会主义中的最新趋势）。这里叙述了可以称之为从改良主义观点来看的现代社会主义史的哲学。

作者把这段历史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时期的特征是巴枯宁同马克思在国际内部的斗争。用伊·波诺米先生的话说，马克思在这场斗争中是以新社会主义理论的代表身分出现的，而巴枯宁则代表了旧的空想社会主义^①。但是那个时候新社会主义理论并没有得胜的机会，因为大陆欧洲在经济上还太不发达了。斗争的结果是国际工人协会的破灭。

第二时期的特征是马克思思想的完全胜利，资本主义在欧洲大陆的成功终于为马克思的思想开辟了相当广阔的道路。在这个时期内，国际运动的领导权属于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通过用正统马克思主义精神写的爱尔弗特纲领也可以说明这个党的内在的生命力。伊·波诺米先生说：“实际上这个纲领乃是《共产党宣言》基本原理的几乎逐字逐句的重复”（第245—246页）。充满德国社会民主党爱尔弗特纲领的那个精神，也在几乎所有其他欧洲各国社会党人中间传播开了：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瑞士、俄国、西班牙、荷兰、巴尔干诸国，甚至法兰西，虽然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还未能彻底战胜旧的社会主义传说和理论。德国社会民主党的领导权从1889年巴黎国际代表大会继续到1904年阿姆斯特丹国际代表大会。阿姆斯特丹代表大会是这种独特的专政的顶峰。而在这以后，它就趋于衰落了，于是开始了现代社会主义的第三时期，产生了现时的社会主义运动。

^① “在马克思预见出现了出现新的历史过程的时候，巴枯宁却用红色涂料复盖了旧的暴动分子的思想体系”（第243页）。

这个时期和这个运动的主要特点是：现在事实上终于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乃是马克思曾经预见并且预言要出现的那个活动家，有组织的无产阶级。社会主义走出了党的狭隘的圈子，它的范围扩展到使它一般地囊括了所有的工人运动。“二十年来不断的宣传，不断的影响，——波诺米先生解释说，——结果是使得现在的工人组织、合作社和工会自己有能力制定自己的政策，而毋需由马克思的门徒们组成的党来监督、领导和代表。这个党自然不会消灭，但它似乎会被它所唤起的，然而现在不会象过去那样听命于它的工人运动所吞没。党保持着自己的存在。变成服从工会意志的机构，而不再是工会的指导机关(l'organo direttivo)”(第251—252页)。

从这个时刻起出现了所谓修正主义。过去马克思主义者的党当作无可争辩的真理加以接受的马克思学说，现在都违反了经济现实和工会的本能意愿。这样一来，在参加工人阶级解放斗争的知识分子阶层中怀疑就传播开了。“习惯于批判的人开始探讨各种批判性的问题。对日益增长的贫困的预言没有错误么？关于出现社会大灾难所必需的经济大危机的学说没有被历史经验推翻么？无产阶级专政不也是一种骗人的幻想么？于是从左边出现了乔治·索雷尔，他在自己的《Avenir des syndicats》^①中以革命主义的名义攻击社会党想要夺取政权，借以达到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于是从右边又出现了爱德华·伯恩斯坦，他以改良主义的名义(他在英国、即在曾经诞生工会的国家，观察和研究过改良主义)攻击马克思主义的政治预言，和自以为正确解释了马克思学说精神的那个党的策略公式。旧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身所引起的势力，从两个方面并从不同的观点对这个党进行攻击。工会把自

① 《工团的未来》。——译者注

己的经验同马克思的策略指示对立起来，并且用工团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第 252—253 页）。

这是真正可贵的一段话。从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出：伊·波·诺米先生实质上也是象列昂奈先生那样的工团主义者。他们两人都认为，党应该服从工会；他们两人都建议用工团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他们之间的区别只是：一个鼓吹“革命的”工团主义，而另一个则浸透了改良主义的精神。这在任何场合下都只是次要的区别，因为两人都追求同一个目的，不过每个人都按照自己的方式追求，每个人都表现出自己特殊的气质。换句话说：在这里我们所接触的只是两种形态的工团主义。这两种形态的工团主义经常斗争着，甚至彼此非常仇视。然而他们中间不管是谁得到胜利，在任何场合下胜利者反正是工团主义。改良主义者对待“革命的”工团主义的敌视态度，不过是表示他们敌视用革命的观点看待工人运动的任务而已。正是因为这个道理，而且也只是因为这个道理，改良主义者决不会取得对“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的彻底胜利：因为无产阶级的革命本能始终把无产阶级的一部分同情放在“革命的”工团主义者身上。如果这部分同情在意大利现在不是很大，那么我们不应该拿这个责怪改良主义者，而应该责怪“革命的”工团主义者本身，因为他们的纲领和策略的可怜的空想性会引起无产阶级本身健全理智的愤慨，而这个无产阶级对于它认为是他们的革命主义的表现有着本能的同情。当无产阶级还不懂得它把实际上只是革命的空谈当作革命的意愿是犯了错误以前，情况就是这样。当它懂得了这一点，它就会彻底转过身来，背对着“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就象过去转身背对着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而这将是无产阶级觉悟提高过程中前进的巨大一步。不过并不是改良主义者推动它走这一步的。改良主义者自己关于革命策略的概念是如此错误，如此天真，以致他们完全真诚地打算把“革命的”工团主义者看

成是这种策略的真正代表。从这方面说，他们对自己的假革命的敌人的攻击乃是有利于这些敌人的一种反宣传。只有在工人阶级面前揭露“革命的”工团主义这种自以为是用革命的观点解决“工人问题”的理论根本站不住脚，才能彻底战胜它；能够做到这一点的只有马克思主义。然而马克思主义在意大利很不走运。“整体主义者”对它具有极为模糊的概念，而改良主义者，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则宣布必须用工团主义代替它。

不过我请读者注意，完全不应该从我这些话中得出结论，好象我认为改良主义者是很好的、或者哪怕仅仅是过得去的马克思通。远不是这样的！伊·波诺米先生的新书再一次告诉我，他们在这方面是多么软弱无能。我上文说过，在列昂奈先生的“工团主义”以后，我拿起这本书，就有一种印象，好象我同发育不全的小孩子纠缠了一阵子，又开始同聪明的成年人交谈了。不过并不是所有聪明的成年人都深知他们要作判断的那些对象。如果说在波诺米先生的书中没有充斥于阿·拉布里奥拉和恩·列昂奈两位先生的著作的那些可笑的荒唐话，那么其中明显地暴露出一切国家的改良主义者固有的那种对正确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天生的无能为力。

仔细听听伊·波诺米先生关于现代社会主义史的议论就足以相信这一点。在这段历史的第一时期，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马克思带着他的新理论出现在历史舞台。这个理论在第二时期内得到欧洲社会主义者普遍的承认，后来却同现实发生了矛盾，而不再使习惯于批判的头脑感到满意。似乎表明现代社会生活的现实进程与马克思的理论有矛盾的那些现象到底是什么呢？这说明我上文所做的摘引中的一段话，那里谈到危机、谈到贫困化理论、谈到无产阶级专政——简言之，那里毫无批判地重复着致力于“重新审查”马克思的那些“批判的”头脑如此热心如此没有根据地反复申说的一切滥调。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不得不同这些先生打笔仗，我认为

自己有权介绍对这些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去参阅我的论文集《对我们的批判者的批判》^①。在这里我只要指出，伊·波诺米先生象所有其他和他有亲缘关系的“批判的”头脑一样，起先歪曲马克思的思想，然后便得意洋洋地引证当代的经济现实来反驳他这个遭到歪曲的思想。一般地说，再没有比用这种“策略”来战胜自己的敌人更加轻而易举的了。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甚至这种“策略”也不是始终保证一般说来“马克思的批判家”，特别是伊·波诺米先生能取得胜利。

比方就拿危机来说。伊·波诺米先生用这样的语调谈论危机，好象资本主义国家最新的经验表明了马克思的危机理论是错误的。然而要知道，这不过是胡说八道。而且很可惜的是，一个远不是没有智力的人在对待这种胡说的态度上表现得如此没有批判的头脑。至于马克思把危机看成是一种说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为一方和它的生产关系为另一方之间存在着深刻矛盾的现象，那么这种观点越来越被现在我们在危机时代能够观察到的一切事态所证实。至于马克思认为危机时代会使阶级对抗尖锐化，那么在现在这个时刻，当危机正在北美工人中间引起如此强烈的骚动的时候，是否还需要对这个思想加以证明呢^②？

伊·波诺米先生想要我们相信，工会会拿自己的经验来对抗马克思的策略指示。这是什么样的工会呢？什么样的经验呢？并且对抗马克思的什么样的指示呢？英国的工会尽管有他们的特殊处境的一切特点，尽管有它们的由这些特点所造成的一切偏见，仍然被事物的力量本身越来越坚定地推上马克思早在国际工人协会时代就向它们指出过的道路，这难道不是英国工会的经验吗？

① 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第2卷。——译者注

② 当我写下这几行文字时，所有的欧洲报纸都报道了费城失业者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的消息。

十九

不过伊·波诺米先生对“马克思的策略指示”一般说来有很奇怪的想法。他从马克思的《一八四八年至一八五〇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摘录了下面一段话：“革命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而是相反，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只是在和这个敌人的斗争中进行破坏的政党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政党。”①

从这里波诺米先生做出这样一个意外的结论：马克思思想利用辩证法来理解一切事物的发展（*Che la dialettica gli servisse a intendere il divenire di tutte la cose*）（第18页）②。当然啰，凡是卷进了“辩证法”的地方，任何有自尊心的改良主义者都别指望什么好结果！既然马克思从辩证法的观点看待策略，他就不可避免地要犯大错误。按照波诺米先生的意见，对工人阶级的局部成就的任何指望都是同马克思的辩证观点根本不相容的，因为这样的成就在马克思主义者看来始终不过是悲喜剧式的。由此可见，根据马克思本人对革命过程的认识是排斥任何进化概念的（第12和19页）。这样一来，为什么以及在怎样的意义上工会——按照波诺米先生的意见——不能不起来反对马克思的策略指示就完全弄清楚了。

辩证法导致了对进化的否定！这种说法是如此新奇、如此……怪诞，甚至列昂奈先生本人也会嫉妒波诺米先生的这一发现。要写出这样的高见，对辩证法以及对它在十九世纪科学思想发展中的影响没有任何概念是不够的，除此之外还必需有歪曲马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第393页。——译者注

② 我从中抄下这一行真正不可思议的文字的那一章，用的是改良主义者笔下意味深长的标题：《Il processo dialettico nella concezione di Marx》。

克思理论的巨大本领。波诺米先生看来忘记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就已经宣布过，政治革命是社会进化的结果，而在谈到资本主义社会的进化时，正是给工会留出了广阔的地盘。而且，同一个波诺米先生看来又忘记了，同一个马克思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经指出，英国缩短劳动日是英国无产阶级重大的成就。此外，波诺米先生可能会得到很大的好处，如果他想起了国际《成立宣言》，在那里用这样有力而且鲜明的语句，正是把工人阶级的局部成就说成是劳动经济学对资本经济学的重大胜利。其次，他不妨再仔细想想马克思以国际工人协会的名义向全世界无产者提出的那些“策略指示”。其中有些“指示”就极其充分地、在所有逐渐能够进行逻辑思维的人面前，揭示出波诺米先生对马克思“辩证”策略的“批判”意见的彻底破产。最后，如果意大利的这位改良主义者愿意费点力气，哪怕稍微注意一下他从《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急忙抄出的那段话，他就会看出，这些话属于、而且仅仅属于特定时期欧洲发生过的事情，它们本身并不包括对未来时代的任何“策略指示”。紧接在波诺米先生引用的这段话前面，马克思说道：

“除了少数的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但是，在这些失败中被打败的不是革命。被打败的是革命前时代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矛盾地步的社会关系的结果；被打败的是革命政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观点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它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①……接着就是波诺米先生引用的那段话。这里讲的正是特定的时代，即1848到1850年这个时代，难道不明白吗？

当然可以反驳这段话，甚至也可以不赋予它们普遍的“策略指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版第1卷393页。——译者注

示”的意义。不过这已经是另一个问题，在这里我不打算加以考察，虽然象法国无产阶级的代表参加临时政府和卢森堡委员会这样的“成果”，的确值得称为悲喜剧式的。对我来说，现在重要的只是指出：波诺米先生越是更多地完全歪曲马克思的思想，他越会更加成功地“批判”马克思。

根本莫名其妙的是，这位可敬的意大利改良主义者根据什么说马克思发表过赞同工会从属于党的言论。这实在是伪造。在第一篇文章中我已经指明了：恰好相反，马克思倒是主张工会中立。不过不言而喻的是，他会坚决反对“工人运动”“吞并”党。而且在这里，如果他不得不同波诺米先生争论的话，他就会援引波诺米先生本人议论的逻辑。

我们这位改良主义者硬说，现在社会主义的范围扩大到了囊括所有一般的工人运动。这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且是极不成功的文字游戏。波诺米先生怎样想呢，社会主义是否包括例如其代表在赫尔代表会议上曾经发言反对社会主义的那样一些工人组织^①？我希望他会说：不包括。那就很清楚：社会主义者没有任何根据可以把自己的比较先进的组织溶化在这些比较落后的组织中。相反，他们应当保存先进组织的独立性。

最后，如果使它们中比较先进的组织之“服从工会的意志”正是因为这些工会应当向所有的工人开放，即也向觉悟不高的工人开放，那对整个工人运动就会是很不利的。使觉悟性服从自发性，简直是不合算的。但这不是说，觉悟性可以自封为领导者而强迫自发性接受。不，这种做法首先就表明，觉悟性本身还没有好好理解自己的作用，也就是说，它还缺乏……觉悟性^②。比较先进的组织应该采取有分寸的态度对待比较落后的组织，这种态度乃是马

^① 我提出这个问题时假定它们的代表正确地表达了它们的观点。

克思领导的国际极为显著的特点。先进组织应当追求的不是使比较落后的组织服从自己，而是使自己获得影响它们的能力。这对先进组织来说之所以是可能的和容易的，正是因为它是觉悟工人的组织，也就是说，因为它在捍卫工人阶级现在的利益的同时，也善于预见工人运动的未来，而且还因为，正如上文已经说过的，它始终捍卫着整个工人阶级的利益，而不是这个或另一个劳动部门、这个或另一个职业工人的利益^②。

波诺米先生硬说，“一些老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否认工人组织在运动的策略和方向的各种问题上有发言权”（第256页）。这又是纯粹的谎话，波诺米先生本人也感觉到这一点，他接着补充说：“或者充其量它们把工会和政党慷慨地看成是同一机体的两只脚一样。”这完全不象是否认工会有发言权。而且在这里，波诺米先生正确地传达了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个对象的观点^③。不过他把什么东西同这个观点对立起来呢？就是伯恩施坦先生向舒尔采-格弗尼茨先生借用的那句臭名远扬的话：“运动是一切，最终目的是虚无！”（第256页）波诺米先生看来至今还没有懂得：第一，没有目的的运动是没有意义的东西；而第二，所谓工人阶级的自发运动（但决不会是没有目的的运动）只是在看出这个运动的方向即懂得它的（也许远不是所有参加这个运动的人都认识到的）最终目的的那些人的心目中才有巨大的历史意义。

用波诺米先生的话来说，改良主义的本质也可以用这样几个字表示：经验的自由（la libertà d'esperimenti, 第290页）。不过

② 这种强迫接受的例子，可以在我们的运动史上指出来，我们那种虚构的觉悟性把乌格留姆-布尔切也夫作风的一些非常不受欢迎的因素带进了我们的运动。

③ 关于这个问题，我再次冒昧引证自己的论文《曼海姆》。

④ 我说大多数，是因为我个人觉得这个比较不完全确切。我宁愿跟着马克思把工会称为提高觉悟的学校。

这已经是十分奇怪的了，因为马克思主义本来也就没有在任何时候反对过“经验的自由”。如果波诺米先生说，改良主义的本质在于压根儿不关心理论和压根儿没有能力从以过去“经验”的全部成果为根据的理论观点看待新的“经验”，那么他给改良主义的本质下的定义就会比较正确了。

用工团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在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发展中，无异于一步巨大的倒退。而无论如何确实无疑的是：如果拿抱着中庸态度和古板作风的工团主义来对抗所谓革命的工团主义，那是不可能战胜革命的工团主义的。

评亚·奥·奥里威蒂的书

亚·奥·奥里威蒂：《现代社会主义问题》。格·克·译自意大利文，弗·米·舒里雅齐柯夫编辑。附作者给俄文版写的序言。斯·杜罗瓦托夫斯基和亚·查卢什尼科夫出版。莫斯科 1908 年。

奥里威蒂是一位意大利工团主义理论家。我们已经认识了这个理论的两位代表——阿尔图罗·拉布里奥拉和恩利科·列昂奈。我们在《现代世界》上为他们两位各写了一篇长文章；至于对亚·奥·奥里威蒂，可以只用不多的文字加以评论，虽然他身上的概念混乱也是绰绰有余的。

例如请看他在那篇俄文本序言的第一页上向我们所作的叙述：“当我大约两年前^①出版本书意大利文版时，我在第一章中说过：社会主义当时度过了危机时刻，这个时刻本来要决定这种学理和运动的生死命运。恩格斯的‘宿命论’说教那时已经彻底破产了。正在斗争着的社会主义者中间谁也不敢再相信社会主义自然而然的、命中注定的胜利唯一是依靠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力量，依靠所谓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欲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实现的。”

恩格斯什么时候宣传过宿命论呢？他什么时候相信过社会主义唯一依靠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力量来实现呢？能不能把历史规

^① 这篇序言标明为 1907 年 11 月。

律同人的情欲和意志对立起来呢？难道人的意志和情欲不服从“历史规律”么？如果您要在我们引用的这篇序言里或者一般的在奥里威蒂的书里找出这些问题的直接答案，那是徒劳的。看来他以为这样一些问题在有教养的读者的头脑中甚至不应当产生。因此我们只好自己费点力气来弄清楚使我们的作者产生恩格斯宣传过“宿命论”这种奇怪的确信的那个逻辑过程。我们似乎在第15页上偶然碰到这个过程的痕迹。我们在那里读到这样的话：“长期以来，资产阶级被我们看成是一个不能成为反对社会主义的屏障的阶级，这个社会主义几乎是凭着事物力量本身，几乎不依赖人们的意志和紧张的努力，由于自己不可避免的、必然的和绝对无法遏止的运动而应当占上风。”

“未必能够举出比我们在恩格斯老人那本收集在1902年的《Almanach du Parti Ouvrier》^①内的名著中所看到的关于德国社会主义即将胜利的有名预言更好的例子，来说明这类乐观的和催眠的幻想；卡尔·马克思这位忠实的同志在讨论德国社会主义选票的增长时曾经预见到十九世纪末将有三百万社会主义选民。^②”

奥里威蒂在俄文版序言中发表的思想，在这里以缓和的形态重复着。在那里，强加在恩格斯头上的是这样一种“宿命论”的信念：社会主义之所以取得胜利唯一的是靠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力量。在这里，硬塞给“善良的老人恩格斯”的是这样一种“催眠的幻想”：社会主义之所以会占上风“几乎”是凭借事物的力量本身，“几乎”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这些“几乎”改变着很多事情，不过它们并不妨碍我们看出，无论在这里或者在那里奥里威蒂先生都陷入同一个困境，无论在这里或者在那里他都不懂得恩格斯的同一个观点。奥里威蒂先生用傲慢自大的鄙视口吻称之为“善良老

① 《工人党年鉴》——译者注

②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291页。——译者注

人”的宿命论的东西，原来是一种乐观精神、一种对于有可能看到自己的党惊人迅速发展的人说来十分合理的乐观精神。乐观精神可能产生错误，这一点我们在恩格斯本人的例子上看到了：他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很快取得胜利的预言没有应验^①。不过做一个乐观派还完全不是意味着做一个宿命论者。如果恩格斯在想象中过分地缩短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取得胜利的路程，那么从这里还绝对不可以得出结论说：在他看来，似乎德国党将来之取得胜利“几乎是凭借事物的力量本身，几乎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紧张的努力”。完全相反：恩格斯发表了自己对即将胜利的乐观信念，从而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人重新把意志集中起来。看来奥里威蒂先生以为：恩格斯曾经指望资产阶级国家会和平没落。但这又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恩格斯为马克思的著作《Die Klassenkämpfe in Frankreich》^②所写的著名序言的第18和19页上清楚地说明，恩格斯没有抱过这样的希望。他得出了结论（不过看来任何一个马克思的“批判家”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德国的那些统治阶级将不得不取消这个对它们来说后果严重的合法性，而在现有的条件下坚持合法性对他的同志们则是有利的。不言而喻，一旦统治阶级取消了这种合法性，那也就谈不上和平发展了。而且正是因为那时不可能谈论和平发展，所以恩格斯在结束自己的序言时提出了关于罗马军队在导致多神教衰落和基督教胜利的那个转变时期的作用的见解^③。这些见解我们在这篇序言中以及在奥里威蒂先生引证的论文中都可以找到。恩格斯在那篇论文中说过：军队正从德国政府手中滑

① 论文集《从防御到进攻》的注释。——不过在这里需要附带声明一下。亚·奥·奥里威蒂责备“善良的老人”恩格斯说，他“曾经预见到十九世纪末将有三百万[社会主义]选民”。可是要知道，我们刚刚度过二十世纪头十年，而在德国这种选民的人数早已超过了上述数字。

② 《法兰西阶级斗争》。——译者注

③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611—612页。——译者注

走^①。就算他夸大了这一滑走过程的速度吧，但要知道有一点却是明显的：他之所以谈到这个问题，正是因为他清楚地懂得“人们的意志”、“情欲”和“努力”的意义，而完全不是因为他似乎相信“社会主义命中注定的胜利唯一是依靠资本主义生产的物质力量而实现的”。需要有许多“努力”和不少“情欲”才会不懂得这个道理。而奥里威蒂先生就是不懂得！

如果拿我们的作者这个可笑的错误同他以下的声明对比一下，他的错误还会变得更加可笑：

“我们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六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所表述的，我们党的历史纲领”（第209页）。

奥里威蒂先生怎么能够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这样两个人的纲领呢？要知道他们中间有一个人曾经是“宿命论”的宣传者，并且相信过：社会主义是“依靠所谓不以人的意志和情欲为转移的历史规律”而实现的。他怎么能够赞成充满着“宿命论”精神的“学理”和“策略”呢？

或者，也许他会说，恩格斯本人到他的晚年已经改变了同马克思一起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过的那个历史纲领么？当然，怎么说都是可能的，不过听完我们的作者在这种场合所引用的一些理由，那会是有趣的。

可以预先肯定，这些理由会是很独创的。一般说来，奥里威蒂先生有很大的独创性。比方请听他在批评改良主义时所说的话：“讲坛社会主义的学理，以敌视古典经济学的自然规律的现实主义经济学的名义，起来反对曼彻斯特派^②，同样，改良主义以实际政治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2卷，第291—292页。——译者注

② 奥里威蒂先生说这个话时引证了Helb[赫尔布]在戈利增多尔夫和布伦坦诺年鉴上的论文中的注释。我们摘录的这句话中的着重点是奥里威蒂先生加的。

事实的名义起来反对社会主义，反对马克思主义学理的灾难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规律。”(第 202 页)

马克思主义学理——大家知道，“宿命论者”恩格斯曾经十分积极地参加过这种学理的制订——原来是“灾难性的和无政府主义的规律”的某种总和。概念混乱到这种地步已经无以复加了。除非亚·奥·奥里威蒂不知道，正是马克思主义的出现，铲除了“无政府主义者”脚下的理论基础。

我们始终是现代社会主义中德国人用“修正主义”一词表示而意大利却称为改良主义的那个流派的坚决反对者。我们不得不在同这个流派的代表人物作斗争时多次争吵；可是从这里当然得不出结论，说我们可以对某个工团主义者反对改良主义时忽然想要说出的任何胡言乱语都鼓掌欢迎。而且我们不能不看到，奥里威蒂先生在批判改良主义时是何等惊人的软弱。他写道：“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相信社会主义这个今天最可能的真理会取得胜利。作为社会学家，我们知道，在斗争着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复杂竞技中，社会的进步将决定于它们作为现代社会冲突的结果而得到的合力。然而甚至运用力量合成的原则有一点也是无可怀疑的：如果我们自己开始减少我们的组成部分，那么资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就会因此而成比例地得到好处，合力就会成比例地改变。如果我们自愿地减少我们取胜的或然率，我们就是把较小的重量放在应当决定我们独特行动的尺度的天平盘上”(第 200 页)。这里请注意下面一句话：“如果我们自愿地减少我们取胜的或然率”。这句话表明我们的作者认为，改良主义者“自愿地”减少决定着社会运动的那个合力中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但这又是胡说。硬说改良主义者“自愿地”减少无产阶级的力量，意味着把荒唐的责备加在他们头上，从而削弱——虽说显然完全不是“自愿地”——自己本身的阵地。奥里威蒂先生的书里就有很多这样的极其可笑的、

论战中的失算。

我们的作者“完整地接受马克思和恩格斯六十年前在《共产党宣言》中表述过的、党的历史纲领”，同时又肯定地说，“向资产阶级国家要求社会的合法性，用民间的俗话说，意味着爬进狼嘴，却要在狗的警卫下保全兔子，意味着把自己的武器交给敌人，意味着犯了 *petitio principii*① 这个方法论错误，这个错误，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乃是真正的内容错误”（第 201 页）。在第 44 页上他说得还要坚决些：“国家权力的任何加强都会损害公民的自由，——在这一点上，我们完全同意无政府主义者和德·莫利纳里② 这类纯粹的、毫不妥协的曼彻斯特派分子的意见。”

马克思完全没有这样的看法。在他写的国际工人协会的第一篇宣言中他证明了：英国的“十小时工作日法案不仅是实际的成功，而且同时是原则本身的胜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被工人阶级政治经济学战败了”。在同一个马克思所写的、并以英国工联名义提交国际第一次代表会议的报告书中，鼓吹国家干涉雇佣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它说：“工人阶级实行这种法律并不是巩固政府权力。相反地，工人阶级要使现在被利用来反对它的那个政权受自己支配。”最后，马克思在给库格曼的信中嘲笑那些反对缩短工作日的法国人，说他们是否定任何产生于阶级斗争的行动的人③。

在这以后，请判断一下：我们的作者是否有权断言，被他唤做“社会主义”的工团主义，“现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多地受到充满

① 预期理由。——译者注

② 莫利纳里 *Gustave de Molinari*, 1819—1912), 法国极端派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译者注

③ *Gustav Jaeckk, Die Internationale*, 第 36、37 页[参看耶克：《第一国际史》，中文版第 37、49、50 页。——译者注]

整个《共产党宣言》的那种精神的鼓舞”（第 157 页）。好象不是这么回事！

奥里威蒂先生硬要人相信，他达到自己的信念“是通过深刻的科学研究”（第 8 页）。只有某个天真的工团主义者才会相信这种说法。在另一处，他十分谦虚地声明说：他的书是“用清楚的和带预言性的语言”写成的（第 7 页）。我们却要说，在思想不清楚的地方语言是不可能清楚的，而且我们不知道任何一个预言家会象无与伦比的奥里威蒂先生所表现的那样，对堆砌空泛词藻的习气有如此不可克制的爱好。

维·切尔诺夫先生和波尔·路易

维克多·切尔诺夫：《罗曼语区诸国的工团主义理论家》。波尔·路易：《法国工团主义史》。“合作”书籍出版社。莫斯科 1908 年。

从刚才我们写下的双重标题可以看出，我们打算评论的这本书，其实是由两本书组成的：维克多·切尔诺夫先生的著作和波尔·路易的著作。第一本应当成为第二本的序言。这个序言按篇幅说并不亚于它要加以介绍、阐明和补充的那本书。从外在的方面上看，这是很不雅观的。但这还不是什么大问题：糟糕的是，序言没有说清概念，有时还引起不少的概念混乱。

维·切尔诺夫先生认为，波尔·路易的书从叙述法国工团主义实际的历史和现状方面来说是十分令人满意的，而且暂时还没有任何别的书可以代替它。按照他的意见，“凡是不愿意只限于肤浅地看看它（即工团主义。——格·普·）发展的一般情景，而觉得需要比较踏实地深入考察这些情景，并不在如何对付充满着‘枯燥的’事实材料的许多篇页面前停步的人，都绝对必须翻一翻”这本书（第 VIII 页）。不过他认为书中有很大的缺陷，于是他就想用自己的序言来弥补。他说：“问题在于书中对法国工团主义历史的内在方面的说明是比较简陋的，而其中专论‘工团主义学理’的结尾一章又是极端贫乏和软弱的。它甚至不会使人对革命的工团主义与现代社会社会主义其他革命派别的区别究竟何在有任何概念。革

命的工团主义的一切特征都被掩盖起来了，一切界线和棱角都擦掉了。其所以如此，当然不是因为波·路易缺乏知识，而仅仅是由于他采取的那种中间的、调解的立场”。（第 VIII 和 IX 页）

这两点评语都是公正的。的确，波尔·路易的书从事实方面说是令人满意的，而从说明思想方面看来则是不能令人满意的。我们甚至比切尔诺夫先生走得更远，我们说，从后一方面看来，波尔·路易的书中专论“工团主义学理”的结尾一章（第 184—193 页），不仅是极端有害、极端软弱的，而且简直充满着错误。它是用法国社会党南锡代表会议通过的、说什么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追求同一个目的的著名决议的精神来叙述工团主义学理的。然而事实完全不是这样。工团主义的目的（我们说这个话的时候指的是法国的所谓革命的工团主义，波尔·路易长篇大论地加以分析的主要也就是这种工团主义），在于把生产资料变为工团（即工会）所有制；社会主义的要求是变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制。这两个目的彼此之间的距离，几乎就象比如无政府主义的“共产主义”的目的为一方和国际社会民主党的目的为另一方之间的距离一样远。把工团主义的目的和社会主义的目的混为一谈，那就是不懂得社会主义的内容是什么，或者为了迎合某些实际的想法即机会主义的看法而故意不提社会主义最主要的特点之一。法国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同现今在法国社会党内居少数地位的盖得和他的同志们的努力相反，这个党在对待工团主义的态度上采取了极端机会主义的策略。当工团主义者继续用最粗鲁、有时还是最不公道的方式攻击法国社会党的时候，它却认为自己的义务是对工团主义者讲一些“愉快的话”（正如冈察洛夫的一位主人翁所说的那样），并且使他们相信，他们和社会主义者之间实际上不存在任何严重的意见分歧。不言而喻，工团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之间事实上存在着的意见分歧，绝对不会因为这个奇怪的策略而消失掉；它们只

是得到片面的说明，一些工团主义者就是这样叙述和评论的。不难理解，法国无产阶级阶级觉悟的提高不仅不会由此得到任何好处，相反，还会失掉很多东西。而且我们觉得十分可惜的是，波尔·路易接受法国“布尔什维克”机会主义策略的影响到了这样的程度，甚至他本人在自己的书里也表现出是这种策略的一位代表人物。

这种策略的主要“理论家”自然是饶勒斯，他，由于支持臭名远扬的“反爱国主义者”爱尔威及其在党内的拥护者，甚至准备由机会主义者变成“革命者”。绝妙的是，法国社会主义的“布尔什维克”，即饶勒斯主义者同布朗基主义者的联盟，在许多爱好空谈的人士的心目中是法国党的左翼，而法国的“孟什维克”，即马克思主义者或盖得主义者，现今在同一类人士那里却享有温和派或右派的名声。这里重复着在对待国际的态度上曾经发生过的同样的偏差，那时，按照许多“明理的”人的意见，马克思是当时社会主义中的温和派，相反，巴枯宁却是“极端派”的首领。最近几年来，我们在俄国也看到了某种类似现象。不过这里没有篇幅讨论这个问题；且回到我们这本书上来吧。

切尔诺夫先生在指出波尔·路易书中重要的缺陷以后，就着手进行弥补了。不过正如已经说过的，他这件事做得很不成功。例如切尔诺夫先生在驳斥工团主义者认为人们之结成集团应该根据自己的利益而不是按照自己的观点和见解的思想时，兴奋地喊道：

“总之，罪行的确在于人们联合成政党，而且拿来作为这种联合的基础的不是赤裸裸的利益，不是阶级的本能，而是了解为、概括为、转变为严格的社会政治 Credo^① 的同一个利益和同一个本

① 信条。——译者注

能。这已经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灵魂的滔天大罪，这已经是‘思想体系’的贡品。在这里，任何唯物主义所固有的二元论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意识、观念对唯物主义说来似乎不过是真实的‘事物’投下的某些模糊的阴影”(第 XII 页)。

切尔诺夫先生在他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灵魂”的高尚的愤慨中大大地弄错了事情的真相。马克思主义者对于他这里所攻击的那种可笑的荒唐言论是完全没有责任的。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很能说明工团主义理论家的特色的那种把“利益”同“观念”对立起来的作法，是经不住批判的，原因简单，因为唯物主义历史观认为，“观念”的发展决定于“利益”的发展(后面这个名词不是在自私自利的狭义上，而是在社会经济的广义上来理解的)。如果工团主义者作这样的对立时总是引证马克思，那么这证明他们对唯物主义历史观根本没有任何概念。如此而已。切尔诺夫先生本来正是需要把自己的渊博的注意力放在事情的这个方面。然而他动起火来了，因此没有说出该说的话，却讲了一些根本不该讲的事情。

唯物主义者任何时候都没有犯过二元论的过错，对他们说来观念任何时候也不是某些“模糊的阴影”。费尔巴哈以下的话出色地表达了唯物主义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对我说来，即主观上说来，是纯精神的、非物质的、非感性的活动，那么，就其本身说来，即客观上说来，是物质的、感性的活动。”^①这些话表现出唯物主义关于主体和客体的统一性的全部学说，凡是对它们哪怕有一点了解的人就既不会说什么唯物主义者的二元论，也不会说好象他们不懂得观念的意义。

往下讲。切尔诺夫先生谈到达尔文和马克思之间“流行的类

^① 见《费尔巴哈哲学著作选集》，中文版上卷第 195 页。——译者注

比”时说道：“在头一个人为我们研究了有机体通过生存竞争而发展的规律的同时，后一个人为我们研究了仅以个人利益的自由比赛为指导的社会发展的规律。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的工作是达尔文的工作的直接继续；马克思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什么是人类的动物学的、自发的存在之直接的、只有若干形态变化的继续”……（第 XVII 页）。

我们这位喜欢表示高尚的热情的作者忘记了，“马克思的工作”不光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工作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力求对人类历史发展全部进程作出说明。它并不拒绝从自己的观点来观察比如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这个社会远不是“仅以个人利益的自由比赛”为指导的。不过在切尔诺夫先生身上事情始终是这样：正是在他想作详尽研究的地方，他总是停留在事物表面。而且每当他皱起眉头，开始谈论马克思主义的时候，他自己就会感到他对待事物的这种永不改变的肤浅态度。这里还有一个很好的小例子：“糟糕的不是，——他叙述说（第 CXXI 页），——马克思主义者把未来设想为资本主义体系仿佛由于急剧的社会地震而大规模的完全崩溃了，而只是”……。切尔诺夫先生认为在马克思主义者那里糟糕的究竟是什么，这对我们并不重要；我们只认为必须郑重地向读者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任何时候都不曾有过我们的作者这里强加给他们的那种空想主义的未来自观。还有一点。切尔诺夫先生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证马克思下面一段话：“这个领域内的（即物质生产领域内的。——格·普·）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使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①（第 XX 页）。他

^① 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 25 卷第 926—927 页。——译者注

把我以下的话同马克思的这些话对立起来：“按照现代唯物主义者的学说，符合特定时代生产力状况的任何经济制度，都符合人的本性”。于是他挖苦地说道：“显然，对于俄国马克思主义者说来，马克思也是太过份的唯心主义者和主观主义者”（第XX页注释）。不，切尔诺夫先生，这里显然的只是您又不懂得您谈论的这个对象。您从《资本论》第三卷中引证的这段话讲的是未来社会中的生产组织。这个组织应当最符合未来的生产者的人的本性。但这完全不是说，按照马克思的意见，人的本性始终是不变的。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用藐视的态度说：“蒲鲁东先生不知道，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①（由我编辑的、维拉·查苏利奇翻译的俄译本第115页）。看来切尔诺夫先生也不知道这个道理。我们且来帮助他一下。人的本性的不断改变是由什么决定的呢？答：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生产力的发展和人的本性的发展之间必然会建立一定的适应关系，正如马克思（顺便说说）在切尔诺夫先生从中摘下引文的《资本论》第三卷同一页上对此所作的暗示那样。也就因此，我有充分的权利说，符合特定时代生产力状况的任何经济制度，都符合人的本性。请注意，我这里有一个前提：经济制度符合特定时代的生产力状况。如果没有这种符合，特定的制度就会成为衰老的、过时的制度，同样也就不符合这个时代的生产者的人的本性了。难道这不是清清楚楚的么？是清清楚楚的，只不过不是对维·切尔诺夫先生而言罢了。

我们要预先告诉读者：维·切尔诺夫先生在自己的序言中关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一切，都很象我们刚才指出过的那种情况：一切都建立在不可原谅的概念混乱和事实混乱的基础上。而且不仅是在谈到理论的地方是如此。维·切尔诺夫先

^①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174页。——译者注

生在叙述(外国的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实际意图时,还更多地
地把已有的事和乌有的事搅合在一起。可惜篇幅不允许我们举出
一些新的例子。我们只好劝读者利用比较可靠的资料来检验维·
切尔诺夫先生在他评论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序言”中所说
的那一切。

至于切尔诺夫先生反对罗曼语区诸国工团主义者的理论时所
提出的不同意见,那么应当承认,在这些意见是以科学社会主义的
各种原理为根据的范围内,而且仅仅在这个范围内,它们是正确的。
不过这个范围非常小,因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科学社会主义
的原理,在切尔诺夫的头脑中(或者也许只是在叙述中?)常常采
取一种极端怪诞的形态。

还有一点。维·切尔诺夫先生虽然正确地反对了索雷尔鼓吹
的“社会神话”论,遗憾的是他忘记问一问自己,这个确实可怜的理论
是不是同我们俄国的、始终得到他切尔诺夫先生如此热烈同情
的主观社会学有亲戚关系。

评恩·克里茨卡亚和 恩·列别节夫的书

恩·克里茨卡亚和恩·列别节夫：《1789至1907年法国工团运动史》。劳动总同盟机关报《人民之声》编辑爱弥儿·蒲热序。“劳动联盟”书籍出版社。莫斯科1908年。

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先生在给自己的书写的序言中说，他们想答复这样一些问题：什么是工团主义？其目的何在？由于什么原因它出现在法国？这自然是很值得赞赏的想法。可惜的只是它注定实现不了。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先生的书对什么是工团主义作了最错误的解释；它很不善于说明工团主义的目的，并且使读者对工团主义得以出世的那些原因产生误解。一句话，这是一本十分糟糕的书。

这本十分糟糕的书上附了一篇爱·蒲热先生写的糟糕的序言。蒲热先生认为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先生的功劳在于他们告诉我们说，工团主义“是从人民内心中涌出的喷泉，它不是从某种偏执的学理中产生的，而是抗议精神的本能表现，是人民对改善自己福利的——常常不自觉的——追求”（第III页）。既然蒲热先生认为这是这本使我们发生兴趣的书的两位作者的功绩，他本人当然要把工团主义看成是“不是从某种偏执的学理中产生的”运动。不过这种观点显然违反他以下的一段话：

“劳动总同盟亚眠代表会议^①的决议规定了工团主义运动的地位，并且明确地宣布，工人力量的协同一致不仅是在政党或哲学宗派之外发生的，而且要撇开它们……朝着完全不同的方向。不能不坚决承认这项决议的巨大意义。对宗教的、爱国的、政治的和哲学的问题采取十分冷淡的态度是工团主义的本质特性，这也就是它可贵和富有成果的地方，这种态度把工团主义看得高于当前众所瞩目的一切问题和骚动，使它变成未来的伟大力量”（第IV页）。

且将宗教的、爱国的和哲学的问题放在一边，只把注意力集中到“工团主义”对待政治问题的态度上。用蒲热先生的话说，“工团主义”对它抱着十分冷淡的态度。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向往工团主义的法国工人还没有成熟到对政治发生兴趣呢？不，蒲热先生的结论是，他们早已成长得超过了这种兴趣，并且转过身来背对着政党，走向“完全不同的方向”，结果变成了未来的伟大力量。这种政治冷淡主义只有对政治和经济的关系抱着十分明确的观点才会产生。然而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当蒲热先生说什么“工团主义不是从某种偏执的学理中产生的”时候，他显然是不对的。实际上他应当肯定直接相反的东西，他本来应当说：法国工团主义的特点正好在于它对政治的否定态度，这种态度乃是某种“偏执的学理”的产物，即正是无政府主义学理的产物。可是蒲热先生不愿意说这个话，为什么如此，这也是容易理解的。他本人就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作为无政府主义者，他主要关心的是不要削弱无政府主义的“偏执的学理”对向往工团主义的法国工人的头脑的影响。如果这些工人懂得，他们不再理睬政治问题就等于按照无政府主义的指使行事，那么无政府主义对他们的影响无疑就会削弱。所

① 这次代表会议是1906年秋天举行的。

以法国的无政府主义者，即其实是他们中间那些追随工团主义的人，情愿把工团主义固有的而他们则是借来的对政治的否定态度说成是阶级斗争发展的自然而然的的结果。而且不能不承认，他们的这种策略手法有其十分成功之处。不过如果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位先生本人还没有处在那全部“偏执的学理”的影响之下的话，他们就会懂得，蒲热先生在自相矛盾的同时，严重地歪曲着真理，因此他的序言不是说明事情真相，而是相反，大大地模糊了真相。

我们这两位作者对当代法国工团运动中工团主义“偏执的学理”的作用理解得多么糟糕，可以从他们谈论这种作用时陷进去的那许多矛盾中看出来。例如在第247页上他们以赞同的口吻引用了工团主义者利亚塔皮在1906年亚眠代表会议上所说的话：“在这里，人们关于社会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说得太多了，可是还有纯粹的工团主义者哩。代表会议有必要宣布：存在着新的社会理论，就是工团主义”。^①往下，利亚塔皮指出了，工团的活动不只限于日常的改良主义的工作，而且它们也为整个的社会改造而斗争。利亚塔皮请代表会议就这个新学理发表意见……在第313页上，作者们用不是更小的同情口吻谈到同一个亚眠代表会议：“在这次代表会议上工人阶级明确地宣称：它认为自己有能力进行反对一切剥削形式的斗争，无须任何局外人来当领导；否定现代社会整个结构的纯粹无产阶级的理论——工团主义，既与社会主义不同，又和无政府主义有别。”

工团主义理论整个的说来的确既不同于无政府主义，也不同于社会主义，如果就它是从这两者那里借用来的各种原理组成的大杂烩这个意义上来说的话。不过无论如何，只要它存在着，只要

① 着重点是原有的。

它被承认是唯一的“纯粹无产阶级的理论”，那就不能肯定地说，法国工团运动的发展不依赖于任何“偏执的学理”。也不能象我们这两位作者那样的说，“没有狭隘的学理主义的工团主义，把一切工农业部门的无产者都吸引到自己队伍中来，把他们都团结起来，不分政治、哲学和宗教观点，只有一个要求，就是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第 314 页）。

这是明显的错误：现代法国工团主义对工人的要求不只是改善自己处境的愿望，而且还要承认利亚塔皮在亚眠代表会议上宣布为劳动总同盟正式理论的那个理论。不管工团主义者的理论是什么东西：是工人阶级发展的“自发的”产物呢，还是追随工团运动并且由于这个运动的逻辑而不得不承认某些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无政府主义者不成功的理论烹调物，然而无可怀疑的是，现时劳动总同盟已经有自己的“偏执的学理”了，它还硬要希望改善自己处境的工人接受这种“学理”。只有瞎子才会看不见这一点。

事情一点也不会因为我们这两位作者宣布工团主义作为“独立的学理”似乎是“整个无产阶级世界观的综合”（第 312 和 313 页）而有所改善。这是一句“空话”，它只是证明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位先生很不长于分析，也不长于……“综合”。其实，如果在亚眠代表会议上工人阶级“明确地宣称”，它认为自己有能力进行斗争，无须任何局外人来当领导，那么这个声明可能有两重意义：

或者它意味着，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身的事业，在这个场合，它只是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章程开篇中所说的那句名言的简单重复。

或者这个声明不过意味着，工团主义者拒绝同社会党接近，把它同资产阶级政党混为一谈，那时就必须把这个声明仅仅看成是一个证据，说明工团主义“学理”完全包括了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基础。

本原理之一：否定政治。

不管是在哪一种场合，显然都谈不上工团主义学理的什么“独立性”。

事实上，我们所说的这篇声明——即不让劳动总同盟和法国社会党有任何合作的亚眠代表会议的那个决议——应当从无政府主义否定政治这个意义上来理解。这种原则上否定政治的态度告诉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对工团主义者所谓独立的学理的影响是多么强烈。这种强烈的影响也表现在看来是坚信不渝的工团主义者的我们这两位作者的一切议论中。他们说：“无产阶级在争取自身解放的社会斗争中遇到现代国家这个资产阶级强大的保卫者。很长时期大多数工人指望……借助政府的权力来改善自己的命运。工人阶级相信过国家这个行善者，并且期待它来解决社会问题。但是政府的政策——颁布反对工人阶级的法律、政府的军队屠杀罢工者，把最有能力的工人关进监狱，以及完全忽视无产阶级的困苦生活——打开了工人的眼睛，从而使他们认识到，政权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简单的反映，不管这个政权是专制政权还是共和政权，反正都一样，它永远只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執行者。工团主义完全摆脱了对国家这种有益干涉的信念，并且用怀疑的眼光看待资产阶级政府的一切法律”（第 291 页）。

在这些议论中，压根儿没有一点“独立的东西”。它们整个都是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搬来的。当你读到这些议论时（在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位先生的书里就有很多这样的议论），你会以为是在读米·亚·巴枯宁著作的某些篇页。一般的工团主义者，特别是我们这两位工团主义者（即我们分析的这本书的作者）就是从巴枯宁那里抄来了组成所有这类议论的不变基础的那个逻辑错误：既然政权是社会经济组织的简单的反映，那么它永远只会是统治阶级意志的執行者。这是完全没有根据的结论。第一，政权是

社会经济组织的简单的反映^①这个情况，绝对保证不了政权始终将是统治阶级即剥削阶级意志的简单的执行者。社会的“经济组织”在自己的发展中是否会使得无产阶级有愿望、也有能力把政权夺到自己手中呢？在这种场合，政权还是不是剥削阶级的工具呢？显然不是的；显然，在这种场合，政权是工人阶级的工具，而且实际运用这个工具时成功的大小将只取决于这个阶级的觉悟。然而巴枯宁任何时候也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接受了马克思关于任何一个社会的政治关系都由它的经济结构来决定的那个思想，从这个正确的思想出发，却做出了一个不正确的结论：无产阶级应当对政治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这个错得骇人听闻的结论，是曲解唯物主义历史观的结果，它早就被巴枯宁本人当作无政府主义者全部策略的基础，而它又从无政府主义者那里，正如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转到了工团主义者身上，接着被我们这两位作者冒充是工人运动发展的“独立的”理论成果。好一个独立性，那还用说！

我们的作者们继续说道，“按照工团主义者的意见，议会是资产阶级独有的机构，那里绝对不可能有阶级斗争，可能有的只是阶级合作”（第292、293页）。为了证实这一点，他们引用了无政府主义者蒲热以下的话：“议会的内部腐败，它们对人民愿望的无知，以及它们的软弱无力，大家都清楚地知道，再坚持这个东西，那是没有益处的”（第293页）。很可惜，他们相信了蒲热的话，并且认为详细论述这个思想是“没有益处的”。这个思想中有很多没有道理的东西。议会的软弱无力是什么意思呢？是不是说，在问题涉及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地方，议会不能表现出力量呢？当然不是。蒲热本人当然不会拒绝承认，议会作为保卫资产阶级利益的工具完全不是软弱无力的。在这种场合下只好假定义会作为反映无产阶级

^① “反映”一词在这里是完全不恰当的，不过我们不必讨论这一点。

意志的工具是软弱无力的。不过那时又产生一个问题：它的这种软弱无力到底是由什么制约的呢？这个问题，无论在我们这两位作者那里，或者在他们所引证的蒲热那里，我们都找不到任何答案。不过，对不起，在蒲热那里，在我们所分析的这本书的序言中，我们遇到了这样一个思想也许可以作为对上述问题的答案：蒲热赞扬觉悟工人的政治冷淡主义。而如果觉悟的工人的确在政治上态度冷淡，那么他们的意志为什么在议会中得不到反映就会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这正是因为他们把背朝着议会。不过事实上甚至在法国，觉悟工人对待政治也完全不是这么无动于衷的，象蒲热所希望的那样。因此我们必须对这样一个问题找出另一个答案：在何种限度内议会可能成为保卫无产阶级利益的工具。我们的作者们引证梅莱姆以下的话说：“我们认为议会是只登记工人意志的机构；它颁布的一切法律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工人的力量把价值给了它们”（第 293 页）。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位先生以为，而同他们一起，梅莱姆也以为，这些话说明和证实着关于议会软弱无力的思想。不过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恰好相反，梅莱姆的话推翻了这个思想；他说，议会只有在工人的意志没有确定和工人的力量没有巩固以前才是软弱无力的。这句话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不过由此完全得不出无产阶级应当拒绝政治的结论。梅莱姆关于议会是只登记工人意志的机构那个话，也许可以理解成这样的意思：凡有议会的地方，国家的内部发展，由于议会确切登记人民的意志，不可能使政治上的“飞跃和灾难”有所借口。但这是不对的，正是因为这个道理我才说，梅莱姆的话只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正确的。可是这决不排除下面这个十分可笑的情况：每当工团主义者不得不说出或多或少正确的政治思想时，他们就同自己原则上否定政治的态度发生矛盾。

在自己的书的第 95 页上，我们的作者们说：“巴黎公社，按照

伯努阿·马隆^①的说法,是法国无产阶级的‘第三次失败’。政权掌握在工人手上,他们在整整七十天内是这座世界城市的主人,但是工人阶级的完全胜利不可能是夺取政权的结果;无产阶级必须清楚地认识到自己的目的,并且团结到自己的组织中去,这些组织马上可以代替现代社会机构和根据新的原则安排生产和消费。”

在第 301 页上我们遇到这样的说法:社会主义政府没有能力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因为“这需要工人十分自觉的态度,否则政府的法令就仍然不会改变”。

这里每一个字又都暴露出不可救药的概念混乱。不言而喻,无产阶级的完全胜利没有它对自己目的清楚认识和不存在强大的工人组织,是不可思议的。不言而喻,在应当参加实现新制度的那些人还不理解这个制度的地方,任何政府都不可能建立新的制度。可是究竟为什么我们的作者们以为,即使存在着强大的工人组织,即使无产阶级清楚地认识了自己的目的,无产阶级也没有任何必要掌握政权呢?这仅仅是因为他们(遗憾啦)处在工团主义“偏执的学理”最强大的影响下,而老的无政府主义的否定政治的态度,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就是工团主义的一个组成部分。

法国工团主义的历史,特别对工会运动还刚开始的俄国说来,是很有趣的和很有教益的。仔细想想法国工团主义的命运和“独立的理论”,对于同情这个运动的俄国人来说是再有益不过的了。可是在这个场合,克里茨卡亚和列别节夫两位先生那本糟糕的书却根本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对于此书,只好把我们上面评论蒲热的序言时所说过的话再重述一遍:它没有说明事情的真相,而只是模糊了它。

^① 马隆(Benoit Malon, 1841—1893),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可能派思想家,提出了所谓“整体的社会主义”。——译者注

答总罢工调查表^①

您希望知道我对总罢工的意见。

意见如下：

有各式各样的总罢工。

可以把总罢工看成是通过在特定国家所有生产部门同时停工的办法进行社会革命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它只是一种空想的和矛盾的思想。

停止了一切生产活动，工人在用饥饿整死资产阶级以前自己就会有饿死的危险。

这还不是最主要的。要使工人阶级举行这种罢工，它的组织和纪律就要达到最高发展水平。然而那时，如果无产阶级只是拒绝工作而不去干自己的革命，那它就犯了不可饶恕的和不可理解的错误。

不过也可以从另一种观点来看总罢工。

可以把它看成是为社会革命扫清道路的一种宣传鼓动手段，而不是看作进行社会革命的手段。

在这种场合，革命的无产阶级不应当袖手旁观，等待资产阶级

① 参看于·拉葛德尔：《总罢工和社会主义。国际调查表》②。

② 于贝尔·拉葛德尔(Hubert Lagardelle, 1875—1914)，法国小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无政府工团主义者。他的代表作《总罢工和社会主义》(1905年法文版；俄译本1907年出版于圣彼得堡)叙述了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基本原则。——译者注

社会由于它无所作为而崩溃。当无产阶级看到自己队伍人数相当众多，而敌人的队伍相当混乱时，它就转入进攻。

这种意义上的总罢工就不会取代无产阶级的政治斗争。恰恰相反，它只会促进整个无产阶级夺取政权。

最后，在这种场合，罢工不应当是严格意义下的总罢工。它应当是使无产阶级有可能进行革命斗争的十分广泛的罢工。

我以为：这样理解的总罢工就不包含任何空想的成分，如果国际社会党否弃这个思想，那它就不对了。

我深知，比利时的同志们不久前的经验使得我们许多同志对这个思想持相当怀疑的态度。可是不要忘记，这一经验是在一些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产生的。如果认为到处都有这些条件，那才是怪事。

让我举我的祖国为例吧。在那里，现在的问题并不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而是同专制制度作斗争。所以我说，1903年夏天我国南方各城市发生的大罢工，尽管引起了镇压从而造成了各种非常可怕的现象，这些罢工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却构成着一个时代。

这就是我对总罢工的全部想法。

译者后记

工团主义，作为国际工人运动中资产阶级机会主义流派，起源于法国。法国人把工会叫做“syndicat”（“工团”）。所以工团主义（syndicalisme）也就是工会主义。不过工团主义者所谓的“工团主义”和一般的工会主义不同。工会主义，又称工联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要求同资产阶级合作，反对推翻资本主义制度，鼓吹劳资利益协调，这些主张反映了工人贵族阶层的利益和观点。为了区别，工团主义者往往自称为“革命的工团主义者”。其实工团主义基本上只是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体系、纲领和策略搬进工会运动而已。所以人们通常称它为无政府工团主义。但是，和否定一切组织和一切权威的纯粹的无政府主义不同，它主张以工团联盟来代替国家机构。因此，工团主义只是无政府主义的一个变种，或者说只是半无政府主义的派别。

无政府工团主义作为一种思潮最初出现在十九世纪末期西欧拉丁语系诸国，二十世纪初在法国和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1906年法国劳动总同盟召开了亚眠代表大会，会议把无政府工团主义分子选进了法国工会运动的领导班子，通过了纲领性的文件，即著名的亚眠宪章。这个宪章系统地阐述了工团主义的理论基础和策略原则。接着，1907年6、7月之交，意大利工团主义者在斐拉拉召开了代表大会。俄国的工团主义者也趁着1905年革命时期工人运动的高潮而大肆活动起来。仅在1906—1908年就把十四部意大利工团主义者的著作翻译成俄文出版。尽管“革命的工

团主义”这个“来自左边的修正主义”，“还远不如机会主义的修正主义那样成熟，还没有国际化，甚至还没有和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政党作过一次巨大的实际战斗”^①，换句话说，尽管工团主义当时还没有象来自右边的修正主义那样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主要危险，但是它“在工人头脑中确实造成了不少混乱”思想^②，而且“这种混乱思想对俄国特别危险”^③。为了同这种有害的学说进行理论斗争，普列汉诺夫写出了一系列专门批判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的论文。本书就是这些论文的汇集。

在这些著述中，篇幅最长、意义最大的是评论阿·拉布里奥拉和恩·列昂奈的文章。普列汉诺夫在这里根据第一手资料详细批判了意大利最著名、最有影响的这两个工团主义者的政治观点、经济思想和历史哲学。他指出，革命工团主义的理论有两个来源：首先是蒲鲁东和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其次是当代意大利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塔勒奥尼的曼彻斯特主义。无政府工团主义的全部本质在于把工会看成是通过夺取生产资料来消灭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主要工具。革命工团主义者荒谬地否定政治，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仅仅归结为经济斗争，宣布总罢工是夺取胜利的普遍手段，否定工人阶级进行斗争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必要性。通过对工团主义策略思想的批判，普列汉诺夫得出结论说：拉布里奥拉和列昂奈是伯恩施坦的亲兄弟。

如果说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工团主义者们的政治和策略观点时，论证了马克思关于“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关于无产阶级必须破坏资产阶级国家并在夺取政权以后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那么，在批判他们的经济思想时，捍卫了马克思关于无产

① 《列宁全集》中文版第15卷第20页。

② 本书第1页。

③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6页。

阶级相对贫困化、关于资本集中化、关于经济危机的学说，驳斥了拉布里奥拉和列昂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种种曲解和攻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普列汉诺夫明确指出：马克思从来没有什么无产阶级绝对贫困化的理论，只有相对贫困化的学说。《资本论》第一卷对这个学说作出了严谨的理论说明。马克思仅仅假定在特殊条件下有绝对贫困化的可能。

批判工团主义者的历史哲学也是本书的一个重要内容。作者揭露了阿·拉布里奥拉和列昂奈的唯心史观，指出他们把人类意志看成是社会运动最深刻的原因的观点远远落后于黑格尔的历史观。同时，他们的形而上学方法论也使他们不可能正确地认识人类意志和经济必然、进化和革命、经济和政治之间的辩证关系。这些都是导致他们在纲领和策略问题上犯下各种错误的理论根源。普列汉诺夫在批判切尔诺夫的时候，还重申了自己对“人性”的看法。

大家知道，普列汉诺夫 1907—1908 年间关于国内问题的政论整个说来具有极端机会主义的性质。与此相反，在国际问题上，他这时却基本上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的。这看起来很矛盾，然而事实的确如此。本书就是一个证明。我们研究和评价他后期的政治思想时不可忽视这一点。

不过如果以为他在国内问题上的修正主义策略观点和组织观点对他的国际政论没有发生过影响，那也显然是错误的。普列汉诺夫批判工团主义的著作至少存在着以下几点与他的机会主义思想有密切联系的严重的错误和缺点。第一，在国家问题上背离了马克思的学说。他只知无政府主义对国家、对议会制的批评，不知道此外还有马克思主义的批评，忘记了或者没有认识到马克思恩格斯国家学说在 1871、1872、1875 等年的发展。第二，只看到工团主义的阶级属性的一个方面（来自知识分子阶层），不懂得工团主义的这个极端，是机会主义、议会迷和庸俗改良主义的另一个对

立的极端引起的。列宁多次指出，在俄国，不觉悟的工人之倾向于工团主义，乃是对普列汉诺夫之流所鼓吹的贩卖政策的反动。也正因为如此，普列汉诺夫不善于用彻底的辩证法思想来批判工团主义，不善于“从工团主义中吸取一切有生气的东西来歼灭俄国的工团主义和机会主义”^①，他的批判充满着学究气息。第三，在党和工会的关系问题上主张工会中立，反对工会同社会主义政党保持密切的联系，不承认党对工会的政治领导是无产阶级队伍保持统一的必要条件。他一再支持孟什维克关于召开“工人代表大会”这个工团主义的口号。第四，攻击布尔什维主义。文章中利用各种机会对布尔什维克进行讽刺和谩骂。这里必须指出一点：普列汉诺夫长期住在法国和瑞士的法语区。最精通的外语是法语。对法国工人运动的了解远远胜过对意大利工人运动的了解。而且从国际范围说，法国的工团主义，无论就实际影响和理论上的成熟性而言，都大于意大利的工团主义。可是他选择来作为自己主要批判对象的不是法国的索雷尔和拉葛德尔，而是意大利的阿·拉布里奥拉和列昂奈。其原因就在于当时布尔什维克的主要理论家之一卢那察尔斯基编辑出版了拉布里奥拉的著作《改良主义和工团主义》的俄译本，并给它写了一篇赞扬性的跋文。普列汉诺夫利用卢那察尔斯基的错误，以此证明自己的孟什维主义策略思想的正确性。

本书译载的六篇文章，除最后一篇录自拉葛德尔《总罢工和社会主义》一书外，其余五篇最初于1907—1908年间发表在综合性杂志《现代世界》上。1910年普列汉诺夫把这些文章全部收进了自编文集《从防御到进攻》，并给它们冠以“政论”的标题。1925年，《普列汉诺夫全集》主编梁赞诺夫编辑出版全集第16卷时，用《社会主义

^① 《列宁全集》第34卷第376页。

问题和工人运动》作为全卷的总标题，下分三栏，第一栏即为“工团主义”，包括这六篇文章和普列汉诺夫为自己评阿·拉布里奥拉、恩·列昂奈的两篇文章的意大利文译本所写的短序。本书就是根据这一栏的文章翻译的。它同三联书店1980年出版的普列汉诺夫另一本小册子《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无论按内容或形式，都称得上是姊妹篇，因此给这个中译本取名为《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这本小册子对于无政府工团主义的理论和实践提供了相对全面而详细的批判。它迄今仍然是研究这个问题的重要参考文献。中译本的出版将有助于对国际共运史、社会主义史以及普列汉诺夫本人的研究。

书中注释，除标明“译者注”以外均为普列汉诺夫原注。所引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一律按照普列汉诺夫的译文译出，同时注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本的卷次和页码，以备查阅。

译文错舛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指正。

一九八二年八月于武汉大学

Г.В.ПЛЕХАНОВ
Сочинения, Т. XVI.
Госиздат, 1925.

本书选译自《普列汉诺夫选集》第十六卷，
苏联“国家出版社”1925年俄文版

工团主义和社会主义

Gongtuanzhuyi he Shehuizhuyi

〔俄〕普列汉诺夫著

王荫庭译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六〇三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5.5印张 129,000字
1984年9月第1版 198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3001·1934 定价 0.64元